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第五冊

(下)

Collection of the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purge of the Rightists
within the Party

Volume 5

(B)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出 版 說 明

这本小册子里，选編了八十七件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党籍的决定和決議，仅供县委以上党委和有关党员幹部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集团头子范明 的党籍和军籍的决议（摘要）	（ 1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白云峯的 党籍的决议（摘要）	（ 11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梁枫党籍 的决议	（ 17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曾爽党籍 的决议	（ 21 ）
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 派分子张文澄党籍的决议	（ 24 ）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显仪党籍的决定	（ 30 ）
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陈孟汀党籍的决定	（ 33 ）
中共重庆市财政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戎 占芳党籍的决定	（ 38 ）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 铁民党籍的决议	（ 40 ）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叶石党籍的决定	（ 43 ）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文炳的党籍	（ 47 ）
共青团四川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贺惠君的 处理意见	（ 49 ）
中共云南省委财贸大口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处理党内 极右分子李文煥的意见	（ 54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	（ 55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58)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62)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黄平的党籍.....	(65)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姜必 德的党籍.....	(68)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党籍.....	(71)
中共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白晶五 的组织结论.....	(72)
山东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 反党集团的报告.....	(79)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村的党籍.....	(83)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篤生 党籍的决定.....	(92)
山东省交通厅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西的结 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95)
中共山东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右派分子刘健飞的定案 报告.....	(99)
山东省文化局、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 馮毅之的处理报告.....	(106)
山东省统计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将王梦玉定为右派 分子的报告.....	(112)
山东省劳动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侯林翼处理意见的报告.....	(118)
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 花經燕的錯誤事实定案报告.....	(125)
中共大众日报社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 正党籍的决定.....	(133)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主要錯誤事实的 报告.....	(136)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毅党籍 的决定.....	(144)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丛林党 籍的决定.....	(150)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成傑 党籍的决定.....	(152)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段德甫 党籍的决定.....	(156)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丰羽 党籍的决定.....	(157)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斌党 籍的决定.....	(169)
中共菏泽地委会(扩大)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扈国 华、杜湘、王鲁克、褚連捷党籍的決議.....	(163)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对于右派分子戴岳的处分 决定.....	(168)
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员会对于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处 分决定.....	(171)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微党 籍的决定.....	(178)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 党籍的决定.....	(180)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 党籍的决定.....	(182)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江誠党 籍的决定.....	(183)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鹤 党籍的决定.....	(185)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笠党	

籍的决定.....	(187)
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永錫党籍 的决定.....	(189)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罗霞光的处分决定.....	(191)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王荣华的处分决定.....	(199)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杜宏本的处分决定.....	(207)
中共合肥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 党籍的决定.....	(213)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右派分子夏际霞的結論意見.....	(215)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尚突党籍 的决定.....	(218)
中共上海市妇联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先 党籍的决定.....	(220)
中共上海市財政局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如言 党籍的决定.....	(223)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楊延修的处理結論.....	(225)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李中的党籍.....	(227)
中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 子苗力沉党籍的决定.....	(229)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涛党 籍的决定.....	(231)
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中的党籍.....	(234)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王若望的处理結論.....	(236)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會議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 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	(237)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 鎮党籍的决定.....	(240)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五支部关于右派分 子楊成亮的政治結論.....	(243)

中共浙江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顧耕初 黨籍的決定·····	(246)
中共浙江省商業廳機關委員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黎 立堅黨籍的決議·····	(249)
中共浙江省輕工業廳黨組關於右派分子張光反動言 行的報告·····	(252)
中共浙江省農業廳黨組關於右派分子張俊升反動言 行的報告·····	(254)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普通班二十支部關於右派分子劉 德焜的政治結論·····	(259)
中共浙江大學第二次黨員大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李 成浩黨籍的決議·····	(263)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會人事局支部委員會關於開除 右派分子同中玉黨籍的決定·····	(269)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會人事局支部委員會關於開除 右派分子李繼勝黨籍的決定·····	(272)
中共洛陽地委關於開除右派分子亓和勤黨籍的決 定·····	(276)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委員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石天行 的黨籍的決定·····	(278)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關於右派分子金凱的處理結論·····	(282)
中共中央民族學院分院委員會關於開除右派分子張 文藻黨籍的決定·····	(285)
中共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右派分子鄧鈞洪的處 理結論·····	(292)
中共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右派分子蘇辛濤的處 理結論·····	(294)
中共廣西僮族自治區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 於開除右派分子徐江萍黨籍的決定·····	(297)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阮力定案与处理决定.....	(298)
广东省水产厅整風领导小组关于極右分子蓬荆的处理結論.....	(300)
广州市文教局整風领导小组关于極右分子李鷹航的处理結論.....	(302)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古念良的党籍.....	(305)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吳英民的处理結論.....	(310)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张玉华的处理結論.....	(313)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爰农的党籍.....	(316)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庄明瑞的党籍.....	(319)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 關於开除右派分子李微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微，男，四十四歲，河南鄆城縣人，地主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黨。歷任區委書記、縣長、副專員、地委宣傳部長、市長、市委書記等職。現任教育廳副廳長、省中學教職員肅反委員會黨組副書記。

其主要反動言行如下

1. 支持右派分子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他說：“儲安平的‘黨天下’放得對，有道理，確實十二個副總理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

2. 攻擊肅反運動。他說：“肅反運動‘逼迫’‘輕信口供’‘主觀臆斷’‘不實事求是’‘搞左了’”，“造成不少冤案”。

3. 寬縱和放掉反、壞分子。他在肅反中親自放掉反、壞分子十四人，並規定“對反革命分子作結論，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要更加寬大處理，能教書的都放回去教書”，“普通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只要鬥過、搜查過，都要賠禮道歉。”特別在鳴放時，他曾指使右派分子倪淵正寫信給反革命分子李瑞珠（右派分子李銳之兄）賠禮道歉，煽動其反攻翻案向黨進攻。對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分子李傳鼎關懷備至，派幹部陪其家屬上墳、立石碑，發給其家屬‘撫恤’費七十余元。

4. 反对党的领导，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他说：“工农干部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没有理论，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他在干部中进行私人拉拢，封官许愿，并提拔重用反革命分子陈肯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张越。

5. 歪曲和污蔑党的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他在安庆市工作时对工业建设提出：要‘抱守残缺’，“维持住烂摊子就行了”，指示新华布厂“要搞少，搞小，搞了”。在干部中散布说：“现在农村不如以前，才真是当牛马，农民普遍没有钱用，春天吃盐菜，夏天吃南瓜，天天打长工，落得两手空。”

6. 抗日时期反对对汉奸实行镇压政策。他说：“地主老财当汉奸是我们政策‘左’了，硬逼着他当汉奸的”，主张团结汉奸，减轻地主老财负担。解放后庇护其汉奸父亲，接来奉养，并骗取了选民资格。

7. 品质恶劣。抗日时他不顾敌情紧张，天天谈情说爱，说：“不管顽固军反共派如何猖狂，每天只要有女人睡觉就行了”，并用流氓手段猥亵过女干部。一九四五年曾因与地主女儿搞腐化，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三个月又恢复其党籍）。

综上所述，李微反党罪行实属严重，已完全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而在斗争中态度也很坏，最后在事实面前被迫认罪。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请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微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程明遠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程明遠，男，五十九歲，安徽肥西縣人，貧農出身，手工業工人成份。一九二七年參加共產黨，一九三二年被捕（在獄中發表過反黨宣言），一九三七年重新入黨。歷任縣委書記、中心縣委副書記、清江匯通鹽號經理、地委書記、行署農林處處長、華東農林部林業總局局長、安徽省水利廳副廳長等職。現任省林業廳副廳長及黨組書記。

其主要反動言行

1. 一貫與黨离心离德。污蔑黨對他不信任，把他當‘皮球幹部’，利用他，限制他；他認為黨不好處理他，而是有意在“三反”、“肅反”中搞他；他還惡毒地污蔑黨對老幹部有兩個辦法：一是朱洪武火燒獨角樓的辦法，一是李世民養起來的辦法。
2. 攻擊和污蔑各項運動。他捏造說：“鎮反時，含山縣殺人殺多了，超過比例，殺的人沒有名堂按，就按到‘其他’這類。”“三反時省委硬性交代各地老虎任務，造成各地亂打一氣，蕪湖地委打死一千多人都是冤枉。”他又叫囂“肅反錯誤很大，得不償失。”並惡毒污蔑說“省委在肅反時準備三千五百人成立勞教指揮部，把沒有問題的人都想搞去湊數。”又說：“搞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搞運動的都是在黨內有后台的，黨內有一批人專靠搞小情報吃飯的。”
3. 攻擊省委領導，破壞黨的團結。他惡毒地污蔑說：“有些

领导人不如曹丕，”“三反时处理宣济民（三反贪污分子，现为右派）是冤案。”又说：“省委有无为派、路西派、路东派、苏北派、太行派，大别山派现在吃不开，倒霉了。”省党代会选举时不到会表示抵抗，选举后，他对几个省委负责同志进行恶毒的污蔑、诽谤。

4. 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生产改革。他叫嚣：“合作化搞快了”，“三改行不通”，“一九五六年灾害是双季稻造成的”，“现在农村饿的投水的投水，上吊的上吊，暴动的暴动，抢粮的抢粮。”

5. 组织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曾召集肃反被审查对象汪制均（副厅长，现为右派）、胡贡球（黄山林校校长，现为右派）、王文正（合肥林校校长，现为右派）、俞梦平（副处长，现为右派）、刘东屏（副处长，坏分子）等人开会讨论反对林业厅肃反总结。他又经常地集聚郭崇毅、陶秉哲（均系反革命分子，现已捕）、徐晓天（叛变分子）、胡磊（坏分子）、宣醒民（现为右派）等人在一起议论攻击肃反运动和肃反领导人员，丑化积极分子。他还暗地指使宣济民、刘东屏等人在党的‘八大’开会前向中央诬告省委负责同志，蓄意搞垮省委核心领导。

综上所述，程明远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严重，已堕落成党内右派分子。经斗争，虽交代了一些反动言行，但仍避重就轻，态度很不老实。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请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汪制均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汪制均，男，四十一歲，安徽肥東縣人，貧農出身，農民成份。一九三九年參加工作，同年入黨。參加革命前，一九三六年在偽警團當兵，一九三七年被日寇打垮回家，一九三八年參加封建武裝紅槍會當教練。入伍後，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參謀長、科長、處長等職。現任林業廳副廳長。

其主要反動言行如下

1. 攻擊肅反運動，污蔑肅反領導人員和積極分子。汪因在肅反中被審查，即對黨仇恨，他說：“不能拿全國和全省肅反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公式來套林業廳的肅反工作。”右派分子攻擊肅反對象住招待所反省是違犯憲法，他贊同說：“招待所不是調幹部用的，是關人的，不好解釋。”污蔑林業廳肅反領導人是“復興社分子，”利用“復興社分子”搞好人，是宗派鬥爭。並與右派分子程明遠（原林業廳副廳長）等人糾結在一起計議推翻林業廳肅反總結。

2. 與右派分子程明遠兩人為首，拉攏歷史上有問題的和對黨對領導不滿的人，在林業廳內結成反黨宗派集團。他平時對幹部採取拉攏一部分，打擊一部分，對他好的就加以重用，不好的就打擊排擠。肅反後，他負責廳里工作期間，利用職權，與程明遠有計劃地排斥肅反骨幹。而肅反對象胡貢球、俞夢平（現均為右派分子）勞教釋放後，廳領導上要將他們調出，他不同意調，把

他們留在厅里，攻击肃反领导同志。整風开始，他与程明远商討好，将其反党助手王文正（肃反对象，現为右派）安排为整風办公室主任，上級組織派人参加該厅整風办公室工作，他採取抗拒态度。

3. 鳴放时，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同情庇护右派分子。他在主持厅內鳴放座談会上，贊揚郭崇毅（原副处长，現查明是反革命分子，已捕）的反动言論，並煽动說：“只有郭崇毅一个人提的尖銳，又大，又深刻，其他人都是提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当組織上划郭崇毅、陶秉哲为右派分子（均系反革命分子，現已捕），他为其辯护說：“郭只是对双季稻有意見，並無坏意，”上級决定要他发动群众对郭等开展斗争，他拒不执行。

4. 重用反、坏分子，鼓动坏分子无理取鬧。他不經厅领导研究，擅自提拔肃反中被审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徐連江（現已捕）任林业厅大別山研究站站长，鼓动坏分子盛誠（已开除劳教）与机关无理取鬧。

根据上述材料，說明汪制均已墮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在斗争中态度也不老实，交代問題避重就輕。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並报請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江誠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江誠，男，四十六岁，安徽省廬江县人，中农出身，自由职业成份。参加革命前，曾任塾师三年，小学教师一年、伪保长一

年。一九三八年八月参加工作，同年参加党。历任工作团员、区
员、区长、情报站长、区委书记、县委部长、副书记、书记、市
工会主席、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现任省劳动局长（党组书
记）。

其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1. 反对党的领导。他把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污蔑为“以党代
政”“干涉太多”，主张把党和政府“统一”起来，解决“政府
无事干，党委事情多”问题。他又说：“党主要是从方针、政策
上来领导，对于部门业务谁有能力就叫谁干”。他污蔑党委专
断，说：“如果持有和党委不同看法，往往容易遭受批评和打
击”。他恶毒攻击省委说：“党内亦有‘墙’，要拆‘墙’应从
省委拆起”。

2. 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
销。他说：“党委把成绩估计过大”“我总觉得工作上缺点讲得
越多些，越舒服些”“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已变成一
种公式”。他歪曲事实说：“农业社问题多，是因为搞快了，搞
大了”“统购统销把老百姓、商人都统死了”“农民太苦了，粮
食不够吃，‘三定’有问题”，叫嚣农民生活不如过去，“现在
连稀饭也吃不上”。

3. 鸣放中到处点火，煽动别人向党进攻。他除在言论上称赞
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反党谬论外，还煽动对领导有意见的
人‘趁机会放’，他写信给右派分子张竺（原省物资局副局长）
和张伯鐸（原农业厅粮食生产局长）说：“现在已整风了，真正
的内心话似乎报纸上发表不多，我们这些靠党吃饭的……一下要
拿出真实的东西是困难的”。同时，他又鼓励机关内的叛变分子
黄安才等向党进攻。

4. 一贯敌视党的各项政治运动。他说一九四二年整风‘是坑
人’，把一九四七年淮海土改斗争地主和镇压恶霸说成是‘乱打

乱杀’，說：“三反冤枉了很多好人”，叫囂“一九五五年肃反‘打击面寬了’‘搞糟了’，把人搞的‘不敢来往’”。他还責令肃反幹部向叛变分子賠礼道歉，擅自改变案件性質，強調对反、坏分子要“一視同仁”，並說：“他們（反、坏分子）在政治上已經吃了苦，在經濟上应照顧一点”，因而，机关內五个反、坏分子在他庇护下，得到了提职、提級。

5.平时工作消極，名位思想严重，生活腐化墮落，曾多次玩弄女性。

綜上所述，江誠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情节是严重的，已墮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本委研究决定，並报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江誠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鶴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云鶴，男，六十五岁，安徽金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参加党。历任支队副司令、特派員、副官处长、省委書記、省委特派員、中心县委書記、特委書記、紅二十七軍司令員、市委書記、一九三三年在山东日照任中心县委書記时，被捕判徒刑五年，一九三七年由柏文蔚保释后，历任中心县委書記、地委書記、华东联络部第二工委書記、皖北行署副主任兼区党委統战部长、省委統战部副部长等职。現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員。

其主要反动言行

1、在大鳴大放期間，同情並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省政协机关批判章伯鈞、罗隆基的反党謬論时，他为章、罗辯护說“他們不是处心积虑的”，“不能肯定他們有阴謀”。右派分子张东野恶毒攻击“共产党沒有人情味”，他說“张东野的話是有道理的”。又說：“张东野的話不是攻击我們”。当左派王任之等反击右派言行时，他深为不滿，並阻挠焦鳴鑾反击右派。

2、他經常散布反对党的根本路綫的謬論。他常說：“中国的問題，首先是农业問題，而不是工业”。“中国是农业国，安徽是农业区，應該先农后工，不然就要犯錯誤”。他誣蔑安徽省的农业合作化“搞的太大太快了”；初級社升高級社是“盲目的不从客觀实际出發，而以主觀願望出發”。他反对粮食統購統銷，說：“党内外都有不滿情緒”。

3、一貫反对省委推行农业“三改”的正确措施。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到处搜集农村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省委，誣蔑“双季稻搞坏了”，淮北搞稻改是“庸人自扰之”，三改增产“事实上並不如此”，“农村幹部报喜不报憂，省委对災情沒有及时拿出办法来”。

4、他长期存在对党不滿和对抗情緒，誹謗省委負責同志，並誣蔑“党内也有世态炎涼”。

5、历史上曾向敌人自首，写过拥护三民主义的反动文章。

根据上述材料，說明李云鶴已墮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在斗争时，开始态度狡賴，經過多次批判，最后才表示底头認罪。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机关支部大会討論决定並報經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鶴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張笠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張笠，男，四十八歲，安徽太湖縣人，惡霸地主家庭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入黨，一九四零年入伍。歷任縣府秘書、科長、黨訓班政指，縣委宣傳部長、副書記、旅政治部科長、后勤處長、縣委書記、校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長、副書記。現任省物資供應局副局長。

張笠反黨反社會主義主要言行及嚴重違法亂紀的事實如下：

1、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他任滁縣地委副書記時，說滁縣專區農業合作化運動“帶有几分冒險性，如再勉強躍進一步，就有跌傷的危險”。在糧食統購問題上，他公開叫嚷：“口糧標準過低，農民不夠吃的”。

2、攻擊省委領導。他污蔑我省公布的糧食增產數字不實，並且有意找缺點，抹殺“三改”成績。去年春天，省委號召機關幹部借款支援農業社生產，他乘機捏造事實，公開指責省委。他對省委發下的農村購買力增長調查數字不滿，說：“沒有這麼高，不能替他當喇叭筒子，作宣傳員”。

3、挑撥農民與黨和政府之間關係。他曾引用北宋張俞的蠶婦詩“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來污蔑今天城鄉人民之間關係。他誣蔑我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同封建統治階級一樣，說什麼“大幹部穿呢衣，中級幹部穿呷嘰，一般幹部穿綾呢，農民穿個破蓆衣，迎風吹來變成翻毛鷄”，並在他所聯繫的農業社幹部會上公開煽動說：“要減輕農民負擔”。

4、鳴放期間，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呼一應瘋狂地向黨進攻，並對局內右派分子進行包庇。右派分子江誠（原省勞動局局長）給他信中充滿反黨論調，他表示同情。右派分子王曉農（原物資供應局代處長）叫嚷：“農村工作搞的這麼糟，這樣下去不得了，農民要革我們的命！”他點頭贊同。當王曉農誣蔑和否認我省工業建設成就時，他公開支持王說：“工業工作搞的這樣，工業廳還有人當上部長呢！”王被劃為右派分子，他把黨內討論王的情況洩露給王曉農，並千方百計地對王進行庇護，說：“王的反黨材料不確實，領導上有個人情緒”，又在全局幹部中進行活動，說“王是思想錯誤，不能一棍子打死”，直至王曉農已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後，他還在大會上当着王曉農的面說：“王不是右派分子”。

5、品質極端惡劣。他在參加工作前即經常有姦淫的惡劣行為，入伍後，仍然常犯。一九四九年他欺騙組織未和原妻離婚就與白雁同志結婚，不久又和白雁鬧離婚，法院尚未判決又誘姦未滿十六歲的幼女武立云，組織上為此曾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並責令他與武斷絕關係。他表面上作了檢討，但又瞞着省委組織部與武立云結了婚。一九五七年春節期間，他又和武立云的姐姐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組織上責令他檢討，他認為組織對他太苛刻了，竟以打報告要求退黨、退職手段對黨進行威脅。

從上述材料說明，張笠由於出身反動惡霸地主階級剝削家庭，雖參加革命受黨的教育近二十年，但他沒有自覺地進行自我改造，仍然充滿着資產階級剝削思想意識和堅持反黨的階級立場，以至最後墮落成為黨內的右派分子。為純潔黨的組織，經本委研究決定並報省委批准，開除右派分子張笠的黨籍。

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永锡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

郭永锡，男，四十七岁，肖县人。富农出身，富农成份，一九四零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原任地委副书记。

郭永锡参加工作以来，一贯坚持富农立场，反对党，反对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措施。

(1) 利用职权，反对合作化运动。一九五三年原宿县地委试办了十个农业社，郭当时大叫办社是“盲目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同年秋他又在地委扩大会上提出“要普遍地贯彻十大自由政策，保障私有制”，灵璧县委试办了十多个农业社，他也说是“冒进”，要县委解散。一九五四年春他主持召开各县农工部长会议，在会上说：“自发社不是好现象，要立即解散”，在他直接布置下，解散了许多合乎条件的自发社。一九五五年春，五河县试办了二百多个农业社，即将试办成功，郭勒令该县解散。一九五六年八月他在宿县区书会议上污蔑说“合作化后，衣、食、住、行四个字，连一个字也未搞好”。污蔑合作化搞糟了，没有一个社增产，污蔑社干部比过去地主、土匪还厉害。

(2) 反对和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宿县区书会议上，他把农村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说成是“目前农村混乱的焦点是衣、食、住、行问题，特别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并又提出：公粮不征交国库，由社保管，付给保管费，农业社缺种子，就地贷给；社员没有粮吃，要吃种子，可把国库粮给他们

吃，种子算我們的，只轉个眼。在郭的指导下，动用了国庫粮九、二二五、一七九斤。一九五七年宿县报总产量四亿七千八百万斤（实收四亿八）。郭硬說只能收四亿斤，並批評县委“要假面子”，同年春他硬要碭山县委給隴海社增加供应七万多斤粮食。他利用职权索取隴海社員粮票四百多斤，又从肖县黄口鎮买了二、三十斤馍带回机关吃。並竭力反对牲畜飼料标准，說“小驢三个月可留四十斤料，簡直是胡鬧，是剝驢政策”，宿县“三八”社一头牛一天喂一斤飼料，他也說是“剝牛政策”責令社幹增加为一天三斤。

（3）反对农业生产改革。对待省委生产改革指示阳奉阴违，消極对抗。一九五六年在宿、灵、泗、碭四县区書會議上討論秋季馬鈴薯問題时，郭煽动說：“馬鈴薯這個問題我不敢講，省委叫种就种，种下去不收断种也就怪不到我們了”。他还反对省委提出的在淮北挖塘打井的措施，反对扩大复种面积和棉花密植增产办法。經常說：“再扩大也沒有留晒垡上算……我們这些同志就象沒有脑子似的！”並强迫宿县“三八”社犁掉災后补种的豆子八十多亩，紅芋三十多亩，造成很大損失。一九五六年七月他还召开电话會議布置各地种旱直播水稻，仅灵璧等四县統計，即浪費稻种八百多万斤。

（4）严重违反党的政策。怀远改造落后乡，在其指导下，竟將貧农、中农錯划为地主、富农計二千三百八十五戶，占全县补划地主、富农的百分之八十三。並錯誤的决定“追分散”，致發生严重的违法乱紀。由于追分散而遭受各种肉刑的一千一百七十戶一千四百七十二人。自縊身死的三十三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三人，打伤四十二人，被打不敢回家的四十三人，严重的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緒，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郭竭力掩盖自己錯誤，还对反映情况的鐘鼎山同志打击报复。

（5）一貫抗拒組織，反对党的領導，破坏党的团結。一九五一年任碭山县委副書記时，在鎮反和土改运动中，屡次反对和

拒不执行原宿县地委的決議，以致造成严重的违反政府。在任地委副書記时，他又污蔑省委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增产数字是“吹牛”，还在一次幹部會議上罵共產黨員“說的是天官賜福，做的男盜女娼”。早在一九四三年任乡长时就反对区書張世瑞同志，一九四八年任宿东县委組織部長时，反对县委副書記代世雅同志，一九四九年在銅县罵县書石立同志“象狗熊一样”。处处吹噓自己，打击別人。另外还长期隱瞞富农成分。

郭永錫的富农本質，在参加革命后，虽經較长时期的革命教育，但並沒有得到改造，一貫坚持富农立場，他是一个披着“工农幹部”外衣混入党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是党内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报請省委批准，决定开除郭永錫党籍。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 罗霞光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罗霞光，男，47岁，山东省館陶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3月入伍，1938年4月入党。历任教导員、武委会主任、团參謀长、局长、市委組織部長、代市长、市委副書記等职。現任市委第二書記兼監委書記。

据揭發証明，罗霞光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帥，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 篡改肃反方針、政策，寬縱大批反、坏分子

罗霞光在肃反工作中，伙同王荣华等反党分子，除忠实执行

李世农的“宁右勿左”，“宁漏勿错”，“只要从宽，不要从严”的反动方针外，还制造各种谬论，宽纵大批反、坏分子。

1. 他与王荣华一味主张“和平谈判”，竭力取消小组斗争。他规定：不能肯定反革命性质的不斗；问题不明显、未掌握一、二条人命的不斗。他说：“小组斗争阶段不走也可以”，小组斗争“一味施加压力，表面上轰轰烈烈，结果是逼供或冤枉好人”，并造谣说特务分子马野林的案子“假了”。

2. 他百般阻挠和破坏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案斗争，并与王荣华在1956年上半年一次就砍去正在审查的专案对象305名（现已定为反、坏分子的57名，其余正在专案复查）。

3. 在对反、坏分子的定案处理中，他除同意李淡云为反、坏分子开脱罪责的谬论外，还把杀害我四名地下工作人员的特务分子，说成是“材料不明确，要查查敌人的佈告”，不予逮捕；把特务分子破坏合作社，说成是“有时不服从社长领导”；把地主倒算，说成是“自私自利”；把反革命分子进行现行破坏活动，说成是“由于没有解决职业造成的”。他还要肃反干部审查材料要有“否定一切的精神”，“要设身处地的为人家（反、坏分子）想一想”。据初步统计，由于他的罪恶活动的结果，在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中共宽纵了反、坏分子658名，其中他亲自宽纵的反、坏分子103名。

4. 他在北京高级党校鸣放时，诬蔑肃反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说这是“中央规定5%的比例”和省委反右领导造成的。

5. 他公开声称：“凡是经过斗争未定为反革命的都算斗错，罪责礼道歉”，并威胁干部说：“你们若思想不通，就是党性不强，斗不通，换换班子，看你们通不通”。他还诬蔑“招待所控制太死太严，比拘留所还厉害”。

(二) 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破坏工业建設

1. 罗霞光到蚌埠以来，不仅不圍繞工业生产中心安排和佈置工作，还公然提出蚌埠应“工、商、郊（农业）”三大任务同时並进。1956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貫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他与王荣华、杜宏本、史坚、李斌、吴正等竭力反对市委这一正确措施，罗公然提出“改造是主要問題”，以此来反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並在背后大肆攻击市委“工业抓的多了”。

2. 他与史坚經常以市委“不重視监察工作”为借口，煽动监察幹部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他对监委机关右派集团画市委“头頂工交部”的反党漫画，也表示贊同。

3. 他与杜宏本反对蛋厂和鞋厂的兴建、扩建，他还責令已动工的鞋厂停工；在防汛期間，他又利用职权，硬要扒掉船厂的主要厂房及水厂的矾池。

(三) 反对农业合作化，破坏統購統銷政策

1. 他与杜宏本一起誣蔑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說农业合作化是“轟起来的，不好巩固”，是“冒进”。他还攻击郊区增产规划“是硬向上吹的，根本不能实现”。

2. 他反对党对合作化的领导，說：“那个乡的党员多，那个乡的合作社就办不好”。

3. 他說：“粮食不够吃是普遍存在的題題”，“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粮食吃”，“我路过邯郸，如果遇不到熟人，連飯都吃不到”。今年三月，郊区正处在生产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大辯論之际，他却亲去郊区佈置連夜普查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大拨救济粮款，不仅破坏了春耕生产，而且支持了地、富、反、坏分子攻击統購統銷政策。

此外，他还反对在郊区种馬鈴薯等高产作物，破坏农业“三

改”，並竭力反对省、市委补种晚秋作物的指示。

（四）反对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罗霞光否定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必要性，說資本家“五反后坏的少了，一、二年就变成工人阶级了”，“資本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两面性，現在屈服了，軟弱了，95%以上的資本家都是好人，不論什么样的資本家都有積極性”，合营后資本家和我们“成了一家人了”可以不分彼此了”，甚至吹嘘資本家“大公无私”，說共产党员还有“本位主义”，职工不如資本家表現好，“第一个报喜的是資本家”。

2. 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共同篡改私改方針政策。在清产核資中，他們把在賬的生产資料划为生活資料，不予登記；对财产估价是尽量高估；把不法資本家抽逃的資金作为增資处理，他說：“資金本来就是資本家的，抽逃一点是难免的”，並主張依靠資本家进行清产核資工作。在人事安排上，他說：“安排資本家条件要低，提拔职工条件要高”。在此借口下，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只安排資本家，不考虑职工的安排和提拔，甚至将反、坏分子安排到領導职位上。据初步統計，他們安排反革命分子担任領導职务的就有10人。他反对党对合营企业的領導，公开污蔑“公方代表不尊重私方代表的权力，无会不罵，往往以謾罵代替批評”，“私方代表有职无权”。他还与王荣华、杜宏本、胡春华、李斌共謀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並將一貫反对党的領導的資本家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在鳴放中，他又支持吳正將該厂的党员股长停职反省。

（五）篡改建党方針和幹部政策，包庇坏人坏事，培植反党势力

1. 他和王荣华忠实地执行了李世农“先整后建”的反动方針，並將“積極慎重”的建党方針，篡改为“大胆、積極而又慎

重”的反党方針。他取消黨員標準八項條件，使一些反、壞分子和政治不純分子得以混入黨內。他還和王榮華把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篡改為德才不備，他說：“無德可以培養，沒才可以鍛煉”，“只要有文化程度，就可以提拔”，“知識分子不提拔，養不住”，甚至不顧單位領導的反對，公開將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徐長帆（現已逮捕）調離原單位加以提拔。當他這些反動主張和做法遭到反對時，就威脅單位領導說：“你們不要怕人家頂了你的位置”，“你過去是幹什麼的？你才提拔了幾天？”僅據兩個單位的初步統計，在他親自排隊的一百名提拔對象中，就有反、壞分子和政治歷史有問題的26人，社會關係複雜及一貫落后的23人。

他還否定1954年整編成績，並責令有關單位硬行安插被整編掉的反、壞分子。

2.他一貫包庇壞人壞事，封官許願，培植反黨勢力。對一些對黨不滿分子，蛻化變質分子，自首叛變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甚至反、壞分子，他幾乎都加以收羅重用。右派分子張林志一貫對黨不滿，鬧地位，羅對他說：“你鬧什麼？還沒有你個區長幹嗎！”不久，就提張為區長。叛黨分子韓敏志，有嚴重罪惡，評級時鬧情緒，單位提出要處理，羅不但不處理，反將韓由20級提為18級。壞分子蔣學友，羅對其極為器重，一再將其提拔。蔣在肅反中，利用職權，奸污婦女，並在女方懷孕後，唆使打胎，被判刑後，羅仍對其關懷備至，批給蔣每月60元，加以照顧。史堅、李斌、李濃雲、胡春華、吳正以及監委機關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幾乎都是他 and 王榮華積極推薦和親手培植提拔起來的親信。為了培植親信，他還採用各種陰謀手段破壞組織原則，對犯錯誤的幹部多是百般庇護，甚至市委批評時，他也為之辯護，討好幹部，攏絡人心。他對忠誠於黨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則公開辱罵：“老幹部不如井崗山的騾子，騾子老了還能殺肉吃”。

3.他還和王榮華忠實地執行李世農關於處理自首叛變分子的

反动指示，将一些应清除出党的坏分子留在党内，造成某些党的組織不純。

(六) 反对党的領導，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 阴谋夺取市委領導权

罗霞光很早就有夺取市委領導权的野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与王荣华、史坚背着市委召开會議，搜集市委負責同志的所謂违紀材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並与史坚策划要将参加监委的市委常委錢序烈、刘曙两同志去掉，吸收反党分子张林志、王少衡为监委委員，企圖摆脱市委領導。他还到处刮阴風、点阴火，煽动幹部对党不滿，反对党的領導。他对监察幹部說：“监察工作可以不通过市委”；对政法幹部說：“宪法公佈了，以后案子不要找党委批了，依法办事好了”；对轉业幹部說：“地方党不如部队党热情”。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与王荣华、杜宏本、史坚等勾結在一起。經常散佈流言蜚語，攻击市委領導核心。他攻击市委“对肃反的領導是掛帅不出馬，虛綫領導”，並与王荣华向右派分子楊效椿告市委負責同志不重視肃反工作的黑状。他更恶毒地污蔑我們党是“上行下效”，“鋪张浪费是跟中央学的”。他們对党的領導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而他們之間却臭味相投，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杜宏本虛报党齡、伍齡，他和王荣华不仅不向市委汇报，反而向市委推荐杜为市委委員和市长。王荣华不服从組織調动以及史坚称市委为“人家”。均得到他的支持。他还与王荣华共謀为史坚翻案，企圖借以污蔑市委对史坚的正确斗争是“打击报复”，乘机搞垮市委領導。

(七) 竭力为史坚翻案，並支持她繼續向党进攻

1. 罗霞光与史坚很早以来关系就極不正常，他在北京學習时听说史坚有問題，就唯恐史的問題暴露后会現出自己的原形，因

此，从北京回来后，市委虽不止一次的将史坚指挥监委机关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反党活动向他作了詳細介紹，但他仍不顧党的忠告，与王荣华密謀为史翻案，並多次找史密談，暗示史拒絕交代反党罪行。談話时，史坚又訴苦又抱怨地說：“他們（指市委）說监委的人員思想混乱应由我負責，其实我怎么能負責呢？他們的言論又不是我叫他們講的！”罗当即支持說：“他們說的当然不能叫你負責，誰說的誰負責，大鳴大放嘛！”

2.他乘市委第一書記和多数委員到省开会之机，企圖通过合法手續放史过关，一面向陈岩同志（市委副書記）提出要研究史的性质，一面再次找史密談，告訴史：“家里市委委員連你才六、七个人，明天你在市委会上检查，你的問題总要市委做結論的”。会前，他也不通知在家的几个市委委員，企圖仓促开会，使大家措手不及，将史放过关去。史得到了他的支持，在次日罗主持的市委會議上不仅不老实地交代問題，反而繼續向党进攻，引起到会同志極大义憤，而罗却在會議結束时，客客气气的对史說：“差不多了，今天大家提的意見很多，希望史坚同志好好的考虑一下”。会后，他还欺騙王宇同志（市委第一書記）說：“史坚的检查有了进步”。

3.今年3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議向史坚开展斗争，史的态度仍極端恶劣。罗不仅不支持同志們对史的斗争，並一再称史为“同志”。会后，他又找史談話，說：“你不能認為怎样检查才能适合大家的要求，大家有大家的分析，你还是自己考虑”，暗示史坚拒絕交代反党罪行。

4.在成立专案小組时，他爭着由他負責，但他領導专案小組后，却按兵不动，拖延斗争，更換专案人員，調来不熟悉情况的同志整理史的材料，並一再強調：“整理材料不要分析批判，不要加帽子，还要加‘同志’”。在整理史的材料时，他不着重整理史攻击党的方針政策的罪行，反将史攻击市委領導核心的言論，不加分析、批判，不分是非的作为主要問題整理，企圖把

史猖狂向党进攻，說成是对个别领导同志有意见。

5. 党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大肆删改史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材料，把史坚反党集团材料上的“反党集团”四字和同谋反党的“同谋”两字划掉，並以“口径不符”为借口，把监委机关右派分子在史坚煽动下发表的反党言论及史坚的一贯表现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材料全部删去。

(八) 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包庇反革命亲属， 破坏反霸、土改运动

罗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当过伪县公安局长，在地方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罗始终未向组织交代，反而谎称其父是“一贯务农”，“拥护革命”，他家是劳动贫家。1945年反奸反霸斗争中，罗父被斗，他聞訊即連夜赶回，在斗争大会上威胁群众說：“种谷子吃米，种蒺藜扎脚”，吓得群众一个个离开会场，斗争会草草結束。1947年土改时，他家五大财产被沒收，他在区委负责同志面前咬牙切齿的辱罵刨他家枣树的积极分子說：“他媽的，奶奶个×的，刨我几棵要給我栽几棵，刨多粗的要給我栽多粗的，还要給我栽活”。这些罪恶，他不但沒有交代，反而污蔑村幹对他家“有成見”，把罪恶加到他家头上，並怨恨党组织对他家“不照顾”。

(九) 造伪历史、伪装朴素、欺騙組織、欺騙群众

他参加县委是1944年，却說是1941年。他的剝削思想極为严重，为了牟取錢財，曾于1946年向私商投資做生意；他有300元存款，却到处哭穷叫苦，經常騙取救济，仅1956年就四次騙取救济款达220元；他还侵吞公家派克金笔一支。他对党一贯不滿，多次拒絕組織分配的工作，在蚌埠税务局工作期間，因个人慾望未得滿足，竟公然發牢騷說：“不想幹革命工作了，要回家，已打过几次报告了”。

从上述材料說明：罗霞光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異己分子，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仍百般狡賴，甚至嫁禍于人，最后在鉄的事实面前才承認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並报省委批准，将罗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12級降为16級）。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 关于右派分子王荣华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王荣华，男，三十八岁，山东省沾化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四年二月入伍，历任幹事、区委科长、区書、市委科长、部长等职。現任市委副書記。

据揭發証明，王荣华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帥，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篡改党的肃反方針政策，忠实执行李世农的反党路綫，採取各种手段，寬縱了大批反、坏分子。

1.他忠实执行了李世农关于“必須具备一两条肯定反革命性質的材料，才能作为調查对象”，“調查經費平均每个肃反对象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元”的反动規定，限制对反、坏分子进行調查。他还批准史坚吸收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参加肃反領導工作。

2.他与罗霞光一味主张和平談判，竭力取消小組斗争，並与

李波云、史堅共同規定：歷史反革命沒有罪惡民憤的不斗；够反革命身份不够處理的不斗；現行反革命不斗；反動黨團骨幹不斗；醫院不斗；郊區不斗；中教一個不斗；小教盡量少斗。他還親自“創造”了取消小組鬥爭的“經驗”，李世農對此極為賞識，並在全省推廣。

3. 他以各種方法限制立案，規定：“立一案要保證定一案”，立案跟着定案走；“有重大反革命嫌懷的不立案”；“够反革命身份的，只作重點調查，不立案”，並與羅霞光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一次就砍掉了正在審查的專案對象三百零五名（現已定為反、壞分子的五十七名，其餘正在專案、復查）。

4. 在定案處理中，他除同意李波云、史堅為反革命分子開脫罪責的種種謬論外，還把罪惡昭彰的反革命分子說成是“時間已久，不能定為反革命”；把現行破壞活動說成是“行為不好，不是有意識破壞”，“有不滿情緒，是人民內部教育問題”；把反革命分子殺人、搶劫說成是“奉命執行”、“應盡的職責”；甚至把殺害我八位革命同志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說成是“在戰爭狀況下殺人不算罪惡”。他還說過，對不予起訴的反、壞分子保留領導職務和黨籍、團籍以及工會會籍，給予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擅自決定保留特務分子張建華的黨籍。

5. 在復查中，他只查“錯”，不查漏，還與史堅、李波云規定衡量肅反運動健康與否的標準是：只要鬥爭對象沒有意見，雖未查出反、壞分子，也是健康；雖查出反、壞分子，但被鬥人意見多，就是缺點和錯誤，強要各單位按此標準執行。他們還以種種借口，將送去勞教的反、壞分子下降為“好人”，要回重新安排工作。他不通過基層單位將反、壞分子下降為“好人”，並以掩蓋罪惡的手法，強迫基層單位按照他的反動指示，修改對反、壞分子的結論和處理意見，作為單位的意見上報。他積極為不應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反革命分子摘掉“帽子”。他將反革命分子高孟剛下降為“好人”，作為案例，在肅反幹部大會上宣佈，

要下边仿行。他还规定计件工资单位找肃反对象谈话，要按时计发工资，并与史坚、李浓云强迫肃反干部对被他们放掉的反、坏分子赔礼道歉。当干部反对他这种反动做法时，他就威胁干部说：“思想不通，把你们关起来，斗一斗，换换班子，看你们通不通”。

他还在一九五六年社会镇反复查时，支持李浓云篡改了省委第四次政法会议的决议，扩大复查范围，硬要下面按百分之二十的“框子”，检查“错案”。他还指派王少衡、张林志向犯人作“申诉权利”的报告和召开留用犯人座谈会，公开煽动犯人翻案。在他们的罪恶影响下，武装民警同犯人握手、敬礼，并召开“犯人积极分子”大会，给犯人戴大红花，同时，他们对犯人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

据初步统计，在他的罪恶指导下，宽纵的反、坏分子达五百零五名，其中他亲自宽纵的就有七十名。他在放掉了大批反、坏分子以后，还到处宣扬他所负责的第二、三批肃反运动搞得“好”，污蔑第一批肃反运动斗争面“太宽”，搞得“人人自危”，“付作用长期不能消除。”

二、反对省、市委反右指示。

一九五七年春，市委对政法部门的严重右倾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指示政法部门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王荣华不仅不执行市委指示，反而与李浓云多次密谈，指使李派人向市委要“案子办”，并要李召开会议，搜集反党材料，准备亲自到郊区作反驳市委指示的报告；同时，他又伙同史坚要市委在郊区三级干部会上大张旗鼓的处理干部违纪案件，并支持史坚派人收集干部的所谓违法乱纪材料，企图以此来转移对敌斗争的矛头，配合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干部，指向党，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省委反右指示下达后，他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他到处散布“蚌埠没有右倾”的谬论，并亲自召开政法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攻击市委批评政法部门右倾“有缺陷”，李浓

云等反党分子群起攻击省、市委反右指示“不符合事实”，是主观主义，並决定成立以张尧先为首的“七人調查組”，到郊区收集反党材料。会后，他还与李浓云分別授意张特別了解地、富、反、坏分子表現“好”的材料。在他們的授意下，张尧先把捏造的材料向他們汇报，說地、富、反、坏分子“老实”，“能幹”，“比农民还强”。王荣华認為得到了反党“根据”，責令张立即把材料整理好，准备到郊区作报告。为了把政法部門和监委机关的反党力量匯集在一起，他又指使史坚、李浓云于三月七日召开反党會議。会上，他們匯集了所收集的反党材料，恶毒地攻击省、市委反右指示是“乱喊乱叫”，“不符合具体情况”，污蔑幹部向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争是违法乱紀，公开叫囂要向市委“开展斗争”，要追查市委“責任”，並决定成立“联合检查组”，到郊区进一步搜集反党材料。这时，他們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在他們的縱容和派遣的“調查組”的煽动支持下，城西乡的地、富、反、坏分子組織与煽动落后群众鬧退社，破坏生产，搶劫农业社财产，包围乡政府，毆打幹部，抗繳公粮，气焰極为嚣张。在該乡的一百九十名地、富、反、坏分子中，进行反攻倒算、造謠破坏等罪恶活动的即达一百五十五名。

三、煽动和指揮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

1. 鳴放之初，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共同策划，利用教育、衛生、工商界鳴放座談会，进行煽風点火。会上，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他表示大力支持，並煽动說：“你們放的很好，园地虽小，砖瓦很多，要解决问题，就要靠大家斗，当然是大斗，今天到会的人少，回去还要发动‘群众’，一起来搞”。他还煽动有政治历史問題的人說：“有历史包袱的人顾虑大，历史問題是过去的事，我代表市委支持你們”，他还把“墙”和“沟”說成是党造成的，並煽动右派分子一起来“拆墙填沟”。

2. 当右派分子在鳴放座談会上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一面支持

李斌召开市人委党外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向党进攻；一面在监察工作会议上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倍加赞扬，並大肆攻击说：“文教系统座谈会的情绪很好，有激动流涕的，这反映我们党员脱离群众”，“不仅以党代政，现在又有以人代党”，与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右派分子吴振林贴出攻击粮食政策和市委書記、市长的大字报，他支持史坚派人去“調查”；以后吴正又乘整改之机，叫嚣要处理市委负责同志，他又积极支持。

3.在市政协会议期间，市委为了組織力量反击右派，提出休会，他与杜宏本、胡春华等竭力反对，主张把会议轉入选举，妄圖把右派分子捧上台。

4.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主张“和平談判”，不要斗争。他借口“右派分子排多了”，硬要各单位查“錯”。他把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說成是有“个人成見”；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說成是“思想問題”；並借口右派分子“年輕”、是“老干部”，把右派分子下降为“好人”。他把右派分子划为“中右”，作为案例，要下面仿行。他还散佈“反动言論的根源是三个主义”，右派分子有“两面性”等謬論。在他的罪恶指导下，寬縱了許多右派分子。

5.他包庇右派分子史坚，並为其翻案。大鳴大放中，他支持史坚向党进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說监委机关“沒有右派”，“都是思想問題”，並指使史坚佈置监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参加反右派斗争，以掩护退却。当史的反党面目暴露，停职反省时，他仍要史参加监委会議，与罗霞光密謀，为史坚翻案。他还与胡春华共同包庇右派分子林志仕。

四、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

他不仅不圍繞工业生产中心安排和佈置工作，还攻击市委“偏工业”，並在幹部中灌輸反对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思想，一九五六年市委決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貫徹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他与罗霞光、杜宏本、李震、吴正等不仅公开反

对，並在背后大肆攻击。他还利用分管組織部門的职权，拒絕执行市委增設工业組織机构和配备幹部的决定。去年大鳴大放期間，他支持监委机关右派分子画市委“头頂工交部，怀抱办公室，手挽組宣部，財貿部扯着衣襟，监委被抛在一边”的反党漫画。他还乘整改之机，一面指揮李斌召开市人委科、局长以上幹部鳴放会，攻击党的方針政策；一面擅自召开市委科长以上幹部鳴放會議，带头攻击市委領導核心“工作乱，照顧全面工作不够”，在他的煽动下，吳正等也就一拥而上，攻击市委領導“光抓中心工作，顧此失彼”，妄圖再度掀起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反党高潮。

五、反对党的領導，破坏党的团结和統一，阴谋夺取市委領導权。

王荣华窃取市委領導权的野心是很早就有的。在他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长期間，即公开宣称“組織部比別的部重要”，“組織部的幹部比別的部幹部高”。在他任市委副書記期間，又不止一次地煽动幹部反对市委。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杜宏本向王宇同志推荐他任市委第一書記，並將推荐情况告訴他，他極為得意，此后，更到处抓权，打击別的書記，炫耀自己，工作中常常摆出第一書記的架子。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与罗霞光、杜宏本、史坚、吳正等勾結在一起，經常散佈流言蜚語，攻击市委領導核心，他污蔑市委工作“乱得很”，“全市什么工作搞好了？！”去年大鳴大放中，右派分子攻击市委領導核心，他極為得意，並加以支持。他与罗霞光、史坚背着市委召开會議，收集市委負責同志的所謂違紀材料；一九五六年，又与罗霞光向楊效椿告市委負責同志的黑状，企圖搞垮市委領導。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經常与罗霞光、杜宏本等互相吹嘘捧場，以扩大影响，騙取群众信任。杜宏本謊报党龄、伍龄，他和罗霞光不但不向市委回报，还向市委推荐杜为市委委員和市

长。他还多方設法培植亲信，扩充反党势力，对一些政治不純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自首变节分子，阶级異己分子，甚至反、坏分子，他几乎都視為知己，加以重用。杜宏本、李浓云、史坚、胡春华、吳正、李斌等参加市委，担任要职，都是他和罗霞光竭力推荐的。他把一贯反党的郭华提为市妇联副主任，並准备将其提为副市长；他把反党分子张尧先提为市委政法部科长，还准备将其提为公安局副局长；监委机关右派集团的成員几乎全是他和罗霞光、史坚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为了培植亲信，他还到处封官許願，私送級別，腐蝕幹部。他对审幹幹部說：“我了解你們，提职不好提，可以晉級”；对肃反幹部說：“肃反工作结束后，你們不願回原单位，可以調动工作或調去学习”；对組織部幹部說：“我們也来个大胆大量提拔，大家都提一級，皆大欢喜”。当某些幹部由于他的許願未兌現而表示不滿时，他即說：“我在市委會議上已提过了”，煽动幹部反对市委。

此外，他还反对党对合营企业和学校的領導。私改高潮后，他和罗霞光、杜宏本、胡春华、李斌共謀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把一贯反对党的領導的資本家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在大鳴大放中，該厂的右派分子叫囂“要把公方代表送去劳改”，並捏造事实陷害黨員股长，他支持吳正将黨員股长停职反省，並亲到該厂參觀大字报，表示支持。杜（仲和）孟（子厚）反党联盟阴谋赶走黨員校长，夺取党在学校的領導权，他伙同胡春华極力支持，共謀要把黨員校长刘华同志調出一中。

六、篡改建党方針和幹部政策，污蔑党群組織。

1. 他和罗霞光忠实执行李世农“先整后建”的反党方針，並將中央“積極慎重”的建党方針，篡改为“大胆、積極而慎重”的反动方針。他們还忠实执行李世农关于处理自首变节分子的反动指示，把一些应清除出党的坏分子留在党内，将叛徒重新拉入党内，造成党的組織不純。他还修改审幹結論，将潘厚清“叛变分子”的結論，改为“自首分子”。

2.他和罗霞光篡改“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他說：“什么称职不称职，提起来就能用”。他污蔑我們提拔干部有“宗派主义，党员考虑多，非党员考虑少”。他还公开辱骂老干部“佔着茅厕不拉屎”，說：“井崗山的驢子老，还照馱大炮”。

3.他污蔑党、群組織，說：“国民党組織部和我們組織部一样，是个特务机关”，“工会、青年团要不要都可以，就是关几个月的大門也出不了多大屁漏”，“机关工会就是多收几个会費，沒有作用”。

七、一貫坚持剝削階級立場，破坏党的政治运动，貪生怕死，品質恶劣。

1.他出身于恶霸地主汉奸家庭，卻一貫欺騙組織，謊报中农出身。

2.一九四六年土改时，他指使家庭分散土地，逃避了群众斗争。在反奸斗争中，他污蔑运动“过火了”，竭力包庇其汉奸和恶霸地主的伯父和堂祖父。他反对群众对地主恶霸进行斗争，主张和平分田，他对“三查三整”运动也極表不滿，認為运动搞“左”了，“只整本地干部，不整外来干部”，“平时工作越积极，錯誤就越大，不工作的倒变成了积极分子”。

3.一九四二年环境艰苦时，他背着組織，做投机生意两年多，並为日寇包攬稅收。在反特斗争中，环境稍一紧张，他就貪生怕死，悲觀失望，大吃大喝。以上这些丑恶历史，他从未向党交待。

4.他的个人野心極为严重，对組織分配的工作，不能滿足其私慾时，就拒絕不去。他的品質極为恶劣，入城后，喜新厭旧，不顧党紀国法，竟在女方怀孕期間，誘逼离婚，后来，又利用职权，挖別人墙脚，与林放結婚。他还貪污派克鋼笔、手表等物。

綜合上述：王荣华是一个有严重反党罪行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态度極不老实，借檢討为名，繼續向党进攻，經過斗争，才被迫承認了他的反党罪行，但在某些关键問題

上，仍百般掩飾和狡辯，企圖減輕罪責。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經市委研究決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會通過，並報省委批准，將王划為右派分子，開除其黨籍，撤銷其原有職務，監督勞動。

中共蚌埠市委員會 關於右派分子杜宏本的處分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杜宏本，男，三十五歲，河北省宛平縣人，反動富農出身，學生成份。一九四〇年五月入伍，一九四一年一月入黨。歷任譯電員、科員、科長、局長、副市長等職。現任市委副書記兼市長。

據揭發證明，杜宏本是羅（霞光）王（榮華）杜（宏本）反黨聯盟的主帥，其主要反黨言行如下：

一、有組織有計劃地煽動和指揮右派分子瘋狂向党進攻，包庇右派分子，破壞反右派鬥爭。

1. 他與王榮華、胡春華共同策劃，利用召開教育、衛生、工商界鳴放座談會的機會，進行煽風點火。會上，他帶頭攻擊黨的很多工作都是“上了馬下不來”，“不符合實際”。右派分子在他的煽動下放了很多毒箭，他不僅竭力支持，並與右派分子一唱一和向党進攻。右派分子攻擊黨員校長“不懂業務”，是外行，他說：“是外行，有的要調動，有的就是要處理”；右派分子攻擊我們提拔和使用技術人員不當，他說：“提拔技術幹部應由技術人員來衡量”；右派分子攻擊我們宗派主義嚴重，他說：“宗派主義是很嚴重，不僅學校里有，到處都有”；右派分子丑

化党、团员，他说：“党、团员问题很大，有的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进一步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还号召右派分子“要拿出干劲来”，“要大胆、勇敢、经常不断地进行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权利”。他还指使李斌在市人委召开党外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议，向党进攻。

2.在他们的煽动下，一小撮右派首脑更加猖狂，认为时机已到，在政协会上向党发动了总攻，他喜形于色，与右派分子拉拉扯扯，亲如兄弟，将自己的放大镜赠给极右分子杜仲和，卑躬屈膝的向极右分子陈天任请教，甚至以实际行动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

3.当引妖出洞时，他唯恐右派分子暴露面目，迟迟不在市人委作鸣放动员，相反对陈岩副书记去市人委动员鸣放，表示不满，并示意王瑞九等右派分子不要鸣放。市人委有些局长与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他指示李斌说：“要给他们漏点底”。他领导郊区鸣放时，对区、乡干部不仅不作鸣放动员，反暗示写大字报的同志“不要写走手”，企图破坏郊区鸣放。在市政协会议期间，市委要继续深入鸣放，他以“放的差不多了”为借口，与胡春华一起竭力反对。当市委为了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提出政协休会时，他和王荣华、胡春华又一再反对，妄图通过选举，把右派分子捧上台，并和胡春华在背后污蔑拥护市委正确主张的同志是“个人崇拜”。

4.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又寻找种种借口，为右派分子开脱罪责。如张立之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和党中央，他借口张“年轻、历史清白、是为了带头鸣放”，与李斌为其辩护，甚至与胡春华密谋为其翻案。他还把陈天任露骨的反动言论说成是“不明显”，当市委确定陈为斗争对象时，他说：“完全推想不一定好，我看不一定搞”，企图包庇陈过关。当陈的反动言论受到公开批判后，他仍指定陈担任在蚌埠召开的全省体育运动大会筹委会副主任。

二、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阴谋窃取市委领

導權。

1. 拒絕黨的領導。他任市商業局長時，與吳正一起公開攻擊“有商業黨委事情倒不好辦了”。他任市長後，污蔑市委“以黨代政”，說：“市委分口抓工作，市長要失業了”，並公開提出要撤銷市人委黨組，妄圖取消黨對政府的領導。

2. 為了竊取市委領導權，他攻擊市委“幹不出一個名堂來”，“不能解決問題”，並與羅霞光、王榮華、李斌、胡春華散佈流言蜚語污蔑市委領導核心。他們之間却互相吹捧，他吹噓羅霞光“思想品質好”，“能抓住主要工作”，向羅取寵。他又吹噓王榮華“掌握政策較穩”，甚至向市委推薦王榮華當第一書記，並將推薦情況告訴王，向王獻媚。

三、反對城市以工業生產為中心的方針。

1. 他公然主張以商業為中心，說什麼“我們市里主要是商業問題”。一九五六年市委決定在第九次黨代會上進一步貫徹城市以工業生產為中心的方針，他與羅霞光、王榮華、李斌等一起竭力反對，並公開提出“農業”和“改造”是主要問題，以此與黨的正確方針相對抗。他還公開煽動財貿幹部不要當“被告”，“不要洩氣”，“要主動將工業部門的軍”。李斌惡毒地攻擊市委“處理工商關係偏心”，“小公擠大公，地方擠中央”，他也竭力支持。

2. 他與羅霞光竭力阻撓和破壞工業建設，反對興建蛋廠和鞋廠。市委決定興建鋼鐵廠，他背後反對說：“這東西就是王政委興趣大”。他在市人委黨組會上，从不研究工業生產問題。他在分管財貿工作期間，不僅不圍繞工業生產中心佈置和安排工作，反而與李斌勾結在一起，利用職權，拒絕將地方財政收入投資於工業，阻撓對工業原料的供應，拒絕推銷地方工業產品。如他支持專賣公司使用放大鏡檢驗紙煙上的斑點，用手向左右各擰四十五度檢驗紙煙搭口，拒絕收購東海、蚌埠兩煙廠的產品，迫使兩廠將已制好的香煙撕碎重制，國家損失達一百六十多萬元。當市

委制止时，他又与李斌共同指使专卖公司江萍（右派分子）收集所謂質量不好的材料，並亲到烟摊專門收集“坏”的反映，攻击市委。他还公开主张将包銷改为選購。

四、污蔑和攻击农业合作化，破坏农业生产改革，取消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1. 他与罗霞光一起攻击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快了，他說：“沒有經過互助組，直接到了高級社，不好巩固”。他还污蔑合作化后，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大水冲走了”，並指示郊区幹部“退社可以掌握百分之五”。

2. 他在分管郊区工作期間，由于拒不貫徹农业“三改”指示，致使河北两乡的稻改面积，由一九五六年的六千五百亩縮減为二百五十七亩。他还支持城西乡的地主、富农反对种植高产作物，並批評乡幹佈置种玉米（高产作物）不对，以致造成旱田減收，稻田荒蕪三千余亩。

3. 他拒絕执行省、市委反右指示，阻撓幹部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争，並說：“不能採取这种措施，靠斗争不能解决問題”。

4. 他積極發展农村資本主义势力，支持农业社和社員开飯店、打麻繩、販賣生猪，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仅淮滨农业社做生意的即达三百五十余戶之多，造成部分生产队牛死、地荒、粮食減产。当时农村就編出了这样一首歌謠：“繩車一响，黄金万两，佳木斯走一趟，犁耙掛墙上，佳木斯走一走，吃穿不用愁”。

5. 非法取消粮食統購，擅自放宽粮食統銷，破坏粮食統購統銷政策。他对一九五七年統購任务不作分配，同年四、五月份，地、富、反、坏分子叫囂粮食不够吃，他不但不組織区、乡幹部發動群众开展斗争，反而增拨粮食三十四万斤，不分对象地扩大粮食供应面，以致造成部分社員瞒产私分，粮食黑市交易。

五、篡改私改政策，取消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竭力维护資

产阶级利益。

1. 他为资产阶级吹嘘说：“蚌埠市工商界根本找不到同意定息二十年的”，并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合营后职工与资本家的关系主要是合作共事关系”，对资本家“决不能开斗争会”。

2. 在清产核资中，他与罗霞光、胡春华一起将财产估价尽量高估，对一些应登记的财产不予登记，把高潮前查获的隐藏物资当作增资退还。

3. 在人事安排上，他与罗霞光、胡春华只安排资本家，不考虑对职工的安排和提拔，在棉布、百货等十五个合营总店的经理、副经理中，资本家有三十人，职工仅有三人，甚至把资本家中的一些反、坏分子也安排了领导职务，他说：“明天逮捕，今天也要安排”。据初步统计，被他们安排为领导职务的反革命分子有十人之多。

4. 反对公方代表制。他宣称：“没有公方代表也照样搞好工作”，并和罗霞光、王荣华、胡春华、李斌共谋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把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资本家何近仁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因此何更为嚣张，公开叫嚣“看谁斗过谁”，并与几个资本家同谋继续向党进攻，说：“非把几个党痞子赶出去不可”。此外，杜宏本还煽动资本家要“向国营企业开展斗争”。

六、放松市场管理，纵容不法奸商投机活动。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秋，郊区生猪被不法奸商抢购一千七百余头，一九五七年一、三季度查获贩卖粮票、布票及油料等统购统销物资八百十三起，他对这些违法行为，一再放任不管。他对奸商俞维模等乘市场元竹缺货，抬价出售，获得暴利一万余元的投机活动，也一再纵容，迟迟不予处理。

七、坚持反动立场，宽纵反、坏分子，包庇反动家庭，隐瞒历史，欺压组织。

1. 他利用职权，多方宽纵反、坏分子。如反革命分子韦霞

中，曾向敌人密报我地下党员严繼成同志，致严遭敌杀害。一九五四年韦被捕归案，杜竟以严“年輕，不可能是共产党员”，“是特务内部玩花样”等为借口，将韦犯释放，並責令原单位（邮局）安插工作，补發工資一千二百四十元。又如严重破坏粮食计划供应的魏庆华，检察院要提出公訴，而杜宏本却指示在群众中进行教育，不予起訴和判刑。

2. 他出身于反动富农家庭，其父参加过特务活动，他在土改前指使家庭卖地，当土改中家庭被扫地出門时，他污蔑“土改过火，幹部打击报复”。他参加土改复查工作时，給了地主、富农不少土地。

3. 虛报伍齡、党齡。他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入伍，說成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他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入党，說成是一九四〇年一月。

4. 他一貫热衷于个人名利，对組織分配的工作，不能滿足其私慾时，就表示不滿。

以上材料証明：杜宏本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仍避重就輕，态度很不老实，經過斗争才被迫承認反党，但在某些重大問題上，交待仍不徹底。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經市委研究決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並报省委批准，将杜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銷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合肥师范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张兆甲，曾用名赵明，男，现年37岁，河北省曲阳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1月参加工作，1939年8月入党。曾任村长、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县民教法副科长、专署文教科督学、副科长、科长、师专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张兆甲趁党整风之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事实如下：

(1) 勾结党内外右派分子，煽动群众闹大民主，恶意攻击教育厅。整风运动之前，张兆甲一贯散布攻击教育厅的言论，说：“既叫我当校长，又不信任我，事情真难办”；并造谣说：“教育厅把师专的基建材料拿到合肥师院去了”；“教育部拨给师专的款子给教育厅扣了”等，致使不少党团员和教职员受他影响，对教育厅怀有不满情绪。1957年4月省政协开会期间，张兆甲违背省委指示，指使沈兴芷（右派分子、民盟省委候补委员、师专支部主委）在政协会上，以师专经费困难问题攻击教育厅，污蔑教育厅不信任师专领导。1957年5月省委召开宣传会议，张提出：“我校和教育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谩骂教育厅是“外行”，“官僚主义思想指导”等，激发到会人员摆教育厅和师专的矛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教育厅。会后，又指使蔡善琦（党员）向沈兴芷找材料写稿，并亲自修改后投安徽日报。王尚英（党员、右派分子）发起写稿投光明日报，恶毒的攻击和谩骂教育厅张也知道，学校开始鸣放后，田建城（学生、右派分子）

貼大字報罵“共產黨一黨專政，共產黨不民主”。張兆甲說：“詞句有毛病，精神是好的”。6月3日批准王容、王順禧（助教）寫信要教育廳長來師專聽意見，發動教職員簽名。6月4日張兆甲帶着簽名信誑騙教育廳副廳長居蒼明同志到校挨鬥，並曾企圖誑騙省委負責同志到校未成。朱建華（黨員、右派分子）帶領學生去省委和教育廳請願，張不加阻止，張批准了右派學生組織的“呼呀委員會”印發呼呀書，還說：“大民主、小民主目的都是為了學校，在小民主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只有允許大民主”。造成學生罷課一天半。學生鬧事平息以後，6月8日第二次誑騙居蒼明同志來校參加職員座談會，坐視沈興芷謾罵教育廳達二小時之久。沈興芷劃為右派分子後，張兆甲怕暴露自己的反黨活動事實，便利用職權，以“爭取”沈興芷“起義”為名，阻礙鬥爭的開展，並採取兩面手法，一面向省委作假報告，欺騙領導，說：沈交代的好，一面謊說省委負責同志指示：對沈的鬥爭要“適可而止”。對於右派分子朱建華、王尙英等人，也一貫包庇，一直到省委派來檢查組以後，才把他們揭露出來。

（2）破壞黨內團結，製造黨內分裂。拉攏一部分人，陷害一部分人。張兆甲來到師專以後，作風極不正派，獨斷專行，封官許願，培植親信，曾二次提出要朱建華、王尙英參加黨委和整風領導小組，省委未批准，張兆甲則標新立異，個人批准朱建華、王尙英為“固定的列席黨委”。並曾企圖將沈興芷拉入黨內。另一方面，由於他和程宇、馬數鳴兩同志鬧不團結，乘反右派鬥爭機會，對右派分子吳孟復採取逼壓、提示的卑鄙手段，誘導吳孟復製造假案，誣稱以程宇同志為首組成反黨集團，誣稱馬數鳴同志是該反黨集團的幕後指揮人（反黨小集團問題已經省委派丁明志同志等調查，馬、程確有錯誤，但張故意夸大事實）。張又向省委謊報李運新（黨員助教）是叛黨分子。以上事實說明張兆甲打擊陷害同志的手段十分惡劣，性質十分嚴重。

張兆甲進行以上一系列的反黨活動，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

詞
飛
翔
生
活
：
思想根源的。1949年他由专署文教科督学被提升为副科长时，因未提为科长而表示不满意。1952年对評級也不滿意，竟撕掉評級通知单，后来提升一級仍不滿意，並說：“我是水漲船高，得寸进尺”。1949年南下后曾两次屯积大米、菜油做投机生意，自私自利从事牟利等。說明張兆甲虽然参加党已經18年，但沒有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不仅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相反地是一直滋长發展，由对党不滿，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根据以上張兆甲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情节極為严重，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損失。在党内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組織，經党委研究决定並經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張兆甲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右派分子夏际霞的結論意見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夏际霞，男，現年四十四岁，江苏省睢宁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同年七月入党。历任县委副书记、县委組織部长、地委幹部科长、組織部副部长、矿区党委組織部长、矿委农委書記、矿場党委書記兼矿长、矿务局副局长、局长。现任：中共淮南市委書記处書記、淮南矿务局长、安徽省人民代表、淮南市人民委员会委員。

一、主要反党罪行

1、一貫利用职权，在党内进行非組織活动，培植个人反党

势力，攻击市委领导核心。1956年秋工资改革期间，他为了煽动煤矿干部反对市委，故意违反中央工资改革政策，一手制定了普遍超过中央规定的工资改革方案，並擅自发放了科区以下干部的补发工资。当市委批评他的错误，和不同意他矿、处长以上干部的工资改革的错误方案时，他就施展其事先策划好的“市委不同意，我就有话说”的阴谋，污蔑市委对煤矿干部的工资是“死揪”、“硬压”，恶意造谣挑拨说：“地方干部工资比企业干部工资高了”，又说什么“干部工资收入提高了，我受批评了”，“只要工资提上来，受些批评也是好的，对大家有好处。”致在煤矿不少干部中造成“局长是想照顾我们的，就是市委不同意”的对党严重不满情绪。

2、以他为首组织反党集团，在1956年反党集团结成后，就伙同他的爪牙钱明道、韦潔滋用“黑头状子”这一卑鄙阴险的手段，捏造事实，連續八次向中央和省委诬告市委，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攻击市委领导。为使中央和省委所谓“加深印象”，相信他们所诬告的材料，他还有计划地指使其爪牙多次向省委负责同志口头“反映”，並两次密谋向中央政治局写信进行进一步诬告。

3、1957年夏，大放大鸣期间，他依仗着党外右派向党进攻的声势，暗设反党司令部，利用职权盗窃党的重要机密，指挥其爪牙大举向党进攻。嘱咐其爪牙们写攻击市委的大字报不要一次写很多，只要“一次写一张，多写几次”並要其爪牙不要亲自写，而指挥和煽动落后青年去写，说：“小青年火气大，只要有材料他们就会干”。“不管什么一起贴出去，反正他们（指市委）不能一一解释”。为了更好的指挥向党进攻，他亲自出马，搜集反党“材料”；与此同时，他还一手制造了煤矿建井公司工人闹事事件，煽动工人反对市委，並与钱明道密策唆使某坏分子去奸污市委组织部某负责同志的爱人，以人身攻击、政治陷害、双管齐下的卑鄙手段来中伤市委负责同志，妄图趁机将党搞臭搞垮，一

鼓夺取市委领导权。

4、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污蔑市委组织反击右派是“火烧到自己身上（指他的同伙污蔑市委的大字报）就痛了”，反右派斗争进入紧张阶段，他又千方百计地与其爪牙订立攻守同盟，积极组织退却，企图保存反党实力。当他在北戴河“休养”期间获悉钱明道已成右派时，便散布烟幕和进行污蔑说：“也不过是向领导提提意见，就成右派了吗？”“看市委将来怎么做结论。”在从北戴河回来的路上，以及在回到淮矿的当天，到处探听斗争钱明道的消息，妄想挽回残局，待机反扑。

5、曾数次按其反党意愿，与其爪牙、心复谋划调整煤矿负责干部，企图争取党内多数，篡夺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性质。

6、到处拉拢对党不满分子和落后分子，公开进行挑拨煽动，在市委和常委内部划圈圈，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对市委决议一贯采取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的两面手法，把矿务局当作他的独立王国，与党分庭抗礼。

7、敌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他诬蔑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劳动改造”，攻击国家税收是“苛捐杂税”；诽谤统购统销是“不让人民吃饱饭”。污蔑粮食出口政策是“做人情”“打肿脸充胖子”；并疯狂叫嚣“非再来一次革命不可”。他对封建帝王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极为向往，公然说：“到了北京想当皇帝，到了上海想当资本家”。他完全象资本家一样把工人当牛马看待，公开辱骂煤矿工人“下井象牛样，上井象马样，干活象猪样，开支象虎样。”，他平时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虐待子女，玩弄女性。

8、挑拨中苏关系，诽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谩骂苏共中央负责同志。

9、长期隐瞒反动富农成分，包庇富农家庭；先后将其有重大罪恶的胞弟（现当地政府已初步确定其为坏分子，准备处理）和族叔（已判过刑）拉进革命队伍来予以庇护。在解放战争紧张

关头，他身为县委副书记，竟贪生怕死，退却逃跑，並强令区乡幹部各自逃命，甚至公开提出可以投敌自首。

二、斗争中的态度

經過深入揭發和多次批判，在大量事实面前，虽然被迫承認了一些反党罪行，但在許多关键問題上吞吞吐吐，躲躲閃閃，避重就輕，推脫責任，无悔改誠意。

三、处理意見

右派分子夏际霞反党罪行是严重的，且在斗争中态度不好，但他对煤矿生产管理尚有一定能力，省委意見按三类处理：开除党籍，撤銷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待遇由 11 級降为 16 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尚实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薛尚实，男，五十六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間曾任江苏省委秘書处秘書，上海总工联党团書記，全总华北办事处党团書記等职。抗日战争期間曾任福建、浙江省委組織部长，阜东县县委書記，苏北区党委政工部长等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任苏北盐阜地委、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青島市委副書記等职。现任上海市委委員、同济大学校长、党委書記。他一貫摆老資格，目无組織，埋怨党沒有重用他，而对党不滿在同济大学工作期間，公然反抗党的領

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1) 攻击市委的领导是“饒漱石不管高等学校的余毒没有肃清”，“大家的积极性之所以不高，关键是由于领导一团糟”，“领导压制批评……一不理、二打击、三放冷箭”。攻击学校工作在“市委前学校工作部时期，有三大混乱，即组织混乱、思想混乱、政策混乱”。他並以極端猖狂的态度，抗拒中央高教部的领导，当高教部根据周总理指示派检查组到同济大学检查工作，他两次在建筑系召开党团员大会，动员他们“站稳立场，统一思想”来抗拒中央高教部的检查。

(2) 站在敌对立场，反对党的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否定历次运动的成就。他经常叫嚣“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不明确，糊里糊涂，我们无法工作”。攻击“三反是‘反三’——反党、反团、反校长”，“肃反没有政策，继续了三反时的左倾冒险”，“肃反问题很严重，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搞得笑话百出，党内混乱不堪。”在肃反运动开始时，领导强调要反右，而他却坚持反左，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又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肃反的同志“算账”。此外，他还污蔑党的工资政策，说：“助教的生活无法过，小孩害病无处看，……工友生活不下去了。”他还散布“英、法出兵打埃及是由于苏联出兵干涉匈牙利内政所引起的”等反动言论。

(3) 在鸣放期间，縱容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就积极主张要教授治校，並拟定了教授治校的具体方案（連人事处长、办公室主任都要资产阶级教授担任）。右派分子煽动罢考政治课和肃反对象向党反攻，要看肃反材料的时候，他都一概予以答应。当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反击右派分子对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的攻击时，他却公开加以阻挠说：“你们不要管，不会闹到速中门上来。”在他的縱容、包庇下，同济大学仅结构系、建筑系漏划的右派分子就有二十九名之多。

(4) 培植个人势力，进行宗派活动，分裂破坏党的团结。他在高教系统中拉拢对党不满分子，对抗党的领导。在学校中则拉拢刘淮、李强、馬毅民等一批政治上有问题、历史不清的分子结成小集团，打击和陷害那些“不顺手”、“合不来”，敢于批评他的人。經查明，因曾經对他提过意見，而被加以“反党”“反领导”“右派”“反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受到打击者即有十余人之多。在建党中把一些面目不清、品質恶劣、对党不满的分子拉到党内来培养个人势力。

他长期以来就借口血压高，到处游山逛水，在同济大学五年，实际只做了一年的工作，但經常打麻将牌、看黄色小說到深更半夜。政治上已經完全墮落变质。

上述大量事实証明，薛尚实是一个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經市委扩大會議高教小組等二十多次會議的斗争，在大量人証物証和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頑抗抵賴，並污蔑同志，态度十分恶劣。为了純潔巩固党的組織，决定开除薛尚实的党籍，並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工作，級別由八級降为十一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妇联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先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赵先，女，四十三岁，城市貧民出身，学生成份，自称一九三三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四年轉党。抗战前曾任溧阳共青团妇委負責人，上海左翼文化联盟工人夜校教师。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曾任上海临时妇委委員，华中局組織部幹事，一九四

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曾任华东局城工部組織科科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妇联組織部部长，妇联副主任、主任、妇委副書記、書記。

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 污蔑、反抗市委的领导，把妇联当成独立王国。一九五三年市委分工由赵明新同志联系妇联工作，赵先認為：“赵部长不信任我，不是我的老上级”。当黄庆熙同志分工联系妇联后，赵挑拨說是“大委員領導小委員”。一九五四年市委派楊純、关键同志去妇联工作，她說：“她們是党委信任的幹部，是来整我們的”，排挤、打击关键同志。一九五六年市委为了加强妇委的领导，派郭建同志担任妇委書記，她更加不滿，狂妄地說：“我这个書記还未撤职，妇委書記、妇联主任是中央管理的幹部，应由中央批准。”並擅自修改曹荻秋同志在“三八”节紀念会上的發言稿，将“市委为加强妇女工作，派郭建同志担任妇委書記”一句刪掉。当郭建同志传达柯庆施同志对妇女工作的指示时，她冷笑說：“嗨嗨，这三点指示很好啊！为什么历年来沒有向我指示过！”公开声称：“我与郭建无个人恩怨，我是借題發揮对市委的不滿。”一九五六年选举市委委員时，她公开向党伸手，想当市委委員，因未列入候选人名单，即挑拨、煽动妇联同志說：“妇联这么多老幹部，那个不能当市委委員，我看××就能当。”

(二) 包庇王尧山，进行反党活动，她对党审查王尧山（赵的丈夫）極為不滿，污蔑“市委对王不熟悉”，审查是“莫須有”的，她强辯說：“我与王尧山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我相信他政治上純潔和对党忠实，正如相信我自己一样。”並公开支持王尧山向党反攻。当陈不显同志严肃地指出她这种錯誤时，她非但不接受批評，反以极端狂妄的态度公然对抗。市委准备分配王尧山下厂工作，她說：“問題未解决，工作是做不好的。”公开支持王尧山抗拒組織的分配，要市委給王做結論和賠礼道歉。並挑拨

党内关系，煽动别人对党不满。妇联某同志的丈夫被审查，她就挑拨说：“你的爱人傻瓜，不会休息休息，没有结论不要去工作；审查没有问题，不该调动工作。”

赵先还到处喊冤告状，歪曲党内生活，攻击市委。在她一九五六年七月写给陈毅同志的“控告”信中说：“我最感痛苦的事情是因王尧山的关系政治上被打问了，政治上不保险……，一年多来在被人猜疑中过生活，我受不了。”又说：“此刻，我只有一个体会，党内谈民主仍旧不容易！”对党极为不满。

（三）攻击肃反运动，同情、支持反革命分子。肃反时她未参加专门小组，未做接待外宾工作，内心更加对党仇恨，责问：“为什么不要我参加专门小组”、“为什么忽然停止我对外的一切工作？”对肃反采取消极对抗，冷眼旁观的态度。潘汉年反革命案件揭露后，她认为肃反扩大化了，并说：“斯大林老头子，死了也要被人反”，污蔑妇联机关肃反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攻击肃反干部“有邀功思想”，叫嚣“肃反批判面广了，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分不清”，认为“反革命抓多了，反革命家属也多了，给妇联工作增加了麻烦”。在反右派斗争中与右派分子同病相怜，说：“这些人（右派）交代没有个底，怎么叫交代彻底，怎么叫不彻底。”

在整风过程中，从揭发了她的反党活动后，态度十分恶劣，党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耐心教育，但她始终避重就轻，不承认反党罪行，坚持说同志们对她的揭发批判是“污蔑”、“混战一场”，说材料是捏造的“硬凑的”，气焰极为嚣张，进行反击狡辩，毫无悔改之意。

以上事实说明，赵先自参加革命后，虽经党二十余年的培养教育，但由于极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污蔑、反抗市委，向党闹独立，进行反党活动，并攻击肃反，已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本支部决定开除赵先的党籍，并建议撤消其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

看，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財政局委員會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如言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朱如言，男，四十六岁，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教員，一九三九年五月入党。曾任苏南区无錫县財經科长、太湖地区貨管局局長，山东省財政厅秘書、济南市財政局副局長，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副局長等职。原任上海市稅務局局長。整風运动中，朱如言暴露了一系列的反党言行。

(一) 煽动放火，積極支持右派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五月初，部分基層单位正在“鬧事”，朱就擅自召开分局長會議部署大鳴大放；繼則又連續召开市、区兩級稅務机关非党幹部座談会，煽动他們大胆鳴放，大胆揭露矛盾，带头向党进攻，並将会上所有的反党言論連續地在“稅務通訊”上發表，致使反党毒焰迅速燃遍了整个稅務系統，有的单位在反党分子的煽动下，竟准备上街游行，进行反党“示威”。当市委指示“稳定基層”时，朱拒不执行，反而召开党、政、工、团、民主党派联席會議，繼續發動大鳴大放，火上加油，他还要大家向市稅務局全体工作人員进行广泛传达，並要求稅務分局也採取同样的形式領導鳴放，唯恐天下不乱。当轉入反右斗争时，他却托病去太湖等地休养（二个半月）。回来后則又強調：“现在的任务是向自然界作斗争”，企圖轉移斗争目标。

(二) 否定“三反”运动成績，攻击市委領導。正当右派分

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在党内会议上說：“三反运动是把内部矛盾当作外部矛盾处理了。”在民革支部大会上說：“我們在完成阶级斗争过程中，有很多教訓，……税务局的教訓是严重的，有些甚至是惨痛的。”直到反右时，还說：“三反逼供信严重，有許多假老虎。”原因是“陈市长指示撒网捕鱼的办法，陈丕显同志分配打虎任务，市委派李广仁同志来具体指揮”造成的。

（三）污蔑党的組織，歪曲党的幹部路綫。污蔑“工会是唱白脸的，行政是唱紅脸的，人事部門是拿鞭子的”，“監察部門是最后王牌”。他認為在幹部使用上應該是用人唯“才”，“不管黃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过去提拔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二十余人到領導崗位上，加以重用。並污蔑工农出身的領導幹部是“泥菩薩”、“牌位”，千方百計地排挤、打击他們。

（四）攻击和歪曲无产阶级专政，散布反苏言論。說：“税务机关是专政工具，完成工作靠行政命令，因此……集中多，民主少，強調紀律，缺少自由。”認為主觀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很欽佩铁托，說：“斯大林过去亏待了铁托，所以铁托到現在气还未消，他們不要再那样看铁托了。”匈、波事件后，他把右派分子戴炎英的反苏反共言論，印發給市税务局和各区税务分局的負責人閱讀，大家說戴的言論反动，他还說：“不能那么看”。

朱如言的反党活动絕不是偶然的，他一貫与党貌合神离，三心两意。經常散布：“党内相处也要有世故”，“党内陷害不是沒有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反党言論；他在党内拉攏一批人，打击一批人，培植个人势力。在批判过程中，朱的态度恶劣，拒絕检查。根据上述事实，朱如言已經墮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共党籍，並撤消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由十級降为十四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委 对右派分子楊延修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

楊延修，男，47岁，江苏人，1938年入党。原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組書記，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10級。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煽动放火，攻击肃反。对本人历史被审查一直心怀不滿，大鳴大放期間，披着党組書記的合法外衣，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与右派分子相呼应，先后找对党不滿分子七、八人个别談話，“授意”鳴放，煽动右派向党进攻。否定肃反成績，公开主张“肃反可以重新总结”。

(二) 大鳴大放期間，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篡夺整風領導权，整風开始，楊个人擅自决定成立“學習委员会”，但当右派分子攻击学委会“长字輩太多”、“不代表民意”要求改組时，楊又积极贊成改組，支持右派“不要党支部代表参加”的叫囂，致使右派在改組后的学委会內佔了优势，使工商局的整風領導权一度掌握在右派手中。

(三) 歪曲污蔑党的方針、政策，主张發展資本主义。說“政治上不許爭鳴是教条主义”，党对民主党派关系是“若即若离”，“从中央到地方焦点是有职无权”，对党要“打破迷信，組織平等”，“外行充內行笑話百出”，歪曲对資產階級改造政策为“总認為資產階級唯利是圖，遇事总想斗”，“违法处理是小資產階級疯狂性”，“五反不是大民主，不是階級斗争”。又

說“資本主義不僅要存在，且要發展”，“資本主義存在可唱對台戲”，“合營太多了，要退出一部分”，甚至主張“工商局要代表資產階級講話”。

(四) 丑化黨員與積極分子，挑撥黨群關係。右派分子攻擊黨群關係時，楊急起呼應。說：黨員是“作威作福”，領導幹部是“慣於搞運動，批評人，打擊人”，象“偏聽偏信的秦皇二世，專听趙高，指鹿為馬”，“老資格只能做跑龍套，臭的應放到毛廁內”，“過去黨員是整人的，現在應該給人整”。他還用“黨群關係不協調，存在敬鬼神而遠之”，“提拔上有宗派主義，黨、團提拔多，重德輕才”，“人事部門多用權力，少用說服”，“政治思想工作教條化、公式化”等謬論挑撥黨群聯繫。

(五) 實行“排擠左派，拉攏中間，團結右派”的組織路線。幹部路線上蔑視工農幹部“土包子”，對剝削階級出身的很賞識。建黨路線強調在留用人員、技術人員中發展。鳴放期間企圖將黨組組員、支部書記等骨幹調走，而要右派分子協助全局工作。反右鬥爭開展後，又以“不能無所適從，造成人人自危”，“我們這裡沒有右派”等謊言來阻止反右派。

二、鬥爭中的態度

雖被迫承認了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右派分子，但思想上仍有抵觸。

三、處理結論

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10級降為14級），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

李 中的党籍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

李 中，男，三十九岁，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曾任杨中工委宣传部长，丹阳、澄西县委书记，新四军一师军工部政委等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曾任苏中十地委委员、苏中区党委土改巡视团团员等职。解放后曾任戚墅堰电厂军事代表、苏南电业局局长、华东电业局副局长等职。原任上海市电业管理局局长。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 支持、包庇右派分子陈伟斯，破坏反右斗争。陈伟斯(李的内兄)是一个几次叛变投敌，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多次给敌人送情报的历史特务分子，解放后伪造历史混入党内，肃反时被清洗出党。但李中在肃反期间，曾两次书面证明陈“确是党员”。陈伟斯被清洗出党后，仍然冒充党员，到处吹嘘；大鸣大放时，煽动放火，挑拨党群关系，散布崇美思想，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当解放日报揭发陈的反党罪行后，陈多次与李中密商，而李中也公开为陈开脱罪责。李在群众中散布“陈只是有些右倾思想”，污蔑党报揭发的材料“均不是事实”，是“搞错了”，并亲自到陈的家中鼓励陈坚持“实事求是”。在李中的支持下，陈伟斯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多次向党反扑。当受到批判后，李仍捏造事实说陈“参加过党支部大会”，并和他“一起过过组织生活”，(陈伟斯本人也已承认自己不是党员，是混入党内的)千方百计地为陈掩饰，蓄意进行包庇。

(二) 反抗党的肃反方针，抗拒整风运动。肃反刚开始，李中就說：“这样下去对生产有威胁”，是“冒险的做法”。闸北发电厂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叫嚷“捕人太多了”“违反政策”，並污蔑有“宗派情緒”。他強調“生产与肃反有矛盾”，反对抽調幹部搞肃反，对抗肃反运动。鳴放期間，李首先在肃反問題上向党进攻，一面布置专人搜集向党进攻的炮弹，一面又亲自找几个肃反对象談話，煽动他們向党进攻。右派分子李連發污蔑“肃反办公室是特务机关”，大家起来批駁时，李中却別有用心地要“李連發經得住考驗”，公开支持右派分子。在轉入反右斗争后，他拒不执行市委反右斗争指示，強調“社会上已經反右，右派不会再出来了”。对明显的右派也不进行斗争；反說：“整風太左了，恐怕要造成損失”。

(三) 企圖篡夺党的領導，破坏党的幹部政策。李中因为沒有当上电业局党委書記，把党委看成是实现他个人野心的絆脚石，千方百計地想取消党委。鳴放开始后，就大肆攻击“党委不熟悉，不解决問題”。叫嚣“現在时机成熟了，党委可以不要了”，以便成立党组，自任書記，达到“大权独攬”的目的。李中为了培植个人势力，拉攏提拔了反革命嫌疑分子、品質恶劣分子和历史非常复杂的分子十余人，一起进行宗派活动。並反对党對他們进行审查，說：“审查沒有必要”，“中国历史情况复杂，有历史問題的人很多，應該大胆使用”。

李中在历史上曾自首变节。一九四七年紧张斗争中，由于貪生怕死，从苏南十地委逃来上海，被捕后供認已被捕的領導人員是解放区出来的幹部；出獄时又填过反共“戡乱建国运动保證書”，出獄后仍然和特务有所来往。李中对此长期隱瞞，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象“挤牙膏”式的作了交代。

在整風运动中，李的反党罪行被揭發以后，他再三抵賴狡辯，态度極端恶劣，並无悔改表示。根据上述事实，李中已經墮落为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

較低的工作，由十一級降為十五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支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力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

苗力沉，男，四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入党。曾任中央政研室敌伪组研究员、西北联政组织部秘书、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等职，现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其主要反党活动是：

大鸣大放前后，支持、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展开猖狂进攻。他攻击“从中央到地方广播方针不明确”，宣传部“过多干涉了电台的业务，妨碍了电台的积极性”，“市委对电台不重视、不信任、不支持”，“上海广播电台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领导状态”，煽动电台群众把“鸣放”的矛头指向市委和市委宣传部。当右派分子利用“左叶事件”向党进攻时，苗力沉竟授意新闻部表示声援，致使新闻部以电台全体编辑记者名义发出了抗议通电。电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大叫肃反残酷，苗也乘机歪曲污蔑党的整风运动和肃反斗争，说：“参加革命十年以上的党员，很少有不受过委屈的，”助长和怂恿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气焰。右派分子金瑞惕就公开向苗挑拨说：“你八年来有什么进步，搞到现在连个市委委员也没当上。我替你想了，你有二个前途：要么搞政治，将来当中央委员，要么搞学术工作，当个大记者，要么就一辈子当个电台台长，这算是最悲哀的了。”苗力沉不但不进行反驳，反而把他看成是“知心朋友”，认为编辑部

“沒有右派分子”。在开始斗争金瑞陽之前，又亲自到他家去通风报信。在电台广播方针上，苗力沉主张电台应“多搞社会新闻和多做广告”，以“充分满足各色人物的不同需要和兴趣”。在鸣放过程中，他公然违背市委的指示，播送了大量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在政治上完全丧失立场，敌我不分。八年来，他同副台长陈浩天一起包庇和吸收了反革命分子、子百余人到电台工作，有些还被提拔为科、组长，使之把持了某些重要地位，把电台弄得乌烟瘴气。例如秘书组副组长陶复平，是一个曾经出卖过十几个共产党员的叛徒、特务，一九五五年被发觉后，苗还认为他“是可捕可不捕的人”；一九五六年被宽大释放后，苗又擅自决定恢复陶的原级原薪。

苗力沉政治上敌我不分，组织上对党不满，反抗领导是一贯的。三反时，因其立场不稳，打虎不力，曾被撤销“打虎司令”职务；斯大林同志逝世开追悼大会时，电台竟播送音乐，又受到党的警告处分。对此，他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对党怀恨在心，经常反党言论。並和陈浩天、柳星三等结成反党集团，抗拒党的领导。他的反党罪行被揭发批判后，态度极不老实，继续挑拨电台某些干部对党不满，直至经过多次反复批判斗争，才被迫认罪。当组织上决定要他下乡劳动改造时，他竟又发生了败坏人伦的兽性行为，道德堕落达于极点。

根据以上事实，苗力沉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保留公职，送农村劳动教养。

(已经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涛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石涛，男，五十四岁，家庭开药铺兼医，本人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曾在北洋军阀第一混成旅、伪湖北宪兵传习所、伪第四混成旅等部任班长、上尉书记长。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当小学教员。一九三七年经朱大鹏（我党党员）介绍参加国民党二十九军任军训团第三大队上尉军需长。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青训班学习，结业后到山东临、鄒、费、峯四县边区工作，同年五月入党。入党后，曾任苏鲁支队营教导员，临沂青抗大队政委，邳县县委书记，鲁南三地委武装部长，华东党校大队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任长宁区区长、区委副书记、区委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调任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石涛在长宁区任职期间，有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一）一九五七年春上海有些基层单位在“闹事”的时候，他（当时任长宁区委书记）破坏市委“稳定基层”的指示，完全放弃领导，致使长宁区“闹事”蔓延到六十多个基层单位，造成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在大鸣大放前后，他违背区委的决议，连续组织了大小二十七次会议（其中石涛亲自主持的有九次），积极煽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他曾多次在党外人士会议上说：“大家要有医生对病人治病的精神，该打针的必须打针，该开刀的就必须开刀，不要管‘病人’叫和哭。”在科技人员座谈会上，又说：“有些公方厂长对科技人员缺少支持，使科

技人員心灰意冷，英雄无用武之地，象小媳妇一样不敢講話”，
“党和行政只重視工人的建議，不重視技術人員的建議”，鼓動他們“要有堅持真理的鬥爭性，勇敢鬥爭”。並向到會的人保證：
“（1）小組發言不記錄姓名；（2）大會發言不查發言稿；
（3）決不打擊報復。”

（二）在市委宣傳會議時期，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他支持右派分子的反黨言論說：“黨的幹部政策重德輕才，黨員提拔太多了”，認為“發言越來越激烈是難免的”，“都是我們自己不好，如果早改，就沒有這些話了。”積極為右派分子的反黨罪行辯護。當柯慶施同志指示黨員不發言後，石濤的態度仍未改變。

（三）在組織上，石濤有一套反黨的組織路線與幹部路線。他在長宁区工作時期，有意識地把一些隱瞞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分 子，政治面目不清的分 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而尚未得到改造的分 子，提拔到黨的領導崗位上來。他並利用這些人實行家長式的統治，維護其領導“威信”，排擠打擊好同志，弄的邪氣猖獗，正氣不振，造成黨員成分與領導成分的嚴重不純。此外，在肅反運動和批示處理案件中，由於他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破壞了黨的肅反政策，該捕不捕、該判不判，袒護和放縱了一批反革命和壞分子。

（四）石濤的反黨活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整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據。他經常說：“人有共性，應一視同仁”，“階級是可以改造的”；在所有制的問題解決後，“資產階級不僅不對抗了，而且还怕跟不上去”，“只要給他好處，就能調動他的積極性”。主張“真有知識的人，不管他進步不進步，我們都要團結”，並說：“蘇聯有的軍事教員經常罵共產黨，但蘇聯還是重用他”，來証實他自己觀點的“正確”。他還主張：“在黨內來說，必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其他人則不一定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可以創造新的主義。”在這種反動的論調支配

下，他在統戰工作中卑躬屈膝、只統不戰，在一九五六年秋，長寧區一屆四次人代會上，職工代表揭發資本家把工人毆打得吐血的違法行為時，石濤不僅不支持，反而在大會總結時批評職工代表說：“今天發言有缺點，主觀片面，態度有些激動，言語有些刺激，影響統戰”，並向資產階級賠禮道歉，請求“原諒”。石濤上述一系列的反黨罪行在市委擴大會上被揭發後，他拒不進行檢查。經過反復揭發鬥爭，始被迫承認了一些事實，但態度極不老實，自始至終不願檢查自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動機，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不同意區委對他的結論。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石濤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所以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是一個舊知識分子，青年時代參加了軍閥軍隊，受過一套反動的教育和訓練，沾染了反動的思想、作風。抗戰初期雖然參加了革命，但長期以來，他的反動立場、觀點並未根本改變；同時他還存在着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對黨不滿（解放初期因未發到蚊帳，竟用國民黨旗作帳頂，以泄私憤）。因此在右派分子猖狂向黨進攻時，就得意忘形，積極煽動、支持、配合右派向黨進攻，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黨真面目。為了純潔鞏固黨的組織，經區委討論決定，開除石濤的黨籍，撤消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工作，由十一級降為十四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 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中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王中，男，現年四十三岁，山东省高密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复旦大学党委会委员、统战部部长。

王中的主要反动言行

(一) 王中一贯对党不满，和党闹对立，诬蔑党和攻击党的政策。他诬蔑党的组织“冷酷”，党内“无理”，“官官相护”，把党对他的批评说成是“遭受打击”。他攻击肃反“是一阵风”，说“那里有那么多反革命”；他攻击粮食定量供应说“束束手带，准备上吊”；他还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二) 他有纲领地、积极地宣传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新闻理论，强调报纸要有“服务性”，“商品性”和“生活趣味”，反对党报的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反对报纸的党性和它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挑拨党委和报社的关系，企图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提倡办“同人报”。

(1) 王中在一九五五年写了反动的新闻著作“王氏大纲”，彻头彻尾地贩卖了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极力反对和诬蔑无产阶级新闻学。一九五六年他到解放日报社作报告，同年暑假，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组织了“访问团”到南京、无锡、济南、青岛等地“访问”“考察”，这个时候，他积极地宣传了反动的新闻“理论”，到处点火，挑起报社对党委的不满。他到处谩骂党报是“靠娘吃饭”，“寡妇脸”，“官报”，等等。並鼓吹办不要

党领导的“同人报”，“按经济区域办报”。他说“办报人心里一有了党委就办不好”，“党报吃亏，就是因为同党委关系上有问题，党委叫你这样办，你们又不能不这样办”；他说“不向党委开刀，不解决问题”。王中的反党言行，在一些报社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2) 王中企图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其反党大本营，曾企图组织不由党委领导的“复旦通讯社”。王中将黄色小报给学生阅读，讲课中貫徹他的反动理论，以致在新闻系内资产阶级思想迷漫，各教研组、师生都受其影响。在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很多学生不愿到党报去工作，学生中先后出现了“友好通讯”，“未名社”“给爱花者”等刊物，其内容充满低级趣味，庸俗不堪，实际上貫徹了王中的反动理论。

(3) 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鸣大放期间，王中参加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大肆宣传其反动理论，受到其他右派分子的喝彩、支持，气焰嚣张。在会上王中大骂“党报有一种架子”，“好像不铁青面孔不足以为党报”，极力为上海新民报吹捧。他攻击党委“对党报的认识上可能有问题，党委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在回上海的途中，王中又到济南、南京放火，积极召开座谈会，散布他在北京座谈会上发表的谬论。他对助教金维新（原在大众日报实习）说：“我们将来到济南办一个报纸，和大众日报竞争一下，搞垮它，以后再到的地方去办，再和当地党报竞争。”在南京，王中应新华日报社的右派分子张建衷的邀请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大肆宣传他的反动论点，鼓吹办“同人报”。

根据以上情况，证明王中是一个十足的，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的党内极右派分子。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已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决定开除王中的党籍。

中共上海市委

对右派分子王若望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

王若望，男，四十岁，江苏人，一九三七年入党。家庭出身中农。现任“文艺月报”編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鳴放前后，写过“释落后分子”、“一板之隔”、“不对头”、“身价十倍”、“观風測雨”等十余篇文章，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攻击从政治上划分人的先进和落后，攻击“鳴放”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的政治标准，並协党 負責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公然反对老工人座談会对右派的反击，对党的各項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全面攻击。

(二) 鳴放期間在市委座談会上，首先出来污蔑作协党内有墙，墙外有沟，起了放火作用。在其他党内外會議上，攻击作家协会党内有宗派集团，並污蔑肃反等政治运动是作协党内的宗派打击，宗派排挤，說作协肃反四个月，有三个半月是搞自己人，是搞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吳强、孔罗荪、柯蓝、王若望四个人；說解放日报上批評文艺月报未轉載胡風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是对文艺月报的宗派排挤，文艺月报是宗派打击的牺牲品。

二、斗争中的态度

基本上交代了問題，态度尚老实。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文艺四級降为文艺八級）。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會議 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黃国璋、 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六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福建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揭發了黃国璋（原福州市委書記）、林汝楠（原省教育厅长）、許集美（原晉江专区專員）、王一平（原福州市委書記）等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后，福建省委为了更进一步查清事实 and 罪惡，徹底批判地方主义的反党言行和团結教育多数地下幹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将犯有严重地方主义錯誤和受地方主义者严重思想影响的区級主要幹部以上的黨員幹部一百七十七人，集中學習了四个月。經過充分發动群众，採取大放、大鳴、大辯論的方法，严肃認真地对地方主义开展了深入的揭發批判和斗争，使参加學習的幹部受到了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育。黃国璋等人的錯誤，在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扩大會議上又作了討論，会中省委召开了全体委員會議，一致通过了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决定。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反党集团的主要錯誤如下：

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居

功驕傲的思想和浓厚的山头宗派情緒。解放后他們一直对自己的职位不滿，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們即背着党进行了一連串的非組織活动，广泛地在地下幹部和老区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語，挑拨拉攏，多方搜集歪曲扩大的材料，准备向党进攻，並發动和鼓励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到中央控告。黄国璋在福州市利用恢复城工部的党员党籍的机会，極端恶劣地企圖把錯誤处理城工部的責任轉嫁于省委、市委，說这是“市委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並以“七年委屈”为題，召开了“吐苦水”座談会，煽动城工部的同志向“党内阴暗面”作斗争，組織發动他們肆意攻击党的領導、攻击党的幹部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

党提出整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黄国璋署名的向中央的控告信中公开提出了他們的反党綱領。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黄国璋、林女楠、王一平一唱一合，公开攻击了全省各級党委的領導，說“福建七年来情况与王明路綫相似”，七年的錯誤是“把老区群众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誣蔑省委有路綫錯誤。他們在省委召开的閩北、閩中老区座談会上，搜罗与糾集了各种对党不滿的分子，混进党内的坏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参加會議，提出“忘本論”、“还債論”、“紅旗不倒論”，宣揚“斗争性”，煽动和組織这些人向党發动了总攻，並与当时省人代会上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互相呼应。地方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問題上攻击党：

一、否定老区工作的成績，否定党的正确領導，攻击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綫錯誤，說：“老区工作只有缺点沒有成績”，叫囂“老区人民政治上沒有翻身”，說“解放后給老区群众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禍害”。同时他們說“老区問題严重，新区問題也一样，只是沒有人揭發罢了”。

二、誣蔑攻击党的幹部政策，反对依靠南下大軍、南下幹部，以南下幹部为骨幹团結培养地方幹部的方針。他們硬說党与南下幹部有“宗派主义”，說党对地下幹部的政策是“赶掉政

策”，“排擠政策”“打擊政策”。說地下幹部是“童養媳”，“殖民地”，“有職無權”，“坐冷板凳”，“不如民主人士”。說解放後新培養的地方幹部都是些“唯唯諾諾”，“吹牛拍馬”的人物。說“南下幹部提拔快，地方幹部提拔慢”，“黨紀國法也是對南下幹部寬，對地下幹部嚴”等等。同時還大肆宣揚南下幹部“不了解本地歷史”，“不理解本地幹部和老區群眾的心情”，只有他們才是本地利益的代表者。

三、攻擊黨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攻擊黨的“三反”、“鎮反”、“肅反”、“審幹”等政策，攻擊人民民主專政。他們歪曲、夸大甚至捏造事實，來否定歷次政治運動的成績，替反革命分子、叛徒、勞改犯、被管制分子和壞分子叫冤翻案，並把這些都叫做“錯案”，都說成是南下幹部“有意地打擊、迫害、誣陷地下老革命”。此外，他們還攻擊了黨的其他一系列方針政策。如說“合作社大都減了產，一點勞動自由也沒有”，“定產太高，公糧負擔重，糧食不夠吃，天下烏鴉一般黑”，“上面官僚主義，下面不顧人民死活”，“土改四大錯：錯評成份、錯判、錯管、錯殺”，“體制不如美國好”，“無產階級專政容易產生個人崇拜”，“南斯拉夫工人權力大，……我們小小合作社還要派二百五的主任”等等。

綜上所說，地方主義者實際上全面否定了黨的領導，否定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成果，全面攻擊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以及黨的一系列根本方針政策，他們在政治上已完全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

老區座談會後期，他們自以為進攻獲勝，“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因此提出“要抓幹部安排問題”，提出到基層“扎根”，“抓重點縣”，“抓第一書記”，“帶一個班子”等口號，並按此制訂了閩中、閩北和福州市幹部“大換班”計劃。並紛紛找幹部談話，封官許願、安排職位，私自召開下放幹部會議布置“紅旗不倒”。儼然已另成一黨，另有一個組織部。整風。

进入大放大鳴，他們即与資產階級右派勾結起来，在晉江地区掀起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南下幹部風潮，一度把晉江地区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他們到处煽动組織請願鬧事，高呼“赶走南下幹部”，“和南下幹部幹到底”，“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必亡”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在仙游县搞起了“小匈牙利”事件，公开叫嚣要杀共产党，准备释放犯人、上山打游击、武装夺取政权。在福州，他們聯絡了民主党派和資產階級右派，出来“放”“地方幹部問題”，說“要高高举起政协旗帜，整一整市委”。他們与社会上的右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融为一体的。

反右派斗争中，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分子完全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場，千方百计阻挠这一斗争的开展。

以上事实說明：黄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已經完全堕落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为了严格党的紀律，从思想上和組織上純潔党，福建省委全体會議一致通过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並撤消他們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其他犯有地方主义錯誤的，則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鎮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

张鎮，男，現年43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地主，1940年入伍，1941年入党。历任县长、局长等职，原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組書記。

在深入整改，交航二厅整風領導小組合并后，进一步揭發了張鎮的反黨言行。張鎮的反黨、反領導，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1、擺脫黨的領導和監督、重大問題不向省委請示和報告，反而說省委不重視交通工作。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以自己的意願為轉移，搞航運工作時，說領導“重公輕航”，搞公路工作時，又說領導上“重航輕公”。他主張執行省委的指示要慢一點，修建徐淮公路就是違背了省委的方針。在負責交通廳黨組工作時，嚴重的不負責任，偏面地強調交通工作的特殊性，把業務工作神秘化，擺脫黨的領導。

2、破壞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重大問題不通過集體討論決定，有話不在會上說，背後亂談，會上表示同意，會后又宣傳自己的主張，甚至推翻會議決議，自己另來一套，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工作中有了成績，占為己有，出了毛病，則推給別人。

3、一貫玩弄兩面手法，热衷于製造是非，造謠中傷，污蔑領導，破壞團結。在幹部中拉拉扯扯，用討好賣情、封官許願的辦法，迎合某些人的個人主義心理，培植個人親信。他還逢甲說乙，逢乙說甲，進行挑撥離間。擴大別人的缺點，抬高自己的威信。提出修正主義的論點，主張取消思想鬥爭，散布“批評會影響團結”的謬論，來渙散黨的戰鬥力。在階級鬥爭中，他盡力長敵人之志氣，削自己的鬥志，渙散鬥爭。

4、一貫堅持地主階級立場，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以反對者的面目出現，顛倒黑白，破壞運動。三反運動中，就曾為揪倒領導進行了非組織活動；反右派鬥爭中同情和支持右派，提出“不要擴大化”，要接受“肅反教訓”的論點，為右派分子辯護；幹部下放時又提出“接受1954年整編的教訓”，並在下放幹部問題上造謠中傷，把領導小組的決定，說成是某領導的獨斷，以混淆視聽，攻擊領導，進行他的反黨活動。對機關中的壞人壞事，表現了嚴重的右傾，不聞不問，提出“捉姦要奴”的反動的

法学观点，来为坏人坏事辯論，使交通厅坏人坏事不能得到处理。

5、张鎮的反党、反领导是一貫的。早在土改中，就以葬父为名，出买土地50亩。复查中为其家中隐瞒浮财。三反运动中，又企图揪倒领导。对党的重大的革命措施，加以破坏和污蔑。例如：棉布要计划供应，他指使其老婆尽先抢购。对农业合作化后的新农村，說成是“反动标语到处都有”，“农民抢粮打干部”，“如果不是我們鎮住，国民党来了很多人就变了”。苏联发射洲际导弹火箭成功后，他說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搞到一批科学家，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从苏北到并省以来，沒有那个领导同志，他沒有反对过的。在苏北交通处工作时，說领导是“主帅无謀，三軍受困”，“大臣不如太监”。并省后，从省长到历任厅长，他都恶毒的予以攻击，无中生有，造謠中伤，扩大领导缺点，多方面加以排挤。

张鎮的反党、反领导，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又直接經營土地进行剥削。入党后，地主阶级思想根本未加改造，一有时机就原形畢露，遵循其父亲所遺囑的：“男子不險不發”的反动哲学，作为他一生損人利己、損害組織、追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指南。因此，张鎮是一个混进党内来的阶级異己分子，是一个党内的極右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部討論，一致通过清洗张鎮出党。並建議行政給予处分。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五支部 关于右派分子楊成亮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

一、簡历

楊成亮，山东新太县人，現年3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40年5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县邮电局长、福建省邮电局人事科长等职，来校前任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現为普通班二十五支部學員。

二、主要錯誤事实

1、誣蔑和歪曲中央的正确路綫，否定三反、肃反等方面的成就：

他認為：“中央从1935年到現在的路綫”“是路正綫不直”。他說：“路正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綫不直指有不少缺点，有人为紧张”。他說：“方針政策是保証方向，保証路綫的，中央在方針政策上則是有錯誤的。”。

他認為中央在三反、肃反、反右傾、规划、粮食統購統銷等問題上犯有主觀主义錯誤：

他說：“在三反中，中央向下分配任务指标根据是什么，是否合乎实际情况，我看犯有主觀主义，扩大化了老虎面，伤害了一些幹部。”。

在肃反問題上，他認為：“不能以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难免的，就放棄自我批評，自己原諒自己。”他还誣蔑中央說：“搞出个胡風，心血来潮就来肃反，缺乏准备工作，摸不清底就搞”，“从中央的指导上有检查的必要”。

他認為中央：“在反右傾思想之后中央規劃是不切合实际的。”他說：“反右應該有度，有界限，在农村右是主要的，其它战綫上建設上是否右了呢？”並說：“制定規劃、实行一长制都是大家忙了好久成績不大，事倍功半，形成人为紧张”。

他認為：“統購統銷在分配數目上”，“購的數目多了”，犯有“主觀主义錯誤”。

因此他對有些人誣蔑中央時提出：“中央在执行政策上有一陣風的說法”有同感。他並且說：“過去運動太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己不能鑽研業務”。

2、在資產階級右派向党猖狂進攻中，和右派分子共鳴，稱讚右派分子才華，為右派分子辯解。

在反右派鬥爭進一步深入，黨內傳達了中央指示，報紙上也多次揭露了右派陰謀之后，在7月9日的小組會上他還認為對右派奪取領導權的口號提得過高，不“實事求是”。甚至他憤慨不平地說：“現在資產階級嗅了，有人認為越罵的兇越好”，他並且說：“是不是他們有奪取領導權的危險呢”。他認為：“奪取領導權的可能不大，甚至沒有可能”。

在7月6日小組會上他為右派分子辯解說：“這次社會上引起混亂，不能完全說是右派分子點火，而是我們若干政策缺點引起的”。他又說：“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言論，雖然是歪曲夸大，但夸大部分中總還有些事實”。

他稱讚林希翎的才華，說林“懂的東西真多，能在幾千人大会上作報告，真是有本領的。”當黨已經明確指出章伯鈞是右派分子，並揭露其罪行之后，他還很欣賞章伯鈞在6月12日光明日報上所寫的代社論的文章，並向別人宣揚說：“文章寫的好，很能說明問題。”但他認為這一時期報紙所登的反右派文章除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文章外，都是說服力不大的。他認為“對右派應堅持團結——鬥爭——團結的方針，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並說：“這些人是有本領的並不是飯桶”。

他看了邮电部鳴放当中有右派分子誣蔑“老干部五不行”的說法，他表示有同感，並說自己有三不行。还說：“邮电部門有些老干部什么都不学，憑老資格吃飯”。

3、錯誤地看待中苏关系，誣蔑苏联专家

他在听到中苏幣值折合上有些不合理的現象时，他認為“中国穷弱，苏联富强，中国只能佔便宜，不能吃亏”他說：“解放后中国人民辛勤建設几年了，国家还是很穷的，是不是苏联把我們剝削穷了”。他錯誤的認為邮电系統实行一长制，机构几次变动，搞的不好是苏联专家搬了苏联的东西”。毫无根据的說：“邮电系統的专家沒起好作用”。

三、錯誤的根源

楊成亮所以犯了这严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驕傲自滿、狂妄无知發展的結果。他經常吹嘘自己出身好，成份好，历史上沒有犯过錯誤，是一个缺点不多的共产党员。說：“主觀主义有一些，官僚主义不多，自覺的宗派主义沒有”。他特別爱夸耀和显示自己能独立思考，有独到見解。他检查自己思想时說：“不管上級下級一視同仁”，不盲目接受別人的意見，自己認為对的才接受。对党組織的意見不尊重，而欣賞自己的标新立異。对于反面的意見，津津有味，对別人拥护和讚揚的言論，反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患得患失。

楊成亮所犯的錯誤，和他的階級出身以及和他长期存在着右傾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从小娇生慣养。他脑子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荣宗耀祖、向上爬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带着这种思想参加了党，並未能根本改造。此外，楊成亮的錯誤，也是由于他忽視政治，存在着單純业务观点所造成的。

四、对錯誤的态度

楊成亮在对待自己的錯誤的态度上，一开始怀疑个别同志有

意整他。在检查中总是借口过去口快心直，講了些問題，都想不起了，怕戴右派帽子，顧慮重重，抵触情緒很大。經同志們揭發和多次對証，虽然承認有這些事實，但又一味強調他的動機是好的，只是求知識，沒有什麼思想問題，而不敢正視錯誤，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實思想，並曾產生過自殺念頭。經過一个多月會議和多次個別談話幫助，他表示願意檢查自己的錯誤，認為自己的錯誤嚴重，但他最後在支部大會的一次檢查，只羅列了些事實，仍未認真挖掘思想。在同志們幫助之下，寫自我檢討時，承認了錯誤，對錯誤有了一定認識，並表示願意改正。

五、結論

根據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楊成亮是一個十分驕傲自滿、狂妄無知，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根本未改造的人。他在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關頭，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進攻的時候，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歪曲和誣蔑黨的政策，攻擊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右派分子共鳴，為右派分子辯解。據此說明他是一個黨內的右派分子。支部一致通過開除其黨籍。

中共浙江省委監察委員會關於 開除極右分子顧耕初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

顧耕初，男，三十五歲，江蘇川沙縣人，家庭出身職員，本人成份學生。一九四〇年九月入伍，同年七月入黨。歷任：機要員、記者、科長、秘書、省文化局處長、副局長、省人民廣播電台

台长等职。

顧耕初的反党言行如下：

一、在大鳴大放期間，利用广播电台这一宣传机构，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鳴放开始，省委指示电台对外宣传应加控制，不放不鳴，顧耕初却背着省委，擅自举办“爭鳴話筒”特别节目，並連續要右派头目宋云彬、姚順甫、郑伯永等在話筒面前放出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致使电台一度成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講壇，实質上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开辟了一条战綫。七月上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左瑩同志来浙江检查工作时，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沈阳指示广播电台不放不鳴的精神后，顧又封鎖消息，阻止別人将中央精神报告省委宣传部，說：“报告宣传部，就鳴放不成了”。

二、在反右派斗争期間，积极包庇右派分子，广播电台副总編輯右派分子何其、梅寒白，一贯进行反党活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顧耕初担任电台领导小组组长，他組織群众向肃反积极分子开展斗争，被宣传系統整風领导小组發現后，曾指示顧立即撤銷何其的职务（整風领导小组成員），限期發動群众，組織斗争何其。而顧耕初公开对抗，拒不执行。后經宣传系統和新聞界领导小组五次指示並严格批評后，顧才以加强业务的名义撤銷何其的领导职务，但仍然坚持不斗争，並对领导小组的同志說：“何其有問題，我們也要保护他过关，如果一定要搞，我們就以組織名义打报告”。並說：“撤掉我的职，也要把問題搞清楚”。直到斗争何其的前夕，顧还对何其說：“你看这是什么性質，我們有什么把柄給人家抓住了……”。怕搞了何其，火烧到自己身上来。

三、“左叶事件”在报上公布后，顧耕初同意电台进行“声援”，在电台編輯部召开大会，以全体編輯、記者名义向中央新聞工作者联誼会發表通电。在通电中除对“左叶事件”表示憤慨外，还污蔑說：象左叶这种以官僚架子、老爷气派对待記者，无

理阻撓記者活動的人，在浙江也不是個別的……等。在這個事件中，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黨的本質。

四、否定電台的肅反成績，打擊肅反積極分子。顧調電台工作後，就一筆抹殺電台的肅反成績，攻擊肅反領導小組成員。說“電台肅反搞得一團糟，一塌糊塗，搞得大家垂頭喪氣！”並一再宣揚“電台肅反副作用很大，傷害了一些人的積極性，有過傷害編委集體領導的錯誤”。污蔑“肅反幹部翹起尾巴來了”！致使有些肅反幹部長期抬不起頭來。在反右派鬥爭中，又抓住了個別肅反幹部的某些錯誤，開展鬥爭。

五、近幾年來，特別是鳴放期間，散布流言蜚語，串連群眾向黨進攻。他時常在群眾中和右派分子面前說：“省委有宗派、有圈圈，常委開會，陳、林、吳總是交頭接耳，楊思一冷冷清清坐在一旁，顧德歡老头子更可怜啦”！說“陳修良這樣的人，馬列主義水平在浙江是少有的，也不給她當省委委員”等等。他污蔑中央廣播事業局“什麼也幹不了，不管它”！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央廣播事業局召開省市台長會議時，顧耕初積極串連部分地方電台的同志，攻擊中央廣播事業局。

顧耕初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他一貫驕傲自滿，極端地發展個人主義。在部隊工作時，對抗領導，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到電台後，與反黨分子何其、梅寒白勾結一起，同流合污，進行反黨活動，其反黨的罪惡活動是十分嚴重的。省委監委決定並已經省委批准，將顧耕初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勞動教養。

中共浙江省商业厅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黎立坚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黎立坚，原名王云甫，曾用名王勳，男，四十一岁，河南鎮平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入伍。一九三八年一月入党。历任游击队宣传員，新四軍連队組織幹事，团組織股长，鋤奸、保衛科长，浙江省民政厅秘書主任，浙江省土产公司副經理、食品公司經理，中共浙江省商业厅党組成員、商业厅副厅长等职。

一九四七年十月，黎为其爱人搞不正当两性关系，以手槍打伤其爱人的腿部，並唆使其爱人用硝镪水伤害对方面部，几至一目失明。因此曾受留党察看处分。

主要反党言行

(一) 蛮横地拒絕省委对生猪問題的決定：

1、为緩和省内肉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厅党組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決定报請省委批准生猪外調年度計劃由二十万头核減为十万头。主管生猪业务的黎立坚，不仅不立即修改一季度六万头的外調計劃，反而在三月十二日自作主張的簽發了与党組決定相違背的檯节省内供应、保証外調任务完成，並要嘉兴地区爭取超額外調的緊急通知；三月二十日又指示省食品公司林植之經理按全年外調十五万头作出分季安排，代拟厅稿报省人委。企圖以此否定省委和党組核減外調十万头的決定。还对厅业务处右派分子叶树滋說：“只要你把計劃安排下，就好办了”。

2、三月十六日，省委決定生猪暫停外調，放寬省内供应，

这是緩和省内肉食供求矛盾的重要措施。黨組副書記左斌之同志传达了省委这一决定並囑立即貫徹执行时，黎採取抗拒态度，並对經办人員說：“不能办，公司有困难”“不管他，你們沉住气！”阻挡了省委指示的及时执行。停調后又不做好省内供应工作，並把由于沒有做好供应而带来的一些业务工作上的困难都归咎于省委。

（二）煽風点火，配合党外右派向党进攻：

黎在平时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內行”的謬論，說“省委只能管管年度計劃，季度計劃應該交給业务部門管，否則影响业务部門的積極性”，“黨組管得过多过死。”說“經營生豬困难很多，生豬特点黨委部門不了解”，“要多写稿向各級黨委宣传宣传”，对暫停外調極为不滿，說“生豬供应是个安排問題，本来簡單，一抓反而抓复杂了，业务部門弄得难办事。”为了逼迫省委改变他所堅決反对的停調决定，黎故意歪曲省委指示精神，制造輿論，煽动群众攻击省委。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監察部檢查組同志向黎匯報停調情况后，黎对匯報中背离真相的事例不但不提出意見，反而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攻击省委的决定說：“春节后杭州供应紧张，民主人士到四办（？）叫苦，有的省委部长也吵肉不够吃，老百姓意見不多……因此省委常委决定停調”。

四月分全省食品公司經理會議上，各地經理对停調認識不足，思想問題很多，邀黎去解决，黎却只說“合理安排”，不談“放寬供应”，大談其“生豬停調是省委决定的，商业厅无权。”因而更激起了到会者的不滿，認為省委指示是“主觀主义行不通”。平时常說：“省委停調，全省食品系統有一万多人思想不通，这是一件大事。”当各地請求解决生豬困难时，黎不是積極設法解决，而是別有用心的說：“我同情你們的困难，这是省委决定的，当地黨委解决吧，解决不了就直接請示省委解决。”企圖挑起下級黨委对省委的不滿。还唆使右派分子叶树滋

等向党进攻，說：“老叶呀！我說話不灵，领导不听，你和陆兆雄（右派）等多向上反映些生猪經營的困难情况。”並且还表示自己态度說：“我們搞生猪的意見是一致的，就是领导上看法跟我們不同。”黎立坚知道省委要派人来商业厅党组为生猪問題召开座談会时，就带了右派王法武、叶树滋等去着重收集停調后的困难及損失材料，企圖带叶参加座談会一起向党發起进攻。会上有人提出有些不应列作損失，但黎說：“增产节约总是个事兒，不能不管。”还責成前食品公司算出調运后損失二十一万元的‘損失帳’，会后要右派分子叶树滋整理材料，企圖以此为炮弹再次攻击省委。

（三）一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对抗党组的领导。党组决定杭州肉类加工厂划归杭州市领导，黎就一直大叫“领导关系不明确”，並積極的搜集該厂存在的缺点和問題，企圖否定党组的决定，达到商业厅直接领导的目的。在桔果业务經營上，党组决定划归合作社，黎因思想不通，說“商业厅怕麻煩”，拒不执行。在提拔幹部上也同样的，当不能实现个人意見时，就說“商业厅对幹部有印象观点”，影响極坏。

反右斗争中，經過群众的多揭發批判和厅党组、省委財貿部的多次批判帮助，黎立坚一直固执己見，不肯檢討，对錯誤事实采取推賴手段，並說“我的問題在商业厅弄不清”，“是左珮之整我”。始終強調自己的动机是好的，坚不悔改。

黎立坚在实际工作中，一貫反对党的领导，拒絕执行党委指示，組織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政治上配合党外右派向党进攻，是生猪事件的‘統帅’，完全堕落成为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党的叛徒。

根据以上結論和中共浙江省商业厅綜合处支部的报告，党委会全体會議一致通过，将右派分子黎立坚开除党籍。並建議行政上給予撤銷一切职务的处分，另行分配做一般工作，降級降薪（由十三級降为十六級）。

中共浙江省輕工业厅党組 关于右派分子张光反动言行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二月)

张光，男，四十一岁，浙江諸暨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五五年調来工业厅工作，現任本厅副厅长，党組副書記。

一、主要反动言行

1、严重的地方主义，分裂党的团結。早在一九四九年张光在省委組織部任組織科长时，曾帶領工作組二次去諸暨检查工作，第一次去蹲了四天，回来写了一篇检查报告，該报告充滿着地方主义的情緒，否定党中央依靠南下幹部，依靠大軍，南下幹部掛帅的方針，露骨的分裂南北幹部关系。他說南下幹部是“狹隘的階級观点”，“是根据地作風”，“南下幹部都是做党的工作，包括行政”，“南下幹部光看本地幹部的缺点”，对当时諸暨县委書記吳秀峰（南下幹部）恶意的进行攻击，積極主张撤換，調本地幹部担任县委書記。

第二次去諸暨由于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沒有針對諸暨当时組織不純的主要問題加以解决，反而进一步去制造南北关系，进行非法串連，拉攏一批当地幹部鼓励打击南下幹部，当时諸暨横山区委書記孙繼田，××区委書記高文田，都遭到了斗争。坏分子气焰嚣张，党的工作遭到極大的损失（詳参考张光检查諸暨报告和工业厅党組向省委第一次报告）。

2、反对省委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公开提出省委交出“人

权、財权、政权”的反党綱領。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修正主义的逆流，党内右派蠢蠢欲动的时候，张光就十分放肆的活动起来。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省級机关整風大会上的發言，集中的攻击了省委，污蔑省委包办人委，叫嚣政府威信不高。他說：人委不起作用，省长沒有权，省委副書記与省长职权不清，誣蔑省委常委有权大权小之分。又說：要加强省人委就要省委交出“人权、財权、政权”，撤消工交、財貿二个部。这种要省委交出“三权”的調調，实质上是沙文汉的独立平衡资产階級政权观点的具体化。

3、狂妄而恶毒地攻击譚震林同志，为右派分子楊思一鳴不平。

一九五六年七月省委召开全省二届二次党代会议期間，譚震林同志对沙、楊、彭、孙等分裂党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因此很快制止了这种分裂活动。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譚震林同志召开各厅局党组委员会議，其中解释了沙、楊所以不能当选八大代表，是因为他們有历史問題，中央正在审查。8月1日在杭州飯店召开的部分厅局长會議上，譚震林同志提到党代会上出現的宗派活动，背后策动人可能是楊思一。张光不相信中央，不相信省委，而相信楊思一，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指导下，採取二面派的阴谋活动手法，向中央控告，向省委申訴，誣蔑譚震林同志“主觀臆断，是从个人兴趣出發”，極力为右派分子楊思一辯护。

4、二年来的表現：

(1) 整風开始时經常宣揚右派謬論。儲安平提出“党天下”的謬論时，张光在几次學習会上都公开說“我看我們就是党天下，为什么还不敢公开承認，党天下有什么不好”。右派分子譚惕吾提出反党的“双軌制”后，他非常贊揚，到处說“这个意見很好，現在党委管得是太多了”。

(2) 张光来厅工作二年来的表現，是意志衰退，情緒不

高。

二年来对工作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按步就班，毫无生气。

二、整風以来的态度

省党代会上代表們对张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言行紛紛进行了揭發，当时我們厅党代表小組，曾多次对他进行了帮助，但张光却无悔改之意，抵賴他反党宗派言行的錯誤，不是說主观是好的，就是說客观誤会，直到最近还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樣子，态度仍然極其狡猾。

三、我們的意見

根据以上主要事实，张光問題的性質是屬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十分恶劣和严重的。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规定，我們意見应将张光划为右派，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由十級降为十五級。

(已經省委批准)

中共浙江省农业厅党組关于 右派分子张俊升反动言行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张俊升，男，五十二岁，河北威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文化程度大学毕业。入伍前曾任国民党軍隊上校团长。一九四五年六年起义入伍，一九四七年入党。历任新四軍浙东縱队旅长，副司令員，軍副參謀长，一九五六年初轉业至农业厅，現任副厅长，党組委員，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一、污蔑攻击省委领导，抗拒执行党组决议。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党组会上，馬月如同志传达省委的“二五”规划，讀到省委要求每个党组組員一年要为“求是”写二篇稿时，张很不滿地說“这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写文章首先要給我時間”。一九五八年五月张去湘湖农場检查工作，在一次場的主要幹部座談会上，該場場长彙报情况时，提出“压倒皇天坂，赶上东湖”的口号，他說“听了你們的口号很好，我看是压倒农科所，争取李丰平”，並在全場职工大会上大提而特提这一口号。六月下旬在湘湖农場參觀稻苗生长情况时，他又提出“要爭取李丰平”。

一九五七年六月全省畜牧工作會議上，张对省委不拨飼料有意见，他火气冲冲地对宁波小組同志說：“部队打仗要有弹药，省委决定下拨二亿斤粮食作飼料，为什么不拨？”並借口不了解情况而不参加會議。一九五七年十月省党代会对沙、楊問題将要作決議了，他还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並借口接待外宾在杭州飯店住了三天不去参加对沙、楊的辯論。直至最后还不發言，不表示态度。

一九五七年初在一次处长會議前夕談起幹部任免先以党组名义通知問題，他对孙順、任政等同志說：“党组和行政不分”，“农业厅屬省人委领导，为什么又要农工部来领导，由农工部领导是否党政不分值得研究？”张俊升对党组的決議采取违抗的态度。如一九五七年初，党组責成由他負責处理机械管理局曾玉成問題，他在會議上表示同意，会后却迟迟不执行，說“曾玉成的問題还能把他搞到街上去嗎？”关于拖拉机手的处理問題，党组决定全部动員回家，待今后事业的发展再逐步吸收他們回来。而张对幹部处許耀祖同志說：“关于拖拉机手的处理問題，我不同意党组意見”，对孙順同志說：“这些人不能随便处理，军队幹部不好处理”。

一九五七年八月，农工部批評农业厅反右派斗争中有右傾情緒，张很不滿地給张敬堂同志写了一信，叫王逢友、张林签名、

並想不去參加部委召開的有關會議。同年九月黨組決定將右派分子王谷正調離整風辦公室，並批評了張林的嚴重右傾思想後，他對吳勝義同志說：“幹部還是幹部，我們还是要用他的”。當張林哭了，他說：“不該這樣批判”。並且認為“人事處和黨委會都是小青年，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一九五八年二月黨組決定給張炳訓以留黨察看二年並行政上撤職的處分。六月分王芳齋同志問他時，他說：“現在處理意義不大，應該早處理，原來有個決定，處分太重，開除黨籍，行政上撤職，我的意見是行政上處分，黨內不一定開除黨籍。”

一九五七年初，黨組決定把機管局和農場處合併，他在會上表示“同意”，會後對錢肇瑩等散佈不滿情緒，說“關於機管局和農場處合併後的性質問題，我有意見，我思想不通”。

一九五八年六月去湖北省農業廳參觀學習領導經驗時，張對該廳李廳長及辦公室主任說：“現在我們的工作就是趕不上去，黨組的同志對黨組書記有意見，省委也幾次批評我們，你們究竟和省委怎樣發生關係。”

整風後張敬堂同志和他交換意見，他說：“我把槍桿子都交給黨了，不會也不可能再到台灣去”。

二、嚴重的洩密，並散佈反動言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和王芳齋同志去湖北參觀農具時，張大肆宣揚自己過去的反共“本領”，說：“我是有名的張大胡子，在起義前當過團長，和譚啓龍同志較量過。譚有教導隊，我也有教導隊，教導隊對教導隊，營對營，他有幾個兵我都曉得，有一次和譚啓龍作戰，打響之後，我叫副團長先打機關槍，他就是打不準，他們（指我軍）一下子擁上來了，我對副團長說：你看我的！一梭子五十粒，打倒三十六人。後來他們（我軍）象屎克螂一樣一下子就退下去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去湘湖農場檢查工作，把黨內機密文件（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工作方法六十條）給政治歷史上有

問題的下放幹部陳希看。

三、挑撥是非，製造矛盾，進行宗派拉攏，破壞黨的團結。

張在平時經常散佈流言蜚語，說“×××是黨內的王牌，×××是黨外的王牌”，“張天成同志是隨風草，是適應氣候的”“楊副廳長是猴子臉”，“趙副廳長太年輕，缺乏經驗”，“張敬堂憑什麼？就是憑省委委員”。

在整風期間，任政同志給劉介中提了很多意見，張背後對劉介中挑撥地說：“任政早就要整你了，我是不同意的”。一九五七年十月，廳整風領導小組不同意李安幫（已開除黨籍）參加農場農具局整風領導小組，而張却在會上當着李的面說：“李副局長應當參加整風領導小組，他雖不是黨員，但他與其他非黨員情況不同，他過去雖犯了錯誤，但不是政治性問題，廳黨組研究亦是這樣的情況，講錯的話，由我負責”。

一九五八年六月黨組對黨員處長進行了排隊，張把排隊的情況歪曲是非地告訴王芳齋同志（副處長），他說：“老王，你怎么搞的，你搞了個不上不下。昨天黨組研究處長級幹部排隊，將你排到第二類。我的意見應排第一類，你工作積極艱苦，這一點黨組大部分同志都承認的，就是你的思想問題。楊廳長提到你過去的一段思想問題，應劃為第二類。張天成、任政同志都發表了意見。你在處里工作，楊俊達、張天成還不承認你。任政同志將你老婆退職問題，你找任政，你老婆找任政都聊出來了。張敬堂同志也提到你在長興參加社會主義宣傳時給他去過信，也給趙廳長去過信，你這些問題，楊俊達的看法是投機思想。經過這次排隊，我才曉得你也是個寶貝。最後通過楊俊達同志的意見，還是把你劃為第二類。”又說：“你南下後就当科長，為什麼上不去呢？楊俊達說了之後事情清楚了。”一九五八年六月黨組組員在部里集中學習之後，張對王芳齋同志說：“這次學習我發表了意見，過去那種做法是不對頭的，有些人一定要把劉介中逼向那條道路，要划到那邊去”（指右派道路）。為了拉攏宗派，以私人關

系安排人員，封官許願。一九五六年以他私人名义吸收了复員軍人岳魏洪、蔡文仲。該二人在吸收前經該局人事科审查有問題，岳犯过严重錯誤而受开除党籍、行政上降級的处分；蔡过去系伪軍官，情况复杂。因而不同意吸收，但张以私人关系將該二人吸收了，並且以私人名义介紹去乔司农場工作，封岳为机务科长，蔡当加工厂主任。一九五六年机管局將拖拉机手蔣志忠下放至皇天坂农場工作，张未經組織同意封他为“拖拉机队队长”。一九五七年初該局將有政治历史問題的范乐增下放至湘湖农場工作，他又封他为“副場长”。

四、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长期鬧地位、名誉、待遇，对党不滿，工作不負責任。

一九五六年初，他从部队轉业至农业厅后，对地位不滿，說农业厅有个团級幹部当上副厅长。言下之意，認為自己地位太低了。由于沒有滿足个人主义的欲望。就消极怠工，开会或彙报研究工作，他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報紙。

一九五八年七月由他帶領代表团去北京參觀农具展覽会，很不負責，一下車就利用机会去看自己的姪子，在五天中他只參觀了一天半，其余時間就是拔牙齒，睡覺。參觀結束叫他作總結並向大会彙报，他也拒絕不幹。

他来农业厅后已二年多，对自己分管的业务根本沒有鑽进去，只想做官，不想做事，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农場是他主管的，但連全省有几个农場也不知道。主管畜牧，很少和畜牧处同志研究工作，人家向他請示問題含糊糊糊，提不出意見来。去年六月全省畜牧工作會議，照理應該由他主持，可是他強調剛學習回來不了解情况逃避参加會議。去年十二月全省畜牧工作會議叫他作總結报告，他也推来推去不幹，最后推給李光同志去總結。对农具改革工作一直沒有抓起来說“对这玩意兒不感兴趣”。在生活上过分強調特殊，来农业厅后事务管理局分配給他房子不要，而长期住旅館，化了一千多元。

从上述問題来看，我們認為張俊升的国民党反动立場根本沒有改造，起义后虽在組織上入了党，但資產階級的立場观点根深蒂固，个人主义極為严重。轉业后对地位、待遇长期不滿，当沒有滿足个人主义欲望时，对党就心怀不滿，离心离德，籠絡人員，拉攏宗派，散佈流言蜚語，进行挑拨是非，污蔑攻击党的組織，破坏党的團結。决定將張俊升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

（已經省委批准）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二十支部关于 右派分子刘德焜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刘德焜，男，現年三十八岁，江苏丰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工作，同年六月入党。入校前任中共宁波市委書記。現为普通班二十支部學員，曾任二十支部支部書記。

刘德焜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曾借着向党提意見的机会，系統地攻击了党所領導的三反、新三反、肃反等运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建設，以及当前的整風反右派斗争，对党中央的正确領導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並对毛主席进行了污蔑和誹謗。他的反动言行表現在以下几点：

一、否定三反、新三反、肃反等运动 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績

他認為三反运动“有很大的缺点和錯誤”，“浙江省有百分之九十的假老虎”，“其他各地也是这样”。原因是中央“对情况估計有偏差”，“將刘青山、張子善、宋德貴的典型作了一

般，产生了扩大化”。是“由上而下规定打虎数字，要求过急，限期发动，打不出老虎来就撤职。”而打虎的方法，又“实际上是大规模的逼供信”。他还认为三反运动“在党内思想准备不够”，所以“不符合群众路线”。刘德焜对前三反同样认为中央把典型当作一般，前三反的根据是不足的。

刘德焜在一九五五年中央发布肃反指示时，就怀疑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他认为肃反运动又“是重复了三反的错误”。他说：“肃反情况的估计扩大化，由于潘、杨事件、胡风集团又把典型当作了一般。”百分之五的控制数，“是主观的，不合乎实际的”，“对敌情估计不够科学”。

刘德焜还反对党在肃反运动中的群众路线，说是“凭着群众热情去斗、硬压”。又说：“这次肃反搞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多是历史的，现行的很少，而且多是清理中暂时露头的，不用那个方法（运动）进一步查对也可以搞出来。”

他说我们的肃反“使知识分子伤了心，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墙和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还同情社会上右派分子的意见，要求公审胡风、公布材料。说：“群众要求公布为什么不公布？不公布老压着是否合乎宪法？”“胡风是文艺反革命，不同于五类反革命”，他认为：“三批材料不足以说服人。”

总之，刘德焜对肃反运动的客观需要和伟大成绩是完全否定的，因此，他不同意中央和主席对肃反运动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恶意地质问：“只能统说全国搞出八万反革命是不够的，是哪些方面？是新的还是老的？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斗争面有多少？”还说：“光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

刘德焜对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了攻击。他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跃进的一九五六年说成是紧张、混乱的一年。并且认为这

种情况是由中央“反右倾”造成的，是由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造成的。

二、攻击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污蔑、诽谤党的领袖

刘德焜认为中央在几次运动中反右倾不实事求是，“矫枉过正也成了规律”，“要求过急”，说“限期发动是强迫命令，提到思想上就是主观主义”。他说：“对几次运动的领导，中央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党校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资本论就是教条主义。他说：“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东西，离现实太远”。他认为学这些经典著作都是“离现实问题远，费力很大，收获不足”。

三、抗拒和阻挠整风反右派运动

刘德焜以上述对运动的态度来看待这次整风运动，他不同意中央对党内思想情况的估计。他认为党员的思想水平在逐年提高，三大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中央提出三大主义有发展他有抵触情绪。他认为中央在这次运动中又犯了“要求过急、限期发动”的错误，“三大主义年年反，要求过急，欲速则不达”。在社会上右派分子借着党整风机会，对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刘德焜对右派丝毫没有表现什么仇恨，反而在小组里传播右派言论，如朗读北大大字报“儒林内史”等。

校党委决定学员留校整风后，他片面地强调“以学习文件为主，联系思想是为了领会文件”，企图逃避思想检查。他认为：校党委所整理的错误思想汇集的材料，不是“科学抽象”，不能当作大家的思想情况。他又到处散布自己小组和本支部没有什么问题的气氛。虽经领导小组再三启发，他对自己的问题仍长期采取回避、掩盖的态度，企图蒙混过关。

八月上旬，支部提出他的问题后，他仍不肯进行检查，反而

利用別人代他向小組探听情况，进行摸底，以圖应付。在改造个别支委和支委分工时，他进行了一些非組織活动，来排斥反右派斗争積極的同志，企圖繼續操縱支部领导。

由于刘德焜身为支部書記，他的錯誤思想行为不但妨碍了他自己問題的解决，而且严重的阻碍了整个支部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八月中旬以来，支部对他进行了多次的个别談話和多次小組会、联組会、支部大会的批判教育。他对同志們的帮助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接受，但一直拒絕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十月十九日更發展到和支委公开对抗。最近，在十月底的联支大会上，他虽然給自己戴上了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对自己具体的思想活动交代仍不徹底。

从历史上看，刘德焜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受过資產阶级的学校教育，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参加革命以后，忽視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不努力改造自己，因此他犯上述錯誤，不是偶然的。

根据以上事实和分析可以看出，刘德焜是一个未經根本改造的地主資產阶级知識分子，在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他的立場、观点和党的路綫方針發生了根本抵触，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他不肯認真学习党的路綫、政策，拋棄自己的錯誤立場，而是对党心怀不滿。在这次資產阶级右派对党猖狂进攻中，他就暴露了自己长期以来和党的的分歧，本能地配合了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党内右派分子。

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德焜的党籍。

中共浙江大学第二次党员大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成浩党籍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

李成浩，男，現年三十八岁，浙江余姚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〇年六月在上海入党，一九四二年四月参加工作。历任政治交通、交委会委員、交委会代書記兼分站站长、随軍工作团分队长、区委書記兼区长、交通总站站长、工作队中队委員兼組长、民工管理科副科长、排副、教导員、接管准委会組織部幹事、省委組織部幹事、副处长、处长、現任浙大党委会副書記。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事实如下：

一、有組織有計劃的反对和破坏肃反运动

1. 肃反运动开始，他就以“省委組織部的幹部都是經過挑选的，不可能有反革命分子”为借口来对抗运动。当領導上提出联系实际，对肃反对象开展斗争时，他却強調以学习文件为主来对抗領導。他主张肃反要和审幹一样，只有先把事实調查清楚以后，才能怀疑、斗争。当时領導上批評他右傾，他認為这是压制民主，並揚言肃反运动中，“除了肃反斗争以外，还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2. 反对肃反的組織領導。他認為肃反运动中的五人小組是违反党的組織原則的，說苏联出过貝利亚，中国出过高崗、饒漱石，五人小組領導肃反很可能要冤枉好人。

3. 否定肃反成績。在临調出省委組織部的一次部委会議上，說肃反存在六大問題：（1）組織部对内情况估計不足，肃反不

够实事求是；（2）政策界限不清；（3）在当时这样的組織（指五人小組）领导下自己要發揮作用也很困难；（4）斗争策略不是先检查自己；（5）对党内右傾思想的批判压制了民主，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6）作結論处理时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执行不够严肃，脱离实际，材料出入很大。他不仅全盘的否定了省委組織部的肃反成績，而且否定全国的肃反成績。他認為中国受了斯大林的影响，也有“扩大化”的現象。

4. 李成浩在肃反問題上为了坚持他的敌对立場，在一九五六年七月間，利用他支部書記和处长的职权非法的把肃反中被斗争过的对象召集一起开会，要那些斗争对象訴肃反的苦。會議上有些肃反对象恶毒地攻击肃反領導，說“肃反領導是阿Q精神、是帶着有色眼鏡套材料”。李对这种污蔑党的自論不仅加以批判，相反的說：“这些情况是难免的，应当分別对待，有些是肃反本身的缺点，錯誤”。甚至还助紂为虐的說：“这是布尔什維克的义憤”。由于李一系列的罪恶活动，省委組織部曾一度被那些坏分子鬧得烏烟瘴气。

李成浩不仅在省委組織部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而且在他調来浙大之后，仍是旧調重彈。一九五七年三月在总支書記會議上佈置肃反总结时說：“不屬百分之五而斗争的，要公开道歉，誰斗的由誰道歉。”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1. 一九五七年四月間学习“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时，在机械系学习小組长會議上，袁若林彙报：有人認為等額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不民主。李当时也插着說：“是不够民主嘛，我也有意見。”

2. 李在省委組織部时，強調分权，強調民主，反对集中与統一，他說：“部长包办处的工作，分管部长到处里来一拉，处的工作积极性就發揮不起来。”他主张成立处委，並主张有些文件

不要部里审批，处里就可以签发。

三、反对整党建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

1. 根据王奎阁、陶匯章等同志揭发，李在省委组织部反对党的建党路线，主张接收富裕农民和一贯道徒入党。他认为富裕农民参加合作社之后，经济基础改变了，只要“其他条件够了”就可以接收入党，并主张今后不要强调批判剥削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在省委组织部讨论富裕农民入党问题时，李反对部里提出的不吸收富裕农民入党。为了证明他的正确，他还搜集了有关材料，与办公室主任争论。当中央“组织工作”上指示一般不吸收富裕农民入党，但对其中个别的经过社会主义斗争考验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吸收入党以后，便更积极的提出发展富裕中农入党并与姚震同志不止一次的争论。当省委组织部准备在“浙江组织工作”上刊登富裕农民一般不接收入党时，李坚决不同意。他还主张接收一贯道徒入党，为此，他还作了“典型调查”，认为有的县百分之七十一八十是一贯道徒，不吸收他们入党要影响建党计划及他们的积极性。认为不吸收他们入党是关门主义。不吸收他们入党要影响生产。

据陶匯章同志揭发，李成浩在建党问题上还主张降低党员质量。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全处干部会议上说：“有些非党员在党外进不来也有意见，建党质量与数量有矛盾，我们抓着质量问题不放，影响了非党积极分子的积极性。”

李怀疑建党政策，认为“有些建党政策值得研究，例如一贯道问题，富裕农民问题，独立劳动者问题等等”。

2. 李成浩在党的建设上，怀疑党的方针政策，否定整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曾在省委组织部部务会议上说：“一九五五年整党开始以清洗坏分子为主的方针是错误的，主要是受了肃反运动的影响。”又说：“一九五五年整党面很大，组织处理有偏差，今年整党有些党员听到整党就害怕”，所以一九五六年他要

人家不提整党，只提通过貫徹省二次党代会来达到整党的目的。他还否定过去整党的成績，对过去整党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說：“过去整党中教育是否充分？处分是否正确？处分是否做了工作？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綫是否划清了？是否处理錯了？”又說：一九五一年大整党的方針不切合实际，（1）孤立整党；（2）單純的处理八种坏分子，有否打击过寬；（3）工作队方式，不依靠支部。

3. 在处理党籍問題上，李一貫主張“为被告者着想”。有李明道等多人應該清洗出党的叛党自首分子，李不及时处理。只相信叛党分子，不相信县委組織部的調查。甚至还叫沈郁瑾和有叛党嫌疑的赵桂香到各地去核对材料，使有些坏分子不能及时清洗出党。

四、关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表現

据李子敬同志揭發：李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鎮压反革命表示不滿：一九五六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省委組織部召开党委書記會議时，报上公佈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問題棄权，李在談論这問題时指着报纸說：“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斯拉夫就棄权，这問題值得研究”。在一次小組學習会前又說：“第二次出兵是應該，第一次出兵是否必要还值得考虑。”还說：“铁托的看法是有些道理的”。

五、在鳴放、反右斗派爭中的表現

1. 去年五、六月間，党外右派分子攻击党的第一支毒箭就是否定浙大的肃反成績，李当时未經党委的同意擅自向群众做肃反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对肃反的必要性和成績未加肯定与分析，只是說肃反中斗了一百三十八人，現行反革命分子一人，这样造成了后来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借口，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說，浙大肃反是一比一百三十八，究竟成績是主要的？还是缺点

是主要的。

同时在那次大会上又公开的向肃反对象王子香道歉，說王健英同志过去在大会上講王子香是假自杀，对这一点表示歉意。

（王子香当时是肃反对象，問題非常严重，王为了破坏肃反运动假自杀，王健英同志在大会上揭發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2. 鳴放中肃反对象李毓奇、泮鶴声、居大圯、秦大年等人組成平反小集团去找李談，李和他們說：“肃反問題很大，人很多，錯的情况很可能的”，並答应他們到肃反办公室去看档案材料，有些是錯的材料可以拿回去修改。

3. 去年六月十二日公共教研組座談会上，党内外右派分子激烈攻击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論，說人民日报是压服不是說服，共产党沒有雅量等。而当时李成浩的發言說：“有不同的意見齐放爭鳴会搞得更好，过去领导上是畏首畏尾，是被动的，怕爭了以后压制了別的意見，今天却不是这情况。首先應該講現在不是收而是深入一步的放，大家不要有顧慮，对三害的斗争决心还很强，是否还可打破顧慮鳴放，自己認為是对的應該講。人民日报社論的觀點看法我想毛主席已講到：老幹部能不能批評？馬列主义能不能批評？只有批評才能辯明真理，究竟誰对誰錯还要大家爭鳴，一致公認。根据自己的理解大家爭鳴，最后得出真正的群众路綫的真理，这是最正确的。去掉三大主义，提高馬列主义水平，大家都要打破顧慮，維護真理，勇于为真理辯护。”

4. 右派分子为了攻击党的人事工作，組織調查組，調查退職退休問題，李未經党委討論擅自批准成立此組織。並認為这个組織沒有什麼錯。其实这个組織所做的事完全是反党活动。

5. 右派分子为了篡夺总务部門学习分会的领导权，提出学习分会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李也表示同意。

6. 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反对馬列主义的目的提出政治不考試，李也同意不考試，改为考查，或帶書“考”。

7. “还我教授、撤职霍校长”也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李在机械系二、三年級同学中报告說：党委对爭取归还教授是做了許多工作的。另外在总支書記會議上說：黨員也可以在撤消霍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因为霍校长自己也是不願意当校长。

8. 混淆敌我与人民内部的矛盾，去年六月底李在公共教研組领导小组会上說：右派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

9. 公共教研組陈良劲有很多反动言行，总支三、四次提出划为右派，李認為陈的反动言行是因为肃反中被斗錯了，鳴放中乘此机会出一口气，因而不同意划为右派。

根据以上事实，党员大会一致認為李成浩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由于他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已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損失。党委对他进行过多次的帮助，但李成浩对錯誤的态度很不自觉，开始在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上交代时吞吞吐吐，模稜两可，只談現象，不談本質，只談經過，不談思想，多方解释錯誤客观原因，甚至还強調自己正确的一面。經過党委扩大会特別是党员大会几次揭發和批判之后，直到目前，虽然承認了一些已經揭發出来的錯誤事实，但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还是躲躲閃閃。

根据以上情况，党委会一致認為李成浩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与巩固党的組織，經党员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人事局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同中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同中玉，男，河南省唐河县人，現年五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教員，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入伍。曾任鄂豫边区工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特委书记，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地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副部长兼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等职。

同中玉虽然参加党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改造，长期骄傲自满，摆老资格，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因而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不满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乘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积极破坏反右派斗争

同中玉从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审干中被审查后，长期以来对党的历次整党、审干、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抱有不满意情绪，认为“错打错斗现象严重，伤人过多”。一九五五年八月同调人事局工作后，当时局内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正对前副局长、党分组副书记李继胜（右派分子）挑拨干部关系、制造派别活动，对在审干、肃反中犯有错误的王育才（前二科副科长）、魏文超（前编委办公室副主任）进行袒护等错误，开展着思想斗争。他到局不久主持处理上述问题时，由于他在思想上对党的政治运动长期存在错误

的觀點，並且一貫擺老資格，自以為是，在處理過程中，不是按照黨的政策，聽取群眾的意見嚴肅對待；而是片面聽取犯錯誤者不符合實際的狡辯。他在所謂“防止過火鬥爭”“強調團結”的借口下，百般為犯錯誤者開脫。不讓支部進行嚴肅的處理，不相信外調屬實的材料，採取了壓制的辦法遏止群眾所進行的正確批評。並且把這一嚴肅的政治思想鬥爭說成是無原則糾紛，混淆大是大非的界綫。當別人不同意他的這種做法時，他便懷恨在心，說對他“不尊重”、“頂得很厲害”。反而把對王育才長期不向組織交待其反革命哥哥的歷史，魏文超隱瞞政治歷史所開展的批評，歪曲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對李繼勝所犯反黨活動所進行的思想鬥爭，歪曲為“整的下不了台”。並且和李繼勝一起，污蔑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是“宗派主義”。

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同中玉認為時機已到，便猖狂的帶頭向黨進攻。他在第一次動員全局人員鳴放大會上就首當其衝，向黨開炮。煽動說：“人事局的肅反、審幹、工資、福利等很多都不能令人滿意，大家鳴放要從最切身的問題揭發。”後來他又不讓其他黨分組成員、支部成員和其他黨員參加，獨自主持召開了黨外人員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他進一步別有用心地煽動群眾，要大家“從重大政策實施上的根本性問題鳴放”。把會中許多反動言論一律肯定為“百分之百的正確”，“有價值”。對右派分子彭松山、楊超平、譚好生惡毒的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肅反運動，反對統購統銷政策等反黨言論說成為“很活躍”，“很精彩”，“得到很大好處”，而大加表揚。與此同時，同中玉暗示右派分子彭松山，策動審幹、肅反對象魏文超向黨進攻。私自盜用黨分組名義請求省委肅反五人小組，給肅反中叛黨自殺的魯笑孔昭雪，攻擊肅反運動。背着黨分組和黨支部組織了所謂“宣傳鼓動組”，與黨分庭抗禮。在他的帶頭進攻和積極煽動下，一度把人事局搞得烏煙瘴氣。同中玉實際上已成為人事局右派分子的司令官。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同中玉见到形势不佳，惟恐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便利用职权上的方便，百般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他首先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故意把反右派斗争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把右派分子彭松山的大字报中最反动的部分在上报省委、省人委时删掉。进一步宣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是“抓住了人事局的关键，推动了鸣放”，是“大无畏的精神”，以松懈群众斗志，混淆是非，欺蒙领导。当群众反右派斗争的要求高涨时，他便采取了压制手段，公开阻挠。在全局人员大会上斥责要求反右派斗争的同志说：“又要人家提意见，又要批判人家，这叫啥！”又说：“你们过去整了人家，现在人家给你们提意见，揭了你们的疮疤，就是疼呀！疼呀！要是我同中玉，骂我几句也没啥”。并且又背着领导小组，把右派分子杨超平两次上报为左派。对杨超平的反党言行连小组批判也不允许，并限制群众不准说杨有右派言论。在他的这种反动言行继续受到群众的反对后，他的反党活动就更加活跃。他与右派分子李继胜密谋，借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名义，将坚持反右派斗争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大量外调；继续宣扬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鼓励右派分子彭松山不要害怕，指示彭作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同时捏造材料，并以“这是对于干部的一次考验”等卑鄙手段对群众进行拉拢，始终与党为敌。

二、一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反对党的领导

1. 居功骄傲，摆老资格，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在所谓怕影响下级干部发言的谬论下，在人事局两年多的时间内，只参加过一次党的生活会。

2. 在工作中一贯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极不民主。长期不召开分党组会议和局务会议，自一九五七年五月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八个多月没开过分党组会议，一年多时间没开过局务会议。重大工作都由个人决定。就是偶然开

会，也仍是按个人意见办事。对不同意见，不充分讨论，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3.经常散布流言蜚语，破坏省委领导同志的威信。同在一次参加了省委常委讨论全省整编方案的会议后，很不满意的說：“省委呀！讨论编制时，你一言，我一语，說了半天，也沒說出个啥道道来。”他因对省委書記赵文甫同志不滿，就散布說“人直了吃不开”（意思是說他因为正直而得罪了赵書記），来破坏领导威信。从他历次鑑定材料来看，一贯的驕傲自滿，認為党对他重視不够，使用不当，存在名誉地位思想，对党不滿。

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与其开展斗争中，态度极端恶劣，在确凿事实面前，仍然狡猾抵賴，不老实地低头認罪，企圖蒙混过关，直到現在还不承認是有意識的向党进攻。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一切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工資級別由十級降为十九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人事局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繼胜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李繼胜，男，三十七岁，山西省襄垣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入党。曾任县牺盟会协助員、太行五分区农救总会宣传委員、县抗联主席、中共县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县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組織部行政科长、中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办公室主任、河南省人事局副局長等

职。

李繼胜参加党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过去也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改造，长时期以来在党内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并且诬蔑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趁党整风之机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积极向党进攻。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一贯贪生怕死，计较名誉地位，玩弄两面手法，破坏党内团结

一九四八年李在豫皖苏四分区工作时，因敌情紧张，积极要求调到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去，並說“临埠地区水沟多，一旦敌人追来，不被打死，也会淹死”。后来組織上把他调到沈丘县工作后，在派其担任该县支援淮海战役支前队长时，李白天怕飞机，黑夜怕炮弹，躲在防空洞里不出来，讓勤务員給送飯吃，並还无耻地說：“飞机太多，这家伙和人无情。”一九五一年在中南局組織部任行政科长期間，他認為事务工作被人鄙視，长期情緒消沉。后来到中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任办公室主任时，又为正副主任分工問題对組織不滿。一九五五年三月来河南省人事局工作后，仍辜负党的期望，不积极努力工作，一方面自持特殊，官气十足，經常上班迟到早退（每次最少迟到在半小时以上），长期不过党的組織生活，对工作不負責任，所計較的是坐汽車、領安家補助費、住房等問題；另一方面，却又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別人，违背党的原則，积极拉攏犯錯誤的人，培植个人势力，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五五年，李利用直接領導肃反运动的方便，对前二科副科长王育才同志隐瞒地主成分，不向組織上交代其反革命哥哥的政治历史等錯誤行为进行袒护，故意顛倒黑白，把党内对王所开展的政治思想斗争诬蔑为“相互之間有私人意見”，並当着王的面否定已經調查屬实的材料。对于前編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魏文超同志有人检举其参加中统特务的嫌疑問題，在未取得充分旁証材料

前就加以否定，不主張外調，同時還誣蔑反映情況的省氣象局局長王治國同志“思想意識不好”，說“魏與王過去曾在一起工作過，兩個人可能有私人意見”。對於長期隱瞞反革命父親的政治罪惡經再三教育拒絕交代而被取消候補黨員資格的高鶴年（現系右派分子），李親自參加支部大會舉手通過，背後又說“真可惜”。對參加工作前（在土改時）曾經幫助反動富農家庭對抗群眾算賬，參加工作後又未改變原剝削階級立場、個人主義嚴重的彭松山（右派分子），因能迎合其思想，便積極活動要提拔彭為第三科副科長（因遭反對，未遂）。把前人事廳廳長李劍波同志在向他介紹幹部情況時說武殿明（右派）腦子有點胡塗，說成是對武的侮辱。抓住彭松山（右派分子）在肅反小組會上說人事局有宗派主義情緒一句話，便無根據的大肆宣揚說人事局有宗派主義。

一九五五年八月同中玉（右派分子）到人事局擔任局長後，李又背着分黨組和其他領導同志，把他一手所製造的所謂“人事局有宗派主義”的反黨思想，積極向同灌輸。當大家同他這種錯誤行為開展鬥爭後，在同中玉的主持下召開了有關縣級以上部分幹部會，李見到形勢對自己不利，又假裝檢討性地說：“沒有宗派主義，是自己弄錯了”。但到一九五七年李從中央高級黨校放寒假回鄭，卻又背地裡對同中玉說：“過去大家對他的批評，思想上不能接受。”同時策動同中玉為在肅反運動中叛黨自殺的魯笑孔昭雪，企圖把魯的自殺說成是所謂“宗派主義”者整死的，以此和同中玉的所謂：歷次政治運動傷人太多的思想相吻合，嫁禍別人。

二、積極同右派分子同中玉阻撓破壞反右派鬥爭

李是機關整風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對群眾要求向右派分子彭松山、楊超平開展鬥爭，不予支持，公開不表示任何態度，暗地裡却和同中玉一起進行阻撓，對同說：“彭松山不是右派，永遠

也划不上”，“中央高級党校的右派分子都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彭松山的材料够不上划右派的条件”。为了徹底遏止反右派斗争，又借紧縮机构、下放幹部和調一部分幹部作文教工作的机会，与右派分子同中玉密謀，把坚持反右派斗争的骨幹和積極分子大量外調，在省委指示停止我局下放幹部后，李和同仍坚持下放，並將右派分子楊超平也上了下放幹部的光荣榜，公开对抗省委的指示，阻止群众斗争，保护楊超平。与此同时，策动肃反审幹对象魏文超向党进攻。当领导小组会上大家要划彭松山为右派时，李一面說：“是否右派，我无定見”；一面又在散会后馬上催促同中玉赶快到省委找馮登紫副部长談一談，企圖蒙混領導。特別恶劣的是，李要将坚持斗争、積極揭發其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陷害好人的楊文元同志說成是“洩露肃反机密，攻击領導”。企圖將楊划为右派分子，进行陷害。

三、对苏联紅軍援助匈牙利平息叛乱和党的合作化运动，統購統銷政策不滿

一九五七年李在中央高級党校學習时，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不滿，質問別人，“有什么理由？”誣蔑合作化运动說：“乡政府的油票、布票没人要，上中农收入減少，判五年徒刑也要退社。”並說：“河南灵宝出苹果，但无苹果吃，出花生但沒有花生吃。”並說“省委，省人委站崗取銷后，群众打官司的增多了”（純系捏造）。以此攻击党的合作化运动和統購統銷政策，丑化党群关系。

李繼胜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被斗争中，态度仍然極為狡猾，在鉄的事实面前仍採取蒙混抵賴，避重就輕，拒不老实交代。經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並建議行政上給予撤消一切职务，实行劳动教养。

中共洛阳地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巨和勤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巨和勤，男，現年四十三岁，山西省安澤县人，貧农出身，小手工业者成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区长、县府科长、副县长、县长、县委書記、專員、地委副書記等职。

巨在平时阳奉阴违，好人主义，对坏人坏事不斗争。如历史反革命分子毛友峰已被开除回家不該恢复工作，而找到巨后，他个人决定“令財貿部分配工作”。已被开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賈金榮，也是巨决定分配到教育科工作的，当时有的同志曾提出不同意見，巨非叫安置不可，同时还召开公、监、检、法四个部門會議，叫改原判決書，会上大家不同意，巨說“不改也行，反正糊糊塗塗收回算了！”巨参加研究对伊阳王蔓美坏分子开除回家的处理，当时他表示同意，而在处理时，却按退職办法处理，並錯誤的認為“这是为了避免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秋季在省里开粮食會議，給各县分配購粮任务，撇开原有基础，以主觀願望出發，因此偏差很大，回来也不向地委全面彙报。

整風开始他是地委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却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在专署黨員科長鳴放會議上放毒，說：“中心和部門的矛盾，这是牽連到領導作風問題，从党委看，有包办代替，各部門有依賴思想，感到咱說不算，以党代政从上到下，不是一天，是很長時間了”，“地委啥事就包办，攬事太多，不能冷靜考虑重大問題，領導和被領導有些工作抓的多，有些沾不上边”，

“另外發展到党委部門的幹部提拔的快，形成宗派主义”，“这个原因是对統筹兼顧、統一安排搞的不好。”整風鳴放以后他回家（山西安澤县）一趟、回来后認為合作化搞糟了，对李天堂同志說：“在我們那里，过去是米粮川，現在是沒啥吃，我回去了解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与右派分子晋东平談話說：“地委苏副書記几个問題都决定錯了，如三門峡物資供应問題錯了，人民医院問題都处理錯了。”有意誣蔑領導，整風中地委批評运输站不給調車問題，巨不仅不教育站上幹部，反而挑拨說“地委有权，耍威風”。

巨和勤虽然出身成份好，参加工作后也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資產階級本質未得到徹底改造，在处理原則問題上喪失立場，上下应付。阳奉阴违，执行党的政策沒有原則性，对坏人坏事不斗争。整風大鳴大放之时，他向党的組織、幹部政策、农业合作化等根本性質的問題进行了攻击誣蔑，企圖取消党对政府的領導，反右派中对自己反党論点不作检查，地委扩大會議揭發他的問題后，仍企圖瞞混过关，会上承認，会后推翻，並說“真不行了，只有假檢討”，“自己原意不是这样”，“記錄搞糟了”，“是帥不强，將遭殃”，“記錄害了他”等，企圖爭取別人同情，最后在同志們斗争帮助下，才作了檢討。从以上事实說明巨和勤已构成右派分子，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規定，地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巨和勤的党籍。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天行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石天行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學員，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十八支部的同志揭發了石天行很多極為严重的錯誤，經過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學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石天行的右派面目。第十八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石天行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過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八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江西省委的意見，得到了江西省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 关于右派分子石天行的政治結論

(一) 簡 历

石天行四十岁，江西省乐平县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历任区委書記、县委委員、县委書記，淮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編輯，大众日报社通訊部副部长，紡織厂厂长，省木材公司經理，省建筑工程局局长等职。来校前任江

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

(二) 主要錯誤事实

(1) 否定中央正确领导，污蔑攻击党中央

石天行认为中央几年来领导有“左倾”和“冒进”的错误。他指责说“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损失太大”，“反右倾很彻底，反左倾不具体，无控制数字，所以往往冒进”。他说“风都是从上往下刮，一级比一级大”，并把责任推之于中央的“好大喜功”。他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样认为：“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有些公式化，到处套用”。污蔑：“上边缺点都是归结为情况变化上，是辩证法，”据此指责中央及中央负责同志“自我批评精神不够”。

他歪曲当前农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他说“农民生活确实苦”，从而怀疑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自愿性及合作化后的增产数字，提出要“中央对农业增产应重新估价”。

他否定党加强工业战线干部的正确性，他说：“转工业把农业干部抽空了，下面抽空，上面人浮于事”，“这是个带路线性的错误，应追查责任”。

(2) 攻击江西省委，否定企业党委领导制度

石天行污蔑江西省委的负责同志是：“不了解情况，不认真研究工作，不学习理论”，缺乏群众路线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并且认为：“江西的老干部多，选举时新干部很难选上”，“有些人年龄大了，体质太弱，实在不能工作，硬要照顾，占茅房不拉屎”。他认为江西党对他“使用不当”特别恶毒的是诋毁江西省委“爱歪才，很世故的人；真正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并不多，而且还吃不开”。

他否定党对国家企业的领导，他认为“有些企业党委成问题，只找麻烦，不起作用。有了缺点错误说是行政管理不善；工作上有了成绩就说是党委的，这样书记总不会犯错误”。

(3) 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主张改变党的干部管理制度

石天行說：“做工作要有‘靠山’，有人說党内要認个‘干老子’才行。我感到也有道理。”他又說：“有的同志很世故，善于附和领导意見，摸领导的脾气、关系，这样反而吃的开。”

在干部管理制度上，他主张：“共产党员在选择工作和地区上应有更多自由，可以大计划小自由”，甚至他还認為在干部調配上也要使用“价值規律”。他主张調往边远地区的干部“可以提高他們的地位和待遇”。

(4) 丑化党的民主生活，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

小組讀了少奇同志在湖南的报告，有的同志提出“要坚持原則”“头上要长角”。他說：“长角不容易，誰敢頂，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鋸掉角，而且会砍掉脑袋。”他認為“党内民主仍然不够”，“有些领导同志不願听反面意見”。並說“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来，反左的时候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来，並且还有数目字”。

他反对党的选举制度，他埋怨党内的选举“不許竞选”，“不許活动”，“等額选举是形式主义”是“不相信群众的觉悟”。

(5) 積極推崇右派分子言論，为右派分子辯护

在大鳴大放期間，他曾說：“对党外人士（右派分子在內）所提意見，基本符合整風精神”；“不能說你好，你就高兴，說你不好，你就不高兴”。甚至对葛佩琦也認為是党整了他，才發表了坚决反党言論。他特別贊賞費孝通的“江村調查”的文章，說是“硬是把道理說透了，小組同志都应看看”。当小組討論右派分子张宗麟的反党錯誤时，他認為可能是党“对张使用不当”。直到八月三十日他还認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与反右派斗争有矛盾”。並說“除了主席講的六条标准，还有什么放的呢？就沒有人敢放了”。

(三) 錯誤的根源

石天行發表了以上一系列的錯誤言論，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

石天行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受地主資產階級的教育較深。入黨以後，未得到根本改造。解放后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慾望就益滋長。在一九五一年去香港採購紡織機器時，就接受商人賄賂三千五百元港幣，並出入于賭場舞廳，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為此在“三反”中受了處分。他雖一時表面上老實起來，但內心對黨不滿，離心離德，陽奉陰違。他在入學前寫的讀“關於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筆記中，就暴露了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等問題上的反動觀點。所以當鳴放時期，石天行就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上公然向黨進攻了。

(四) 對錯誤的態度

石天行在對待自己的錯誤態度上是極其不老實的。他一開始就盡力縮小和掩蓋其錯誤事實，企圖蒙混過關。他的陰謀破產後，更進一步下決心對組織進行欺騙，一再串通他愛人（蔣華）塗改向中央提意見時的發言提綱，甚至偽造信件，撕毀證據，企圖滅跡。在核對他的錯誤言行材料過程中，他仍然狡辯抵賴。他在支部大會做檢討時，雖較前有了些進步，表面低頭認罪，承認他是黨內右派分子，願意接受改造，重新作人。但他會後所寫的正式書面檢討，仍把錯誤縮小為嚴重右傾思想問題。在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對早經核對清楚的、也為他歷次承認了的錯誤事實材料，提出了十九點修正意見。仍企圖縮小錯誤和翻案。經過支部大會再度批判後，又做了書面的補充檢討，終於承認了他的一系列反黨言論和他在檢討過程中的錯誤態度。

(五) 結 論

根据石天行以上的錯誤事实，可以看出，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他公然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为了巩固党的組織，純潔党的队伍。根据党中央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第十八支部大会全体同志一致通过，开除石天行的党籍。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 关于右派分子金凱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金凱，男，現年三十五岁，浙江慈溪县人，本人学生成份，家庭出身地主，現有文化程度大学，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軍，一九四五年入党，历任文工队员，报纸編輯，採訪科长，新华分社記者，採編主任，副主任，副科长，一九五七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一貫对党不滿，对抗領導

金凱，从湖南調江西工作后，常說湖南分社和党支部“一团糟”彼此“勾心斗角”。在平时金对湖南省委和总社領導逐个評論，說省委書記周小舟和宣传部长唐麟同志“官架子大”。金又說：“总社×××是个外交官，常随周总理出国不管新华社的事情，×××是个大肚子，什么意見都能容納，就是不頂事。”

金凱還經常在同志中散佈“向總社提意見不解決問題”，並說：“總社開會也不解決問題，事先準備好了的一套報告，沒有什麼味道”，“分社長去總社開會象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金調江西前後，曾向總社提出“原在江西分社的記者全部‘刮掉’否則不來”，從而迫使總社把原在江西的三個記者調走了。他們選擇幹部的原則是“單純”肯幹。

在鳴放初期，金有意挑撥分社記者與總社的關係說：“總社眼里只有幾個大分社，不重視江西小分社”。在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金對記者們說：“總社企圖把矛盾轉到分社頭上來，實際分社和記者是沒有矛盾的，記者的矛盾主要是和總社的矛盾。”

在“左葉”事件發生後，金認為江西也有“左葉”，並積極活動召開江西新聞界座談會。

二、篡改分社工作方向，不搞反右派鬥爭的報道

從今年三月以來，金在記者中極力渲染“稿件沒有出路記者處在半失業狀態”。當有的記者因發不出稿件而着急時，金說：“稿件沒有出路，只有寫專稿，不要搞中心工作報道，要鑽冷門”。又說：“不要光看到中央幾家報紙，眼應向下看，省報、地委報、縣委，還有很多雜誌，都可給他們寫稿”，“只要用一個記者頂着，給總社發新聞，其餘的記者都可以下去寫專稿。”金先後兩次赴上猶江電站去採訪專稿。從而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很多記者在金的指示下，也去採專稿了。

反右派鬥爭開始，記者們要求研究參加反右派鬥爭的報道，金說：“估計發不出什麼稿子。”

總社決定王介方（金的妻子，以下簡稱王）和另一個記者去羅隆基家鄉里採訪。王介方對另一個記者說：“老金對我說，現在還工作幹什麼？”

三、策动群众鬧事、搞大民主，向八省分社点火， 联名通电，反对总社

在大鳴大放期間，金以“稿件沒有出路”問題說：“当前國內分社的主要矛盾是稿件出路問題，总社學習苏联先进經驗是教条主义，稿件只管發不管用，就是从塔斯社学来的。”在这同时積極的串連了河南、广东、福建、湖南等八个省共二十个記者向总社联名通电。

五月十八日，金、王起草电报稿說：“总社的官僚主义，已發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当前地方分社新聞出路几乎陷于絕境，形势的严重，已逼着我們从根本上考虑改变地方分社的任务和业务方針。新聞无出路，分社記者首当其冲，因此，我們体会之深，苦悶之甚，决非总社领导所能深切体会。召开記者代表大会，总社领导听一听直接生产者——分社記者呼声、苦衷，听一听直接受害者——分社記者对解决这一問題的见解，帮助总社整風，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並表示“现状不改变，我們决不停止这一斗争”。

在金的授意下，王介方、馬鑑明積極的和別省分社串連。在串連中，金指示說：“只串連对稿件有苦悶的社，只串連記者，不串連社长。”王說：“現在不要告訴总社，这样他們会有准备，等串連好后，再告訴总社。”王还鼓励別人說：“現在正在大鳴大放，总社不敢批評，黨員在带头鬧事，你們怕什么呢？”在串連中，金也亲自打电话和湖南分社长串連。

在和各省分社記者串連时，金凱又以两面手法向总社打电话說：“記者不滿意社务會議的传达，記者已經和很多分社的記者联名，請求召开記者代表大会。我自己沒有办法，很为难，不能脱离群众。”並說：“广东分社記者还要去北京請願，要是我們这里有記者去，也就只好叫他們去”，“現在分社記者处于半罢工状态。”

当总社对金凱串連別省記者發通電問題給予通報批評時，王介方說，當時不該與湖南社長聯系，現在他告了我們的狀了。金說：“不要把矛盾轉向分社之間，這正是上了總社的圈套，要把矛盾對准總社。”

四、積極地準備辦同人報

金、王在策劃通電事件的同时還積極的想辦自己的一張報紙，並且還組織人員進行討論，在討論中王說：“這張報紙的形式要學民營報紙的形式，象新民晚報一樣，內容要有趣味性，軟些、廣些，可以登女演員的私生活、市場行情、人物羣眾、體育新聞等。南昌有很多學生看江西日報感到枯燥，決不登新華社消息，不登黨委指示、大報告，不登人民日報社社論，但可以轉載香港大公报的新聞”。“辦報的人不要多，只要我們這一攤子就行了（指當時在會的人）。每人可先拿出兩個月的工資來作經費，還可以向銀行貸款。紙張問題，只要我們辦的好，省委書記也會看，這樣，看江西報的人就少了，紙張也就有了。”

根據上述材料，經省委整風領導小組批准劃金凱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送國營農場實行監督勞動。給予生活補助每月暫定六十元。

中共中央民族學院分院委員會關於 開除右派分子張文藻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九年五月）

張文藻，原名張景惠，男，五十歲，湖北黃岡人，家庭出身小工商業者，本人成份小學教員，一九三一年擔任漢口赤色互濟會會長時被捕，後轉入反省院，於一九三五年在反共宣言上簽

名，不久被釋放，一九三六年二月在上海入党，同年再次被捕，一九三八年出獄，一九四七年重新入党。曾任科长、副处长、副局长，一九五五年冬調来我院任副院长，后又兼院党委副書記。

在整風和反右派斗争期間，张文藻反党罪行主要事实如下：

（一）煽动点火，攻击领导

张文藻和前院长李守宪同志长期隔不团结。鳴放初期，由于李守宪同志思想作风上的錯誤，当时成为群众鳴放批評的主要对象。这时李守宪同志因公去北京未回。张文藻即利用这一机会，一面以“照顧”李守宪同志身体为藉口，向省委文教部建議不讓李回院；另一方面却積極支持对李守宪同志的攻击的言行，甚至直接鼓动党委办公室的几个秘書說：“李院长的問題，不是思想問題，是品質問題，你們知道的問題多，應該坚持原則。”又在党委会上說：“我不怕上級党委和同志們誤會我，我是副院长，他是院长，想把他搞走”，“我不怕別人說篡夺領導权，我对学校工作不大想搞。”其实，当时並无人怀疑他。当領導上同意了他的意見，並通知李守宪同志可暫不返院后，他很快告訴了右派分子岑家梧，这时右派分子們在群众中煽动說：“李院长不回来是有意逃避运动。”他却又不向群众解釋說明原因。

在鳴放中反党分子放出許多毒草，如“要李院长下台，岑家梧上台”，“反对党委制”，以及煽动学生討論“西藏該不該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該不該收归中国”等等。右派分子气焰十分嚣张，群众思想非常混乱，積極分子不敢發表正面意見。大学报撕去也不敢追問，形势如此紧张，党员和党委委员会曾要求张文藻召开党委会研究，而张文藻不仅不採納大家意見，反而給大家扣上“沉不住气”和“一貫左乎乎”的帽子，群众認為这种形势不对头，他却認為“很正常”。並說：“現在已到火候，党內外的問題都要解决。”不仅如此，五月下旬当李守宪同志由北京返院后，

当时右派分子反党活动已到極其猖狂的程度，但张文藻反而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领导，在李守宪同志返院的第二天，张文藻就在党委会議上提出：“要考虑重新改組党委，改选团委和工会組織，（右派曾提出罢免团委中黨員幹部和工会幹部）”，並說：“院行政組織也可以考虑一下，党内民主要解决，不發揮民主，积极性發揮不起来。”在当日下午和次日早上接着連續發生两次反对党委，要求設立专门机构领导整風的签名运动，而张文藻在第二天晚上的党委会議上却以这两次签名为理由，再次要求改組党委。

在大鳴大放期間，张文藻惟恐天下不乱，还从党内制造混乱，如在鳴放內容上抗拒上級指示。关于党内机密不能拿到群众中去放，省委文教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就作了指示，但他否認党内有机密，強調黨員和党委委員带头放，什么都可以放，並在群众动員会上煽动說：“要注意国内外的政治問題。”有的党委委員提出：“带机密性的問題要慎重”，他立即反对說：“党内机密交代下去，不放是不合适的，若向下面交代，顧慮多了放不开，故不須作机密規定。”並說：“肃反中对党委提的意見也可以放，这些問題不必限制，我們不要为官僚主义辯护，肃反没有什么机密，什么都可以放。”他的意見传达后，黨員思想不通，反对这种作法，而张文藻却說：“你們不放別人也知道。”尤其是当时党委副書記黄明家同志五月十八日在党委会上传达了上級关于机密問題不能放的具体規定后，他馬上反对說：“不明确什么是党的決議，中央省的決議不放，支部、基層的決議是否可以放？省里开的一些会並不算決議。”並且說：“党内什么都可以放、黨員和群众一起放，不能脱离群众。”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黨員同志向反党分子告密，以便更恶毒的攻击党。所以当右派分子誣蔑攻击肃反运动，黨員戚务华同志据理和右派分子展开爭論时，但张文藻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批評戚务华同志“你了解肃反情况，你乱說什么”。不仅如此，张文藻还歪曲事实在群

众中制造思想混乱，給右派分子制造反党的机会。如在学院經費开支上，按規定每月直接和間接用于每个学生的各种經費有三十四元，但右派分子在鳴放时捏造說：“上級規定每个学生費用是三十九元，现在只用了二十一元，还有十八元学校集体贪污了。”鼓动学生起来“清还血債”，並要“燒房子”。为此，党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責成张文藻向学生解释，說明真象，以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开会前會計科还将各項开支数目列表交給他，但他在会上講时，却不按會計科所列数字說明实际情况，而仍說：“是三十九元，怎样用的我不清楚”，致使学生鬧得更加厉害。

（二）阻撓破坏反右派斗争，包庇右派分子

鳴放期間李守宪同志去了北京，整風运动由张文藻亲自领导，当时暴露出来的右派言行，他都了解，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张文藻不但不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組織批判，相反的他極力叫囂，不解决所謂肃反遗留問題，不能进行反右，为肃反对象翻案，向党进攻，致使反右斗争迟迟不能开展。此外他还束縛群众的手足，限制群众揭發批判右派言行，他在布置学生战綫反右派斗争会上說：“右派應該是煽动罢課的，专科右派面不会寬，預科主要是划清思想界限，少数民族学生尽量少搞。”並且說：“右派怎么搞出来，应依靠群众决定，我們事先布置搜集誰的材料，不妥当，因为在运动中要整誰为右派，是很容易的。”对于訓部支部書記凡斌同志說：“反右派斗争，象在戰場上一样，班长看排长的脸，排长看連长的脸。”还說：“崔甦（幹訓部右派分子）要不是在民院，不会变成这样。”这些，实际上是在繼續散布右派言論，歪曲上級指示，模糊群众認識，替右派分子开脫罪責。他对专科副主任尤甫盛同志說：“其它单位的右派是群众說出来的，我們领导上去搞不應該。”但是当幹訓部的群众正在揭發和批判崔甦的右派言行时，他却把正在主持会議的支部

書記凡斌同志喊去，严厉指責說：“你們无組織无紀律，乱搞，內外問題不分。”在群众揭發批判楊天林，（幹訓部右派分子）的罪行时，张文藻不止一次的給群众泼冷水，說：“楊天林的問題是思想問題，自由主义問題。”

张文藻除了阻撓制止群众对右派分子的罪行进行揭發批判外，並支持、鼓励右派分子繼續向党进攻。如右派分子崔甦在群众揭發和批判他以后，几次找张文藻談話，张文藻不是責其低头認罪，而是鼓励崔甦說：“应实事求是，你以为对的不要犹犹豫豫，要坚持原則，对有些問題的看法，思想通了就是通了，不通就是不通，問題弄通也要有个过程。”崔甦經過几次批判后又去找张，並將批判的問題告訴了张，张說：“如知識分子政策，李院长存在不少的問題，你不一定是攻击党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时反对个人不一定是反对党。”崔甦知道党委决定划他为右派后，他又去找张，张对崔說：“爭取真理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好好总结經驗，使自己在爭取真理的斗争中，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在爭取真理中，可能有誤会，有时甚至很多年才能弄清楚。”經過张文藻这样的几次談話后，使崔甦長時間不肯低头認罪，並公开說：“要划我为右派比上天还难。”

又如群众在揭發批判右派分子李健衡时，李思想不通去找张文藻，张也对李說：“你这个人主要是脆弱，不要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則，否則也是不老实，民院历史上的問題錯綜复杂，即使一时弄不清，将来还是可以弄清。”右派名单定案后，党委召开右派分子座談会，通知李健衡参加，他思想不通，又去找张文藻，张却說：“当前內外矛盾錯綜复杂，有些看来是內部矛盾，則是外部矛盾，有些看来是外部矛盾，則是內部矛盾，参加会的不一定都是右派，不参加的不一定不是。”並說：“自己的看法就是自己的看法，不要說受了別人的影响。”张文藻还对李健衡說：“你的問題还未研究，不要有个人想法，什么思想負担啊！那有什么关系，該工作就工作，該

學習就學習，該玩就玩，最多不過勞動改造，我們過去在白區坐牢，還不是平常的事！”李健衡說：“過去在白區是對敵人，現在和過去根本不同”，張說“這也可以說是對敵人，因為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向自己認為壞的東西作鬥爭。”

張文藻不僅如此暗地里鼓勵和支持右派分子，而且還多次在會上公開的為右派分子辯護，如右派分子潘世昌以少數民族教師身分，在課堂上無中生有地煽動說“不尊重我們少數民族風俗習慣，肅反時硬要回民吃豬肉”（根本無此事）。並提出：“西藏該不該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該不該收歸中國？”等問題，要學生討論。當黨委討論潘的問題時，一致認為潘世昌的做法是煽動少數民族學生鬧事，而張文藻卻說：“是事實可以講，這犯民族政策可以講，有缺點不能不叫講，潘世昌並沒有提出罷課罷教，今後還要擴大民主生活，什麼都可以講，我們沒有限制這些問題不可在學生中講。”會後張文藻還曾對整理潘世昌材料的幹部說：“潘的材料你們要很好查對一下，據說潘的教案中沒有這個問題（指討論西藏和蒙古問題）。”這些反黨言行怎樣會寫在教案上？！他是企圖替潘世昌打掩護。

黨委要研究右派分子黃亦青（張文藻的愛人）的問題，張也是百般庇護，原黨委書記李守憲同志在黨委會上提出討論黃的右派言論，張文藻馬上頂回去，說：“黃放的沒有什麼問題，都是對你個人的問題，好吧！要討論，任何人都可以討論，還有人檢舉你有右派言行呢！”

（三）攻擊肅反運動，污蔑幹部下放政策

肅反運動中，因武漢市委根據肅反對象×××交代：過去曾有反動證件放在張文藻的愛人黃亦青娘家，黃亦青母親死後，有部分東西轉來黃亦青處。在肅反中因市委派人前來索取證件，黃亦青拒絕檢查，後經高校黨委批准進行了搜查。為此，張文藻極度不滿，在肅反問題上長期對黨進行攻擊、誣蔑。張文藻說：

“武汉市的大搜查是不恰当的，波动面大，脱离群众，中央曾批评过武汉市。”並說：“对黄亦青的搜查，高校党委和民院党总支沒有坚持原则，是无理非法，不近人情的搜查了我的家庭”，张还說：“我几十年来受的冤枉不少，有些好事往往当成坏事。”

民院在肃反中斗争“广东宗派集团”（后結論为落后宗派集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作法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錯誤，当时张文藻也亲自参加和领导这一斗争，情况他完全知道，但在鳴放中右派分子攻击时，他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与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叫嚣“搞錯了”，直到反右派开始后，还在叫嚣“不解决肃反遗留問題不能进行反右”。

党委决定，张文藻的爱人黄亦青下放劳动鍛炼，张則說“不近人情”，这对幹部是“惩罚”。教师朱秀武同志下放劳动鍛炼，是党委决定的，张文藻在背后对朱秀武同志爱人韓荣宝同志說：“因朱秀武提了李院长的意見所以李院长要他下放。”以挑拨领导与被领导之間的关系。

* * *

张文藻墮落成为反党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極端个人主义發展的结果，早在一九三八年因党組織审查他被捕后的情况未及時恢复他的組織关系，对党抱有極大不滿，当时竟拒絕接受分配工作，以自行开辟工作的理由同党組織断絕关系，对党积怨很深。他曾在1956年十二月写的自传中，对当时的党組織和党的負責人，进行恶毒的攻击，說：“××同志那时盲目执行王明路綫，但是那时以王明为首的党内負責同志所号召的‘拥护国民党，拥护蔣介石领导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近乎对敌人的投降，与象处理我这样的問題，对照起来，使人感到不公平，不明确党为什么这样厚于敌人而薄于同志。”至于对肃反中黄亦青被搜查一事，更是长期不滿，怀恨在心，甚至認為是李守宪、徐少岩（前副院长）两同志

打击他，因而也成为和李守宪同志搞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张文藻上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去年四月分以来，先后召开许多次会议进行揭发批判，但他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始终不老实检查交代，低头认罪，一直抱着顽固对抗和无理抵赖的态度。最近党委将对他处理的决定稿给他看后，在他写的意见书中不去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恶毒地攻击院党委说：“党委是在传达李守宪的那种不实事求是的口吻，这是由于被李守宪三十年党龄所炫惑，被李守宪那种纵横捭阖的一贯在党内耍手段的狐迷所迷惑”等等。以此诬蔑党委，这种恶劣态度，只能说明他是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张文藻这种思想、态度和行为不仅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坚决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

根据上述事实，
籍，建议行政上。

党
及。

中共湖南省委监委

关于右派分子邓鈞洪的处理结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邓鈞洪，男，四十二岁，湖南耒阳人，家庭出身中农，成份职员。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失掉联系，一九四六年二月恢复组织关系后，在冀察辽解放区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先后任新湖南报组长、秘书长、副总编辑，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级别十一级。极右分子。

一、主要反动言行

(1) 坚持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办报路线，反对党的领导。他攻击报导先进经验技术是“灰溜溜的一大片”。“尤其是滥发一般的、琐碎的、重复的经验技术和工作方法，就是不好，缺乏政治内容与思想内容；是教条八股，内容枯燥，这样的报纸没人看”。他主张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报导”。要发挥“对工作的监督作用”。对于“穿花衣、烫头髮，一鴨四吃”等报导大加贊揚，主张报纸要“打扮得象姑娘們穿花衣一样漂亮”。

(2) 頑固的反对党、反对省委对报纸的领导，誣蔑省委的领导同志。对唐麟同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代表省委对报社的批評，邓公然表示“完全不同意”。还说：“我才不检讨哩！不检讨大不了，不升官發財”。省委書記周惠同志第二次提出批評时，他當場說：“这不仅是委屈，簡直是冤枉”。当周礼同志（省委書記）要他冷靜些时，他說：“我們从来都是把省委的一句話当做聖旨，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还对苏辛涛說“党内問題是經常要翻案的，今天肯定的东西，过个时期就会否定”。还誣蔑說“上面民主多，下面民主少”。他公然对党支部和人事科說“分党委布置工作嘛！你們願搞就搞一下，不願搞就不理他”。誣蔑說“周惠同志不懂报纸的特点，外行，对报社有成見。小舟同志过去当过宣传部长，怎么也同意周惠的意見”。誣蔑官健平同志（报社总編輯）“有点象旧社会那种逢迎的人，外面装得党性强，組織性强的样子，思想深处都是不干淨的”。

(3) 邓鈞洪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亲自在报社先进生产者、工作者給奖大会上为了貫徹他的反党新聞观点，作了一次“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他主张将取消报导先进经验技术的反党決議分送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厅，“讓他們也知道知道”。积

極支持搞反黨的展覽會，攻擊省委指定刊登的一些稿件。並排擠打擊總編輯官健平同志，他攻擊說：“官不僅文字不通，而且很驕傲，不懂、不鑽，光靠党性吃飯，官過去只在偽國民日報當過校對”。並指使傅白蘆等人找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同志反映報社所謂“全面情況”，說“黨內有這樣一種人，對上級裝得畢恭畢敬，對下面就沒有人家說的，粗暴跋扈得很，應讓省委了解了解幹部”。傅白蘆便按鄧的授意寫了一篇“沒有意見的人”發表在新湖南報湘江副刊上攻擊官健平同志，還公開提出要官退到第二線。鄧是新湖南報反黨集團的首腦分子。

二、鬥爭中的態度

鬥爭開始時，頑抗抵賴，不願老實交待，以後在事實面前承認了反黨罪行，表示願意悔改。

三、處理結果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經省委討論決定：開除黨籍，撤消原有職務（即：省人委文教辦公室副主任）。監督勞動。

中共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 關於右派分子蘇辛濤的處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蘇辛濤，男，四十歲，廣西省義寧縣人，地主家庭出身，學生成份。新湖南報副總編輯，級別十一級，極右分子。

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抗大學習時入黨，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新四軍工作時被俘後，與黨失掉關係。先後在國民黨部隊中當兵。

和当文书，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原籍义宁县当小学教员和任伪县教育科科长。一九四三年十月经廖意林的关系去重庆育才小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四月和廖到长沙经香港等地去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三月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五月南下。

一、主要反动言行

1. 苏系新湖南报反党集团的首脑。一九五七年五月苏亲自写的“统一认识，行动起来”的反动文章，实际是该集团反党、反领导的行动纲领。并多次挑起争论“一九五七年三月份的农村报导方针”，作出“关于农村先进经验技术宣传”的反党决议，反对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七年八月唐麟同志代表省委对他们进行批评后，苏不但不接受，反而慫恿集团成员柏原乘去中央学习的机会，将争论的小册子带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同时还将该集团成员蔡克诚为“脱产领导整风”，来篡夺整风领导权，进行反党活动。之后，省委书记周惠同志再次批评时，苏却狂妄叫嚣要“积极行动起来，搞到底”，并将周惠同志的批评抄好，声言要向书记处和中央告状。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全面包围省委的计划，发动集团成员分别向省委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先攻孟（报社孟树德秘书长）、后倒官（报社官健平总编辑）”的反党步骤。

2. 制造反党谬论。苏说：“党和人民在总的方面是统一的，但在具体问题上矛盾。”因此他提出报纸必须“大大提高政治胆量”，要“成为舆论机关”。还说：“省委与中央一致是抽象的，矛盾却是具体的；省委负责同志与省委之间一致是抽象的，矛盾却是具体的；省委个别同志不等于省委。”同时其集团成员便公然叫嚣“我就不把周惠和唐麟的意见说成是省委的意见”。

“省委书记周惠不能代表省委来领导报社”。“报社的稿件为什么要送给唐麟审批？”

3.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辦報路線，篡改新湖南報的政治方向。他公開提出“報紙要從自己的性質出發來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政策、決議和指示”。“不是直接進行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人向自然作鬥爭的據點”。他把省委要刊登的工作經驗和指示攻擊為“布告牌”。

4.煽風點火。他揚言說：“報社的三大主義特別嚴重，單是小民主不解決問題，上街、罷工不可能，上書、請願是可能的。”還对党外右派分子魏猛克（省文聯主任，民盟負責人）說“過去我們的私人感情實在太少了”。對向麗（報社非黨幹部，右派分子）說：“共產黨缺乏人情味。”

二、鬥爭中的態度

開始企圖蒙混過關，正式鬥爭時才被迫交代了一些事實。但帽子戴得大，具體交代少。對小集團其他成員的反黨活動也揭發不夠。態度是較惡劣的。

三、處理結果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經省委討論決定：開除黨籍，撤消原有職務（即新湖南報社副總編輯）。勞動教養。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 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徐江萍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在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期間，經過代表們的揭發，証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在政治上已經墮落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錯誤是：在他所担任的檢察工作中，一貫表現右傾，喪失立場。突出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当城市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否定合作化成績，誣蔑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时，在这样严重的斗争关头，徐江萍身为国家专政机关的主要幹部，不是出来維護社会主义，保衛人民利益，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地却在一系列問題上，敌我不分，喪失立場。他混淆两类矛盾的性質，把敌我矛盾認作人民內部矛盾，甚至，連反革命暴乱杀死了革命幹部，他也認为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且还誣蔑說暴乱是由于幹部作風不好引起的。这样，他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疯狂进攻，不但不去主动鎮压，反而为他們喊冤叫屈，恶毒地无中生有地誣蔑我們的肃反运动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都是“錯案”和“冤案”。徐江萍对敌人是这样的寬大与照顧，而对于我們的幹部，却極尽其誣蔑和丑化的能事。他把我們許多階級立場坚定，对敌斗争英勇的同志，描繪为作風恶劣、“违法乱紀”的人，說他們是“靠捕人来打开局面，靠惩办来代替思想發動”。因而他竭力主张对所謂“违法乱紀”的人，进行“严肃制裁”。这样，

很明显，徐江萍的专政矛头，不是指向敌人，而是指向人民内部和革命干部的。

徐江萍还反对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他把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外，向党闹分散、闹独立。他认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便是破坏他的“独立审判”；说检察干部参加了党的中心工作，便是“不务正业”。

根据上述情况，充分证明：徐江萍的言行，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行；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作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巩固党，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徐江萍的党籍；并且建议有关的行政方面，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应该在党内外加以公佈。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 关于右派分子阮力定案与处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阮力，女，三十七岁，江苏省松江县人，共产党员，原广西省妇联副主任。

阮力从小便全家参加天主教，又于一九三七年在上海高中时曾参加上海市第一届学生集中军训。一九四〇年曾被批准参加共产党，尚未宣誓过组织生活因转移地点而失掉组织关系，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新入党。平时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民主作风差，不虚心，对人严对己宽，工作不艰苦，不深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闹地位、待遇。

一、主要反动言行

1. 攻击統購統銷政策，她說：“在統購糧食問題上，不根据政策办事，欺騙群众乱宣传，强迫命令违法乱紀，侵犯群众利益十分严重。”污蔑統購是“区幹用开除党籍、捆绑、抄楼等办法进行”，或用“拂晓包围，天亮解决”，攻击統購統銷搞糟了，說“造成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妇女兒童餓死了，很多妇女兒童变成了孤兒寡母，很多妇女兒童至今与亲人离散”。

2. 攻击各級党委，丑化各級党委的負責幹部和污蔑党的幹部政策。他說：“中央省委对全省餓死人事件，籠統总结为因災餓死人，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死人事件的检查是民主人士反映到中央后，中央才派人检查处理的，这么多共产党员都在幹什么呢？”又說“大幹部下去排場太大，真正接近深入群众太少，在負責幹部中打圈子較多，不如旧社会的清官还化装到民間私訪”，說省委“执行幹部政策沒有原則”，攻击各級党委不重視妇女工作，挑拨妇女幹部对党不滿。还說妇女幹部搞中心工作是“不务正业”。

3. 丑化全国妇联領導，去年六月在全国省市妇联主任會議上發言說“大姐大事不会幹，当然不会犯錯誤”，又說：“全国妇联有怕上現象，最敢講話的还是新聞記者。”

4. 企圖把妇联組織放在党委之上。說“妇联要有代表性、斗争性，只有妇联才代表妇女的利益”。提出“妇联要監督帮助党政正确貫徹粮食政策”。

二、斗争中的态度

初期态度極不老实，經多次批判斗争，最后已基本承認錯誤。

三、区党委整風领导小组定案与处理决定

划她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由十三級降为十六級）。

广东省水产厅整風领导小组 关于極右分子蓬荊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蓬荊，男，四十三岁，广东省东莞县人，工人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六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現任中央水产部群众漁业司副司长。

蓬荊是广东水产系統右派的首脑。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1、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妄圖篡夺广东水产系統党的领导权，有計劃、有綱領、有步骤的疯狂的向党进攻。他于一九五四年离开广东之后，抱着極大政治野心，积极活动，拉攏与他主张一致、观点相同的温盛湘、鍾傑明、謝平（均为右派分子）結成反党的领导核心，积极策謀为温盛湘翻案，謀取高級职位，支持南海水产公司“九三”黑帮的反党方案：取消党委，赶走党员领导幹部，与謝平密謀撤销省水产供銷公司一批党员科长，由他回广东水产厅当厅长，讓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上台，以改变党的政治方向，建立他的“独立王国”。

2、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績，攻击水产厅和省委领导。他把延安整風說成是“很多老幹部現在想起来还要下淚，要吸收延安教訓”。又說：“广东搞运动不客觀”，“掌握鎮反过严了”，“姚宝猷不过是文化特务，留到今天不一定杀”。他玩弄

手法，包庇地主恶霸分子，破坏土改运动；抗拒三反，說自己单位是“清水衙門”；認為肃反“粗糙，不客觀，打击面过寬了，过份的伤害幹部”。他造謠攻击說：“水产厅是沒有經過国务院批准的”，“水产厅不能容人”，“新水产排挤了老水产”，“否定了他过去在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功績”。他传播地方主义，攻击省委，說：“陶鑄同志这几年领导广东工作偏差不少，不該对方方下这么狠的手”，“广东整風运动陶鑄不便领导，应由尹林平领导”。

3、一九五七年六月借故来穗大肆点火。他来广东水产系統各部門組織反党分子、三反、肃反对象数十人，煽动、唆使他們向党反攻，通过个别交談，开“宗派會議”，上茶樓酒館請宴赴餐等方式，千方百計的进行反党点火活动。指揮党内、外右派分子“上万言書”，“鳴放到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央水产部去”，“上下結合，互相配合”發動总进攻，他要給三反、肃反对象“平反”，煽动“申冤”，說：“三反弄得你傾家蕩产”，“肃反委屈了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到水产厅，不解決問題就告到省委，告到陶鑄”，“可把行李放在省委門口，不解決問題就不走”，“要趁整風机会求得徹底解決！”致使右派分子瘋狂到了極点。

4、反对党的幹部政策，他在广东任职期間一貫重用依靠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排斥共产党员和轉业軍人。他說：“特务可以用，历史复杂不要紧，留在机关比放在社会上更为保險”，“宁要一个工程师也不要千百个共产党员”。把党员当作“木头”和“招牌”。他污蔑水产部，說：“部的幹部都是別人送礼送来的，司长不称职，水平不高，处长低能，不懂业务。”

反右派斗争中，蓬荪在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証据面前，被迫承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仍不承認是主观上有意識的反党。

蓬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是十分嚴重的，為此，決定劃他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留機關監督勞動。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廣東省委批示：劃蓬荊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實行勞動教養。

中共廣州市文教局整風領導小組關於 極右分子李鷹航的處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李鷹航，男，四十一歲，廣東省台山人，家庭出身手工業，本人成份教員，一九三八年入黨，現任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音協廣州分會主席、市文化局分黨組成員及音協臨時黨組書記，十三級。

一、個人主要經歷和政治歷史情況

一九三八年六月參加革命，歷任教員，教授，音樂、戲劇系主任，文工團長，文聯委員等職。在延安時搞過小圈子，曾因此被列為審查對象。

二、主要反動言行

（一）組織右派反黨集團，有計劃地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

大放大鳴期間，李捏造文化局執行“以戲劇為主”的方針，污蔑是“一花獨放”，並以此為幌子，以他為首，煽動和組織了右派分子趙本、譚林、蔡曲旦、梁德靈等人的右派反黨集團，召開了幾次秘密會議，佈置他們發言要重點談反對“戲劇為主”，

並授意叫他們給報社寫稿，寫好后李親自修改和補充，送報社發表。（“以戲劇為主實質是一花獨放”一稿在廣州日報發表，“落英繽紛”一稿投南方日報）還研究了進攻策略，說：“現在先攻倒市（指市文化局）是第一步，省文化局、省委文教部問題一樣嚴重，要第二步才解決，我絕不認為走了第一步，就不走第二步。”並佈置如何控制會場，實行所謂“連鎖發言”來向党進攻。為了供給小集團成員向党進攻的材料，除了捏造事實外李還將市文化局分黨組秘密文件（三年總結）給蔡曲旦看。當他們的活動受到文藝界有力的圍擊后，李即對其成員打氣說：“不要失掉信心，不要亂了自己的陣腳”繼續鼓勵他們向党進攻。

（二）否定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成就，描寫成“一團糟”。

鳴放期間李在民主人士趙君迈召開的座談會，及局務擴大會、省委宣工會議等會議上說：“以戲劇為主是一塊大石頭，壓死了其他藝術事業。”又說：“音樂、美術、新聞、話劇、杂技、舞蹈，除了粵劇以外的藝術部門都不被領導重視，他們改行的改行，積極性不高，事業沒發展，藝術上太多清規戒律。”

（三）散布文化藝術的成績是自發的，否認黨的領導。

李在上述的會議上又說：“如果音樂工作有成績也是自發的，是依靠社會力量和音樂工作者，是從石頭縫里長出來的，是音樂本身有自發生命力，並丑化黨對文化藝術領導有五種態度，即：（1）吓唬人，（2）裝听不見，裝聾裝啞，（3）採取壓縮的辦法，（4）用另一種面目（重點）來保護‘一花獨放’，（5）不從改善著手，而是考慮解釋。”

（四）挑撥群眾向党進攻。

李說：“搞音樂的處於奴僕地位”。“各個藝術部門待遇不公平。”又說：“只有‘爭’和‘叫’才能得到黨的重視，才能糾正不平等待遇。”甚至說：“就是反革命分子，反對一花獨放也是好的。”

（五）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

市文化局分党组传达中央对整风的指示之后，李說：“市委提出阶级斗争，我不同意；中央提出的阶级斗争，我也有意见，既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就不应有阶级斗争，这样使斗争模糊了。”

三、斗争过程中的表现

斗争初期表现出顽抗情绪，后在人证物证面前才承认一些具体事实，但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没有认识自己的罪行和真诚悔改的表现。

四、一贯表现

工作一般，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平时思想上自命不凡，高傲自大，常骂人“无知”，曾表示想当厅长、部长，回广东后，选择过好几个岗位，嫌职位低不去，来市文化局后，对工作不负责任，很少到局办公，由他主编的“岭南音乐”他从不审稿。

五、结论和处理意见

李鹰就以反对“以戏剧为主”的方针为幌子，煽动和组织右派反党集团，他是这个小集团的头子，并散布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决定划为极右分子。但考虑李在音乐方面有所专长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因此，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级别由十二级降至十六级。

（已经广东省委批准）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古念良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古念良，男，四十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二月参加共产党，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原任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级别十级。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党校时说：“我国建设重工业片面了，全国农业产品一共只值四百亿元，拿这样农产品的产值来建设重工业，不成比例。匈牙利、波兰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使购买力向生产资料突击，目前已到了农产品了。”他说：“我在香港时，看到有些大洋行，机构小，人少，工作效率高，这是因为他们是私有制，大家都好好干。我们的社会主义，总的说是有优越性，但具体说，机构大、人员多、工农干部多、工资高，没有能力，工作效率不高。由于我们有些干部对公有财产的爱护，不如资本家对他的私有财产爱护。”

否定肃反运动成绩和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党校时说：“在肃反运动中，我是小头头，斗争时拍桌子。开始把一个肃反对象判了两年徒刑，最后定下来是劳动教养，这是否可以說成绩是主要的呢？”“如果多講成绩少講缺点，就不是实事求是，这种說法有危险性。”“我们有些同志对肃反缺点認識不足，不去認真賠礼道歉，被斗者对我们很不滿。”他在检查中

說：“在寫肅反總結時，我就想到寫肅反具體成績，但是很難寫出來，後來還是寫了成績是主要的。”他很讚賞右派分子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認為它細致的道出了知識分子的心情，又說：“黨在解放後，對一些知識分子使用安排不當，使他們的作用未能發揮。”一九五六年在廣州時曾對人說：“市里有些單位對知識分子幹部有宗派情緒，表現在對有些知識分子的安排、使用有缺點，在肅反運動中的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比例大。”

為右派分子說話，詆毀黨的反右派鬥爭。他說：“當我聽到有些知識分子說‘六八’社論有點厲害時，我又認為不如在象梁思成、程潛那樣的文章先發表幾篇以後，再發表社論好點。”

“社論痛斥了右派的言論，是應該的，不過要注意，不要使別人認為我們要‘收了’，又不虛心了；不要光從我們自己出發，也要從六億人民出發。”他說：“右派不是反革命，仍然可以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即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處理。”又說：“反對社會主義，不一定反對共產黨。”

贊揚右派分子的謬論，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他說：“葛佩琦的言論很反動，但有人認為很好”，“讚賞葛佩琦的話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袁永熙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治家當工科大学校長的。”“如果蔣南翔當副校長，劉仙洲當校長，就主動了。”古說：“此話有道理。”右派分子徐盈說：“學校（指高級黨校）有教條主義，教研室脫離實際，半年備課，半年教課，真是誤人。”古說：“對！有道理。”袁永熙被開除黨籍後，古認為“袁怎能說得出這些話呢？有些情節會不會搞錯呢？”還經常到方×家里打聽袁的消息，十分關懷。當同志們發現徐盈政治上有問題時，古說：“徐是個老實人，書呆子。”支部決定讓古對徐進行批評，但古始終未對徐進行批評。在支部向徐展開鬥爭時，他却擅自與徐談話。並幾次找其他同志打聽徐的情況。在批駁徐盈時，有人指出徐向党進攻

是想在政治上撈一把，古認為“原則提的太高”。以後（七月底）同志們公認徐是右派分子時，古還認為徐“僅是思想上相當嚴重的右派觀點。”

2、攻擊領導，排擠外來幹部

在財政局期間，古對麥揚說：“要有幾個‘死黨’搞工作才好辦”，“士為知己者死”。他在財局，主要依靠他所信任的地方幹部搞工作。如把麥揚安排當預算科科長，唐懷當供給科副科長。工作上重大問題，都和他們商量着辦。市委要調麥揚去廣州日報工作，古不願放，並親自向市委提意見不要把麥調走。對趙元浩等人說：“現在廣州市局、處級的地方幹部就是我們幾個人了，我們要好好工作。”他們間經常自由主義的議論，如古對趙元浩說：“你在華南黨校受留黨察看的處分是市委的意見。”對陳文川說：“你有些問題是‘莫須有’的，是章璇加上去的。”“舊社會來的怎麼沒關係，沒有關係就活不下去。”又對麥揚等人說：“南下幹部不了解地下黨的歷史，又不了解舊社會，對地下黨員的歷史就不易正確了解。”“傅維新屢次提出要把陳文川列為重點，其實傅完全不了解情況，顯然是‘亂彈琴’。”唐懷的提級沒批准，他就對唐說：“本來財貿戰綫已同意提你一級，上報時漏了，以後補報人事局就不同意了。”古很替唐懷擔憂，在高級黨校時說：“如果唐懷在黨校，我看一定當右派。”他們互相吹捧，古公開說：“我和唐懷是臭味相投。”古說陳文川、唐懷是“作家”，陳、唐就吹噓古是“專家”。

古的地方主義已發展到敵我不分。解放初期，接管了財政局，把檔案材料交給一個民社黨的黨員來管。安排周維平（叛徒）當收管科科長；陳愷（叛黨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當副科長；古介紹入伍的黃伯申（脫黨分子）也是一到財政局就當了副股長。另外由麥介紹入伍的廖延（歷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唐懷介紹入伍的焦沃南（肅反對象，右派分子）等人都是古所信用的。並說：“你們很多人沒有經過監獄的考驗，不知道裏面的

苦。”对周維平說：“我們处一級当中，叛变自首的，也可以当秘书长，如饒銀华就是。”傅維新同志几次提出要調查周的历史問題，古不表示态度也不給予支持。

对工农幹部、外来幹部，古采取打击和排斥的态度。先后派到財局工作的南下幹部都受到古的排斥。如經常在背后說：“何庶仁不正派，很阴險”，“虽无大过，面目可憎”。“孙伽俐比何庶仁高明，但不好相处。”古常常粗暴責罵工农幹部，如罵張鈞是“草包”，事后張找他交換意見，他不理；王子文認為陳文川应列为肃反对象，古就罵王是“品質恶劣”。又說：“工农幹部文化水平很低，很难搞好財政工作。”这些同志，先后被調离了財政局。以后組織調傅維新同志（南下幹部）到財政局工作，古几次都不願要，后来組織命令他接受，古才不得不同意要了。三反时，傅批評古排斥外来幹部等錯誤，他大为不滿，說傅“識不抬举”，“別有用心”。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党校时对黃士風說：“幹部要地方化了，估計王德、赵武成两同志很快要調走，鍾明同志可能当市长，吳有恆当市委第一書記”。

3、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很严重

一九五六年市党代会上选举市委委員时，古落选后，到处說：“市委既然把我提了名，对幹部就應該有个基本認識”，“許多批評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市委沒有澄清是非，大会一瀟就名誉扫地”，“市委不出来解释，令我下不了台”。

一九五六年間，市委要調古到广州日报工作，他怕熬夜，不願去，对組織調动甚为不滿，說：“会唸經的和尚不唸經，偏偏要不会唸經的和尚学唸經。”但，他積極活动要到科学院去，“專門研究一門，将来也可以写一本書”。找許滌新同志，請許調他去中国科学院，沒去成，就活动到科学院广州分院，表示“科学院广州分院不行，調到中山大学也好，反正不做行政工作就好了。”

古在生活方面腐化墮落，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四年曾先后两

次搞不正当的恋爱。

他在党校检查时说：“过去当官的，现在是当干部，有共同性，也有个性，个性是时代不同，共同性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必须有一套，就是对上边一套，对下边一套。”

“我不是把自己作为党的工具，而是把党作为我向上爬的工具。”“我对各项政治运动和党报都不感兴趣，人民日报是老一套，教条主义，每次运动都是提打通思想，也是教条主义，运动就是整人。”

二、斗争中的态度

古对高级党校关于延长学习时间，继续进行整风的决定，抵触情绪很大，写信给唐怀说：“我们这里自从提出整风为主，学习为辅，并要求做到理论学习和整风两不误之后，学习空气为之一变，而‘风’也没有什么好整似的，看样子，‘两不误’已成为定局”。

古在党校的错误言行经党校支部及小组同志多次帮助和批判，但古对错误仍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对错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只扣大帽子不讲具体事实，或有时承认一些事实，但不彻底挖思想，有时装着在写检讨，实际上是开着灯睡觉，有意拖长时间，蒙混过关。并且在检查时说：“我一不该来党校学习，二不该五月间没退学，三不该编在第七支部，四不该当支委和小组长。”但是又说：“回广州联系我过去历史会比这里整的更惨。”古回到广州后，对麦扬说：“在党校犯了严重错误，还未结论，主要是严重右倾。在党校时受严厉批判，自己把什么帽子都扣上了。”

在市委扩大会期间，极少发言，对于平日来往密切的同志（如余美庆、唐怀等）的错误，没有揭发出什么材料，战綫领导小组责成他写书面检讨也迟迟不交，态度十分消极。所写的检讨很不深刻，仅根据同志们揭发的问题进行检查，没有暴露自己的错

誤和思想，對錯誤的認識是很差的。

廣東省委批准划古念良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交通部廣州區海運管理局整風領導小組 關於右派分子吳英民的處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個人主要簡歷和歷史情況

吳英民，又名吳清鏡，男，四十三歲，河北省正定縣人，地主家庭出身，學生成份，現任廣州區海運管理局局長。吳英民於一九二八年參加共青團，一九二九年轉黨，不久即被捕入獄，一九三一年出獄後即動搖脫黨，先後在偽濟嘉荷煙草稽征局工作過，又在閩錫山部炮兵二十六團任文書，在保定投入蔣匪待從武官長行轅主任錢大鈞部隊，一九三三年隨錢部到湖南、江西等地，後在國民黨三十二軍當過排長，還在補充兵招募處訓練班幹過，一九三八年經駐湖南邵陽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去延安抗大學習，一九四一年秋重新入黨。

二、主要反動言行

（一）誣蔑社會主義企業的優越性，反對黨在企業中的領導。

鳴放初期，吳英民授意其秘書楊章，化名“公民”寫大字報一篇，題名“我也要鳴”內容說：“有人說海運局不如民生公司，民生公司不如盧作孚（舊民生公司資本家），我認為真是

一針見血，我們機構龐大，人浮于事，效率很低，官僚主義嚴重，歸根到底是企業黨委制的問題……企業是政府的，是六億人民的，並不僅僅是共產黨和一千二百萬黨員的。……今天企業的工作全部都給黨包辦光了。……究竟企業的最高領導是局長呢，還是黨委？如果是黨委乾脆取消局長一職好了……這實質上是一黨專政，那有什麼共存，有誰能夠監督共產黨呢，……”。該大字報由楊章起稿，由吳英民批改後，偽稱是別人投稿，吳英民、楊章並分別在稿後寫上批語，交黑板報登出。

鳴放期間，在一次船舶支書會議上吳支持“無知不能領導有知”的謬論，並說“除開黨外人士我們則辦不成……”。又說“‘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說得很對”，並將這句話在會議總結中又著重提出。當儲安平“黨天下”謬論在報上公布後吳就說：“你們看，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了，說十二個總理沒有一個不是黨員，是黨天下，我看這很大膽，很有道理。”在一次報告會上吳也提出“我們海運局局長都是黨員，清一色。”吳還誣蔑黨的領導說：“黨中央毛主席領導是英明的，有遠見的，但是一到下邊不是右就是左，有時是過分的左。”

（二）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

鳴放初期右派分子李光放出反黨言論時，黨委副書記許濟同志向吳二次反映“李光發言很有問題”吳即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當右派分子張玉華包庇右派分子李光事被揭發後，吳英民竟在召開“反擊右派分子陳華大會”時要將張玉華列入大會主席團名單，顏太龍同志不同意說“這是原則問題，要參加就得請示省人委嚴秘書長”吳方作罷，但事後又對陳聚同志說：“我是小組長又是局長，象這樣事情還要經過嚴秘書長批准嗎？”以後吳有意要將張玉華派去香港工作，被其他領導同志阻止未成，十月間吳又要將張玉華派去八所工作，也因其他領導同志反對而未成功。

三、斗争过程中的表现

斗争初期，吴想蒙混过关，並曾在党委会議上威胁說：“如果明天有人揭發“我也要鳴”大字报，我立即就要写大字报否認，說我没有写”。之后在大会上檢討时也是狡辯，硬說大字报不代表自己思想。一月底吳写給党委王書記的信中仍写着“冤枉到極点”“朱笔一点，人命二条的时候到了”“假如我真是个右派分子，那就无話可說”等語。当最后与吳对証材料时，吳又用“記不清”“想不起来”等話来推諉，态度十分恶劣，无悔改表现。

四、一贯表现

吳英民一贯表现是个人高于党委，漠視党的組織，数次不通过党委个人擅自决定重大問題，当党委提出意見时就說：“什么事都要党委决定，要我这个局长干什么？”“到底是局长說了算还是党委說了算？”“有党委書記还要局长干什么？”等語，直到問題被揭發后，吳仍在会上說：“这个要党委討論，那个要党委討論，到現在我还有意見。”对我局領導同志进行排挤。对省召开一些會議常借口推辞不去，如一九五〇年春省委决定搞綠化运动，吳也不去，並說：“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苦我們早就吃过了”。

五、处理意見

右派分子吳英民的反党言行是極为严重的，屬極右分子，情节严重，斗争中的态度恶劣，决定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教养。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广东省委批示：划吳英民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领导小组 关于右派分子张玉华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玉华，男，四十七岁，广东省保安县人，工人家庭出身，工人成份，一九三五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入党，現任广州区海运管理局副局长。张玉华一九三九年以前在香港九龙黄埔船厂及英国軍艦等处工作，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学习，一九四一年在延安中央解放社任电机部主任，一九四二年在晉綏分局×地委作幹部工作，一九四五年在旅大市委作幹部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任广州招商局軍代表，一九五一年后任广州区海运局副局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包庇右派分子李光，为右派分子李光出謀划策
反右斗争初期，右派分子李光（本局海监科科长、工程师）的右派言論在小组中受到批判，张玉华竭力为李光辯护，他說：“李光的問題主要是对肃反不滿，其他都是拉搭上去的”“李光是中間偏右”“李光已被搞臭了、瘦了、头髮都白了、再搞就不得人心了”“李光哭了好几次，我心軟了”。当领导小组决定将李光划为右派时，他不滿地說：“照你們这样說法：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挑拨离間，再加上其历史，槍毙都够条件了”。並为李光策划过关，李光在反右初期曾找他三次商量如何檢討，有一次檢討事先經张看过，张还提出修改意見，說李“措詞不当，人家会說你想国民党复辟”。他还对李光說搞运动是“群

众未發動之前主要是防右，發動起来是防左。”

（二）煽动內港落后工人鬧事

一九五七年年年初广州內港落后工人鬧事，本局党委决定派张去平息鬧事，他坚持不肯去，于是改为副局长魏震东同志去。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召开工人大会时，张去到內港，魏見他会說广东話叫他报告，他拒絕不講，但到会将开完时他上台用广东話發言，發言中引用了落后工人的話，把工資股說成“工資估”，說“人家辛辛苦苦劳动，你們工資股就是想办法少算給工人錢”，“見工人拿錢多就眼紅耳赤”“如果是我就拿竹升（扁担）去打。落后工人听后热烈鼓掌說：“张局长說的是良心話”。事后鬧事更兇，並包围了工資股，工作組同志向他提意見，张說：“不滿意，以后我还要講，講得还要厉害一些，工人有意見是小事，不打人还是好的，这些人不打在身上是不改的”。

（三）反对“三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誣蔑党的政策

张玉华誣蔑“三反”运动說：“运动中領導身上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好象运动期間規定我局打虎数字，我說那里有那么多老虎，方方同志当众点过我的名說我右傾思想严重，我不管，我沒有违背我的良心乱搞”。肃反运动中領導分組将李光等划为肃反对象，张極為不滿，曾在會議上多次为李光辯护未遂，以后便不参加領導分組會議（他是組員），直到李光問題做出結論再三通知他开会才勉强参加，会后諷刺領導分組說：“这些人真幼稚”。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借口“整風生产两不误”恶意質問党委副書記說：“整風領導小組怎么搞的，今天开会明今开会，科长都跑光了，五年計劃还要不要？”，他要办公室主任追查整風办公室为什么搞得这样乱，那个領導把运动高于一切”，对安全技术科科长（反右小組长）說：“几个右派搞不起什么，咱們还有几百万軍隊，不是嗎？”企圖叫他們放松反右斗争。工資改革时，张玉华

說：“農民在土改時分得土地，我們工人只有在工資上爭”“物價都漲了當然工資也應該漲”。他對統購統銷不滿，說：“現在收購價格不合理，王老吉涼茶也脫銷了”“我們家鄉那里的老百姓過去吃肉都大塊大塊吃的，現在少了，人家怎麼沒有意見？”李世杰、吳達誠兩人對合作社有意見，張叫他們去打合作社。

（四）誣蔑領袖和中央領導

張經常在報告會上公開誣蔑黨的領袖。他還誣蔑中央交通部的檢查組長是“欽差大臣”，把馬列主義誣蔑為“牛列主義”。

（五）反對學習蘇聯，贊揚資本主義企業

張玉華一貫反對學習蘇聯，當我局進行企業生產改革時他提出“我局工具先進、人馬齊全，貨源充沛”“一切要靠天時、地利、人和”“靠馬克思在天之靈”。認為我們沒有什麼可改的，他把推行計劃管理說成“教條主義”“形式主義”“行不通”。南海136輪發生擱淺事故，他誣蔑說：“就是先進航次造成的”。他贊揚資本主義企業說：“太古公司”（英商）四十多人管三十萬噸船，船比我們好，秩序井然”“招商局在社會上存在七十多年，當然也有其優點才能如此”。他自稱“反對派”，在各種會議上有意提出反對意見，造成混亂。

二、鬥爭過程中的表現

張玉華在鬥爭中的態度很不好，不肯主動交代問題，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一些，但在承認時避重就輕，甚至當面抵賴，只承認小的，不承認大的，到現在為止，對其錯誤認識尚不夠，認為是平時愛說笑話，開玩笑隨便所致。

三、一貫表現

張玉華自來廣州以後，一貫對領導不滿，工作責任心差，處理問題原則性不強，執行黨的政策和上級的指示不堅決，革命意

志衰退，計較個人地位待遇，一貫道德品質敗壞，私生活腐化墮落，嫖妓女，與本局女職工亂搞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破壞別人家庭幸福，三反運動中曾因走私、腐化受到黨內當面警告處分。

四、處理意見

右派分子張玉華一貫對黨不滿，根據其反動言行為一般右派分子，決定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監督勞動。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廣東省委批示：劃張玉華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由十一級降為十七級）。

中

李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李愛農，廣東省惠陽縣人，一九三八年六月參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入黨，現任廣州市勞動局副局長，十四級。

主要錯誤事實

（一）嚴重的地方主義，積極參加“東江會館”的反黨活動，為該反黨集團的核心分子。

李愛農是“東江會館”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核心分子之一，該集團的中心活動場所就設在李的家里，主要活動李均有參加，而且有某些活動還是以李為主的。

該集團經常聚集一批有嚴重地方主義、嚴重政治歷史問題、

犯过錯誤曾受过处分对党心怀不滿的人（絕大部分为原东縱幹部），他們在一起發洩各种对党不滿的言論，攻击党所領導的各项运动，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污蔑中央、省、市委的領導，进行非組織活动，严重破坏領導幹部威信、破坏党的团結統一。如：李和陈生說：“×書記講話无条理，听起来很费劲”。“××过去領導广州市工作，个人专断、个人領導，沒有集体領導，很会罵人，架子很大，很英雄，說話象喇叭，英雄劲一来什么話都說出来了”。甚至在民主人士陈伊林面前也这样講。把陈林少同志因“局长宿舍”問題犯錯誤受处分說成是楊一辰同志对他打击报复。更其恶劣的是公开向劳动局幹部說“中央×××同志馬列主义水平不高”。甚至罵“上級党委摆烏龙”，“支部現在作了打杂工，老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等等。並說：“林平同志过去是东縱的政委，現在才当交通部长”“摆低了”。林平同志被选为副省长后，又認為“林平的名字列在最后”“不恰当”。認為：“楊康华当不上正式委員（指省委委員）是不應該的”，这是“党照顧东縱不够”，省委照顧地方幹部不够”。並要醞釀写“东縱的历史，要为东縱”立紀念碑。此外，李还鼓励支持犯过錯誤的人向党进攻、翻案，对三反时犯錯誤的刘宜，表示同情，認為刘的处分是龙潛搞他。陈生因特嫌問題被扣，李又为陈喊冤說：“陈生过去是地下黨員，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党这样对他，他是受到不少委屈的”。对朱德明在土改整队中被开除公职、党籍深表同情，一方面替朱介紹工作，另一方面又鼓励朱翻案，对朱說：“你不意見可以向省委申訴”，並叫朱去找邓秀芳，結果朱上書“八大”。对丘萌棠（自首变节分子，土改整队中被整出来）說：“若处理不符事实，可以上訴”，並介紹丘在技工学校任政治教員，說丘的問題是“土改整队有偏差”。

（二）在整風初期大鳴大放中，亲自煽風、点火，与右派分子結成联盟向党进攻。

李在領導小組及党支部大会上說：“現在鳴放沒有范围，反

党的也可以放”等，从中煽动群众並进行一系列活动，不仅如此，他还以領導小組會議形式与右派分子黃煥旋联盟策划，化名“大放”，放出一篇“劳动局本身就是党天下”的恶毒透頂的大字报，說“儲安平党天下不一定錯”。並別出心裁的用劳动局的“事实”來說明党天下謬論是正确的。最后还公然向党提出質問：“难道这些党员都应提拔的吗？都信任吗？非党人員都那么分文不值吗？”当群众起来反击以及市委检查發現以后，不但不向市委报告，而且还多方設法替右派分子黃煥旋打掩护，企圖蒙上欺下，性質非常恶劣。

（三）严重地方主义，排斥外来幹部，进行非組織活动。

李还利用劳动局副局长之职权，把自己的五同关系和“东江会館”首要分子高云波、陈志期等推荐来的人安插到各单位工作的不下二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曾在土改整队中被清洗、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或脫党、自首变节的分子。李的同乡、老部下陈少英不願在惠阳邮局工作，李認為：“陈少英是地下党的老同事，压了这样久，連县委都不能当，是县委不了解他”，积极替陈活动回广州，他認為这样提拔更为容易。衛生局张迅因三反貪污受处分，想离开該局，李向张献計，要张先爭取到党校学习，然后再設法留在党校工作，张到党校学习后，李就通过“东江会館”首要分子陈生設法留张在党校工作（后未成功）。

李对两个局长进行打击、排斥，說单副局长是“醉酒保”“劳动局陈林少当局长，单保良当副局长，还有一个民主人士陈伊林，真是天晓得”。“东江会館”分子为了李的提拔，曾在劳动局党组和市委組織部等处积极活动。李被提拔为副局长后，排外活动更为嚣张，竟将發到各科的通知中“单保良代副局长职务”一句刪掉，不用单章改用公章發出。

（四）对錯誤的認識

李在大辯論开始时，与“东江会館”集团分子訂立攻守同盟研究对策，但在“东江会館”反党小集团成員中，还算比較願意

檢討的。

廣東省委批准划 一般
有職務， 較

廣東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庄明瑞的黨籍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

庄明瑞，原任汕頭地委副書記。其右派言行是：

1. 包庇全區著名的右派分子張華云。去年6月大鳴大放時，張對地委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不滿，親自寫信給庄，公開謾罵，污蔑我黨和黨的負責同志為“老爺”、“貴族”，惡毒的攻擊地委和專署。事後，庄住醫院治病，還約張到醫院面談，庄對張的右派言論不僅不予批駁，反而認為張所提有道理，鼓勵其準備材料再提意見。對張攻擊、謾罵我黨的信，也一直不交給組織。到反右派階段，汕頭市委曾數次向地委彙報汕頭市反右派鬥爭情況，當時地委感到汕頭市對民盟和“文藝沙龍”等問題很搞的不徹底，並強調應繼續搞徹底，當時庄是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都參加這些會議和布置，情況很了解，當時庄如將張的信拿出來，就是一個有力的証據，可以把這個右派搞得更深更透些，但他仍不向組織報告，直到反地方主義開始，鬥了幾場，經同志們揭發和組織上的追查後，才把信交出來，前後共積壓了半年多，實際上是包庇和支持右派分子張華云向党進攻。

2. 公開包庇李亮的嚴重政治問題。一九五六年省公安厅捕獲一偽國防部二厅特務分子李海，李供出李亮（原汕頭市公安局

长，現任副市长，右派分子）历史上曾参加过特务組織，与李海一起受过特务訓練，省厅将这个材料轉来后，李北淮同志是慎重处理的，将信退还省厅查对事实后再轉来处理，省厅查对后把材料交給公安处，公安处交給庄，而庄却把这一重要材料一直压了一年，不告訴市委，也不向地委彙报，也不調查处理。今年一月汕头市整風办公室通过組織手續，派幹部向庄索取李亮的材料时，庄不給，还欺騙說，李亮参加特务組織是党派进去的，有过交代等等（实际未交代，也不是組織派去的）。直到追查了四次之后才把材料交給市委的幹部，而且态度極不好，还追問說：“是誰派你們来調查？不是个別人叫你們来的吧？”最后还加重語气說：“李亮的問題是組織派他参加的，他的历史有过交待，你們要好好查一查”。現据查对，李並未交代这一問題，也不是派进去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問題，又發生在一个較为高級的幹部身上，庄身为地委副書記，对一个可能参加过特务組織，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人，竟極力包庇，这是由于庄的地方主义發展到严重丧失政治立場，敌我不分的結果。

3. 严重丧失政治立場，直接引用一批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庄利用职权，借口調动積極因素，通过私人关系，拉进一批反、坏分子到机关、学校中工作。据已揭發出来被拉进来的有十一人。如张世干，原为庄的同学，庄的入党介紹人，（此人大概于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开除党籍，后长期任伪职，参加国民党，任“防奸”小組长，是一个叛徒）庄于一九五七年机关肃反后、七月学校准备反右开始时，急急忙忙把他从学校調出来，并用威吓手段要地委农村工作部、交通部給予分配工作，在庄的極力支持下，张被安排在专署交通邮电处当技术員。从鳴放中暴露材料看，张不仅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中，庄又利用地委肃反領導小組长职权，公开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如潮安县张家兰，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員，積極参加反共活动。肃反时，将此人列为重点对象，庄不批准，原因是他們

的关系较为密切。揭阳县的吴明静，两次脱党，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定为反革命分子，受过撤职处分，表现不好，但他提意見，調汕头市任文化局副局长。此外庄的政治右傾还表现在庄指示公安部門幹部下乡不准带槍，甚至到現場处理械斗的幹部也禁止带槍。从“三长”會議暴露的严重右傾錯誤，庄也应負主要責任的。

4. 造謠、中伤、污蔑人民解放軍，破坏軍民关系，破坏党的华侨政策。如一九五六年对张孝长、曾洪同志說：“軍区周司令員很难搞，軍区和地方党委的关系很难搞好。”这完全是捏造、挑拨的言論。庄对华侨政策也極力歪曲、破坏。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全区公安股长會議上說：“华侨回国，左挤右挤，乡村幹部都向华侨募捐，不实事求是，你搞一下，他搞一下，搞到华侨无錢回南洋，把金牙都摘下来，做出国的旅費”。事实上几年来，对华侨是照顧太多。至于向华侨捐獻一点錢，动员华侨投資农业和水利建設等是完全正确的，應該的。而庄明瑞所說的把金牙都摘下来，完全是捏造，其目的是在于破坏党的华侨政策。

5. 積極組織地方主义宗派集团，並猖狂地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庄是汕头地方主义集团的头子。这个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一貫地排斥、打击外来幹部，積極培植私人势力，企圖变政法部門为其独立王国。他的活动手段主要是：第一、誹謗、丑化外来的領導幹部，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受到他的誹謗、打击。如一九五〇年庄在公安处任第二副处长时，便拉攏其亲信黄大炎、廖育等搞小集团，排斥、孤立第一副处长王琳同志（南下幹部），不向王介紹情况，不和王研究工作，不給王閱讀文件，使王无法开展工作。还誹謗王琳同志說：“不懂公安工作，照搬东北經驗，教条主义”、“审讯逼、供、信”。散布王琳“卖大煙”，“喝酒”，“生活腐化”等。結果王琳同志被挤走了。一九五三年对行署公安处长程萍同志百般刁难，不給房子住，並散布說：“程萍水平低，沒有工作能力，不会使用幹部，作报告要

別人写好然后照字念經”，等等，甚至公开与程吵鬧，抗拒程的領導。对原粵东区党委書記王延春同志也同样进行誹謗，如散布說：“王延春不穩，土改結束他提出穩定生产关系，一九五三年又提出攀倒农村資本主义大旗，都是不妥当的。”对原粵东区党委組織部長左明同志，他也極不滿意，認為左否定地方幹部，散布說：“左主觀片面，說他投考高等党校时把“百家爭鳴”写成“百鳥爭鳴”。此外庄对李北淮、林鳳等同志也諸多誹議，破坏其威信。第二、排斥、打击政法部門的南下、轉业幹部。如对专区檢察院唐佑坤同志，平时喜欢听到唐的缺点，听到唐的缺点多一点便高兴，在大鳴大放中还積極布置了解有关唐的毛病缺点，企圖乘机攻击。对政法部副部长高毅如同志也很不信任、不尊重，高到政法部后，庄不給高介紹情况，高批过的案件，送庄最后批时，庄却送給其亲信、政法办公室副主任陈剑青审批。高是肃反領導小組組員，但庄却把肃反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和主持各种會議，甚至去省开肃反領導小組长會議等都交給其亲信李澤采（科长）去搞，不讓高过問。特別恶劣的是去年召开政法部門三长會議时，會議領導小組副組长高毅如同志再三要求向庄会报，庄推說沒時間，但背后又指使其亲信陈剑青到下面放火，搜集材料，向他彙报。总结也不和高商量，避开三长，单找一个陈剑青。三长會議上，庄作为政法部門的負責人，不检查右傾思想，相反违背地委指示，企圖利用政法战綫反右傾的机会，进行打击、排斥政法部門的外来負責幹部，达到打垮三长，安排其亲信。边防部楊宣同志是个好同志，曾向庄提过意見，庄便抱成見，誣蔑“楊不幹工作，不請示”，对边防部的机构、幹部安排上也有成見，認為楊不好，在地常委会議上提出不要楊宣，企圖將楊赶走。第三、積極培养亲信，封官許願，作为他排斥外来幹部的有力助手，企圖把政法部門变成他的小王国。如現在的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剑青、公安处副处长黃琳、檢察院副檢察长高修一（批准未公布），以及公安处科长黃大炎，政法部科长李澤采、李敏

祝等人，都是庄有意識安排和事先許願的。

庄除以上錯誤外，在思想上、生活上腐化墮落。如去年其母親死時，鋪張浪費，搞迷信，請尼姑，大做佛事；在男女關係上極不正派，群眾影響極壞。這說明庄不僅在政治上墮落，在思想上、生活上也是腐化墮落的。

廣東省委批准，划庄明瑞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

